

马列主义 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ZILIAO

1

1989

总第55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9 年第 1 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21,000字

1989年 3月第 1 版 1989年 3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01-000470-6/Z·27 定价 3.00 元



039

2 016 5645 8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9年第1辑目录

(总第55辑)

马克思的手稿[《资本论》第一版的补充和修改

(1871年12月—1872年1月)]……………裘挹红译 (1)

附：关于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张钟朴 (25)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波〕奥·兰格 (35)
许 彬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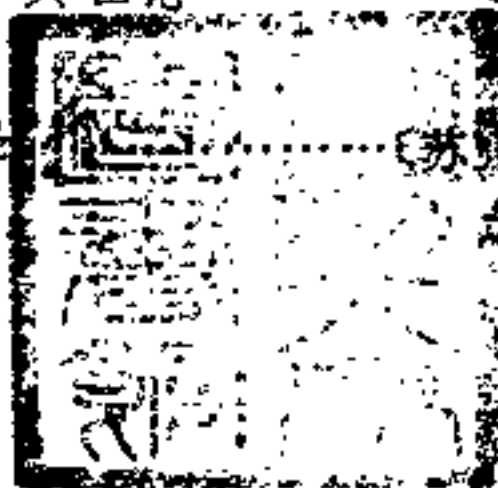
关于列宁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等问题
的再思考……………〔日〕静田 均 (49)
刘焱摘译

文献和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和巴·瓦·安年柯夫
……………〔苏〕И·Н·科诺别耶夫斯卡娅
B. A. 斯米尔诺娃 (66)
楚 舒译

研究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参考资料
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俄〕弗·亚·巴扎罗夫 (86)
郭值京译

个人迷信和党史学……………〔苏〕И·Д·曼科夫斯卡娅
Ю. П. 沙拉波夫 (110)
沉 坚译



列宁主持召开的人民委员会会议

第4—10号记录(续).....王士云译 (128)

传记和回忆

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

——恩·德朗克传略.....〔民主德国〕伊·洪特
王 竞译 (152)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法国的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洪镰德 (166)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问题和

趋势.....〔苏〕И. Г. 梅斯里夫钦科
杜章智译 (176)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赵桂琴 (190)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范畴.....衣俊卿 (206)

阿尔都塞思想简评.....彭 赞 (219)

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简介.....李其庆 (231)

评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概念.....王吉胜 童国木 (245)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

革命的现实政治.....〔匈〕卢卡奇·捷尔吉
张翼星译 (252)

读者·译者·编者

是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反对经济计划?

——从一段列宁话语的译文修订谈起.....丁世俊 (266)

马克思的手稿[《资本论》第一版的补充和修改[(1871年12月—1872年1月)]]

[5] 1 < 2 >^① 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

(I) 商 品

(1)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1] < 1 > 第一章 第3、4页^② < I >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在某一商品体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中寻找。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成为有用物，成为人类的使用物品，从而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象老巴尔本说的：“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有用，从而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

① 方括号中的数字或符号是整理本手稿的编者加的；尖括号中的数字或符号是马克思自己整理手稿时用红笔写的，下同。本文中的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参看《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中译本198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12页。

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等等，也不再是别的使用物品。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有用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包含在劳动产品中的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一种劳动生产这种使用物品，另一种劳动生产那种使用物品的一定的具体形式也消失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一种商品看起来与另一种商品一样。它们都只是什么东西的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呢？**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不管以哪种特殊的、一定有用的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的耗费。这些物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商品的交换关系或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本身把交换价值的特征表现为**抽掉使用价值**。如果真把使用价值抽掉，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价值。另一方面，研究的进程会导致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2]当把劳动产品归结为与它的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使用对象性相区别的同样的价值对象性时，有一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劳动产品只具有这种价值对象性或只是价值，即劳动的单纯凝结，因为所有实现在它们身上的不同的具体劳动都化为**抽象人类劳动**。

〈十〉(第5页)③但是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中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的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

③ 参看上书，第13页第2段。

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十〉(第7页)^④(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后来表明，物化为价值的劳动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12)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A]

[5]1 〈2〉(加在第13页^⑤++)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从另一方面看，是一切力量在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劳动力耗费的特殊形式或方式，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一定的效用。相反，商品价值只是表明：这种物只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耗费的多少通过价值的大小表现出来。

[B]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一个产品的价值意味着，它只是耗费了的劳动力，是人类劳动一般，耗费的多少通过产品价值的大小表现出来；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是以这种或那种一定的形式被耗费的，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使用，只有作为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它才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

[C]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一般的耗费，因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有一定目的

④ 参看上书，第15页第4段。

⑤ 参看上书，第21页第2段。

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

• • •

注(16)(第二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7、]38页。⑥亚·斯密《国富论》第1卷第5章)。

“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⑦

亚·斯密的观点比我们引证的他的那位匿名前辈的说法要差得多。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的确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

我们引证的亚·斯密的那段话,用德语表达就是:“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⑧

⑥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9页。在本手稿中,这段引文是英语。

⑦ 在本手稿中,这段引文是英语。

⑧ 这段话是马克思把上述亚·斯密的英语引文译成了德语。

[A]

[2] (3)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第 764 页。^⑨ <+> 单个的孤立的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正是可见的商品体的对立面。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与它们的五光十色的使用对象性不同的**社会的价值对象性**。

[B]

(3) 价值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是使用价值或商品体，如麻布、铁等等。各种商品通过自己的自然形式在感觉上互相区别开。

[C]

[3] (3) 价值形式 (注 17)

商品是以**价值形式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相反，它们的幽灵般的**价值对象性**是看不见的。确切地说，在价值对象性中把商品在感觉上互相区别开的每一特征都消失了。

[D]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

^⑨ 参看《资本论》德文第 1 版第 1 卷中译本第 752 页第 2 段。

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将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从最简单的最不起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10] 4<7> (3) 价值形式

商品只要发生**价值关系**,它们就只是相互发生关系……

[3]第 764 页^⑩ <(+ +)>

[6] 2<3> 3 价值形式

< 1 >作为**交换价值**,就是处在一个商品同另一个商品的关系中。

< 2 >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现在我们较为详细地来研究整个价值表现的两种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⑩ 同上。

[A]

§ (2.) 相对价值形式

(a) 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3 (3) 3〉(2) 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 即 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 或 20 码麻布值 1 件上衣中, 人们习惯于只看到数量关系, 也就是只看到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相等的一定的比例。他们忽略了, 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 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 才是同名称的, 因而是可通约的。

[A₁]

事实上, 在 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这一表达方式中, 麻布作为与上衣同名称的量同上衣发生关系, 在质上与上衣等同。麻布 = 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一个商品与另一个不同种商品的这种等同关系无论处于怎样的比例之中, 总是商品的价值关系。只要上衣和麻布是价值, 它们就相同。作为使用价值或商品体, 麻布与上衣不同, 作为价值, 它是和上衣等同的物。

〈A₂〉

事实上, 在 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这一表达方式中, 麻布和上衣被当作同名称的量。麻布 = 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不论 20 码麻布 = 1 件或 2 件或 x 件上衣, 麻布这个商品每次都与作为同一性质的物, 作为与麻布等同物的不同种商品上衣发生关系, 换句话说, 麻布与上衣在质上等同。

* * *

〈4〉某一个商品 A 与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 B 的这种等同, 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各种各样的, 它们的价值构成它们的统一, 构成它们共同的实体。但是, 商

品 A 通过与另一个商品 B 发生**价值关系**，它自身的价值就显露出来了。假如它自己不是价值，那么它就不可能与另一个作为价值，作为它的**等同物**的商品发生关系。因此，这种关系是它本身**价值的表现**。

〔5〕一个商品 A 例如麻布是怎样和另一个作为与麻布**价值相等**的东西，或作为它的**等价物**的商品 B 例如上衣发生关系的呢？

很简单，答案来自商品价值的性质。只要一个商品是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人类劳动力的单纯物的表现**，物的外壳，也就是说，是**人类劳动一般的凝结**，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商品就是**价值**。同样，煤作为热能材料，只是被煤吸收的**阳光的物的外壳**。

因此，一个商品 A 例如麻布只有作为价值才能与另一个商品 B 例如上衣等同，只要这另一个商品上衣在这种关系中被当作**单纯的价值物**，当作这样一种东西，即它的**唯一的物质由人类劳动组成**，因而它的物体只表明是人类劳动。

〔B〕

〔7〕〔4〕〔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作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一**定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不论 $20 \text{ 码麻布} = 1 \text{ 件上衣}$ ，或 $= 20 \text{ 件上衣}$ ，或 $= x \text{ 件上衣}$ ，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 = 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因而不同种商品

在质上等同是价值关系的实际内容。现在的问题是要考察表现这一内容的形式。

商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尽管它们的物体五光十色，多种多样，都只是同一单位的表现，即在质上等同。这样，我们就得到价值概念，但是商品本身仍旧保持自己日常的自然形式，并没有表现出自己**价值性**的丝毫特征。

[B₁]

一当一个商品例如麻布与别的商品例如上衣发生**价值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关系也就是一个商品**自己**同另一个商品的关系。（刚才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然而，商品语言也有多种多样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A与价值通过商品A表现出来的不同种商品B的价值等同关系是**商品A自己**的关系，罗曼语的动词Valer, valoir[值]就比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确切得多。作为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麻布已经通过浆硬的物体在感觉上与使用物品上衣区别开。但是，作为**商品**，麻布不仅是使用物品，商品体，而且同时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不见的东西，即**价值**。麻布与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上衣发生关系，把上衣当作与**麻布等同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中上衣没有事先询问就成为与麻布在质上等同，这样麻布就把自己的**价值存在**表现出来了。麻布在上衣身上认出了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

[B₂]

一当一个商品例如麻布与别的商品例如上衣发生**价值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一关系是**麻布自己**对别的商品的关系，作为**使用价值**，麻布已经由浆硬的物体与使用价值上衣区别开。但是，它是商品，因而它不仅是一个物质上普通的使用物品，商品体，而且

是一个较高级的看不见的东西——**价值**，它与一个不同种的东西，从而与麻布在感觉上不同的商品上衣发生关系，把上衣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中，上衣没有事先询问就成为与麻布在**质上等同**，这样，麻布就把自己的**价值存在**表现出来了。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了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麻布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由麻布商品通过它同上衣的关系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然而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各种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与商品 B 的等同关系是商品 A 自己的价值关系，德文 Wertsein [价值，价值存在] 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 Valere, Valer, Valoir [值] 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

* * *

[8] 2, 5 在价值关系中，即当麻布与别的商品交往时，麻布的价值就得到了一个与它的使用对象性不同的表现。但这是怎样得到的呢？通过麻布表现为**上衣等同物**而得到的，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

但是上衣，商品体上衣，只是使用价值。可见，麻布的价值是通过它的对立面，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而且是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然而，上衣这个使用价值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同一件上衣在同麻布的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象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这种物体是“**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麻布所以把上衣这个物体当作**麻布等同物**，是因为并且只是因为上衣是**价值体**。

现在事实表明，麻布所以通过表现为上衣等同物而把自己的

价值存在充分地表现出来，只是由于它自身的价值表现在使用价值上衣上。

作为价值，麻布只是由耗费了的人类劳动力构成，因而形成一种透明的结晶的劳动凝结物。但在事实上，这种结晶是非常混浊的。只要是在其中发现劳动——而并非每个商品体上都表现出劳动的痕迹——，那它就不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是织、纺等等，它们也决不是构成商品的唯一实体，而是与自然物质结合在一起。为了使麻布作为麻布生产中耗费的人类劳动力的单纯物的表现，必须把它实际上构成物的一切都撇开。本身是抽象的、没有其他的质和内容的人类劳动一般的对象性，必然是抽象的对象性，是观念的物。这样，亚麻织物就成为头脑的织物。

麻布这种商品没有那样的头脑，它以另外的方式行事，以便表明劳动是何种类型，自己的价值由什么构成。麻布把上衣当作自己质的等同物，当作价值物，这就使上衣包含的劳动与麻布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共同性质，即人类劳动一般。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也和缝毫无区别，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

然而，麻布与上衣的等同关系把包含在麻布价值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性质表现出来，还是不够的。人类劳动或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

那么，哪一种形式才是麻布价值的物化形式呢？上衣形式。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个物体被看作是价值体，它的自然形式即上衣形式被看作是价值形式。麻布作为使用物不同于上衣。相反，作为价值则相同。但是事实上，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表现在上衣上，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A看来，陛下不具有B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

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A就不会把 B 当作陛下。

[9] 3 , 6 在麻布与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同时既是普通的商品体又是幽灵体，抽象人类劳动的蛹化，因而在这种关系中，有意义的既不是上衣的毛质的舒适，不是上衣的时髦，也不是某个人闻到了上衣的神圣气味，不是别的什么能把上衣装饰成使用价值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有用本领。与麻布不同的每一种别的商品体都能毫无损害地取代上衣的位置，例如铁、小麦、臭树胶、大粪。

可见，麻布通过把上衣作为自己的价值等同物或等价物，获得了一种同自己的自然形式分开的价值形式。一方面，这种关系表现了构成麻布价值实体的抽象人类劳动性质，另一方面，这一价值实体具有物化的形式。麻布价值作为上衣等同物在感觉上与麻布物体形成鲜明的对照。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 B 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 A 的价值形式，成了反映商品 A 的价值的镜子。（注 18^a，与人有关）商品 A 同作为具体化的价值，即同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 B 发生关系，就使别的商品体成为表现 A 自己价值的材料。在一个不同种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就获得了相对价值的形式。

[A]

[11] 7 (b) 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多少舍费耳小麦、多少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 A 和商品 B 的价值关系中，商品 B 不仅被看作在质上与商品 A 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等价物被看作同一定量的商品 A 如 20 码麻布相等。

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或 20 码麻布值 1 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 件上衣和 20 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

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 20 码麻布和 1 件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B]

(b) 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的量。如多少舍费耳小麦，多少磅咖啡等等。商品量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商品不只是作为**价值**，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或作为**价值量**表现出来的。

< 7 > (第 767—768 页)。① (+ +)

因而，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或 20 码麻布值 1 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是在等量的劳动时间里生产出来的。但是，随着各种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各自商品量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发生变化。现在，我们以麻布为例来考察这种变化对商品**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紧接) < 6 (I — IV) ② >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

① 参看上书，第 756 页末段—757 页首段。

② (I — IV) 指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对相对价值的影响的四种情况，参看上书，第 22—23 页。

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

注 17

[A].

[12] 8 § 3. 等价形式

(a) 直接可交换性的形式

< 8 > (第 768^⑬ 页, < 8 >)

< 9 > (第 768 页, ^⑭ 第 769 页^⑮) 如果某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形式,那么,这根本没有表明上衣与麻布交换的比例。

[A₁]

由于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麻布表现为等价物。——因而这是和这种价值形式无关的规定。[^⑯ 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和商品价值量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自己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例如,一方面,就价值来说,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加尼耳(注: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直到麦克劳德等人就有这样的错觉;另一方面,就价值量来说,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就有这样的错觉。

^⑬ 参看上书,第 757—758 页。

^⑭ 参看上书,第 758 页。

^⑮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这里起用红笔划了这个符号,并在页边上划了一条红竖线,直到本段末尾,表示这段话的重要性。

[A₂]

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上衣的价值量总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和它的价值形式无关。但是一当上衣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当作**使用价值的一定量**。

[A₃]

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麻布与上衣互相交换的比例保持不变，因而，它们各自由生产中的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价值量，是与价值形式无关的规定。

价值相对地被表现出来的商品，总是表现为**价值量**，相反，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从不当作**价值量**，而始终只是当作使用价值的一定量。

[A₁']

如果一个商品的价值相对地被表现出来，那么它的价值量也被表现出来，因为它是作为价值量要被表现的一定的商品量出现在价值等式中的。充当等价物的商品则相反，它从不表现为价值量，而只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例如，在**20 码麻布值 1 件上衣，或值 2 件上衣，或值 x 件上衣**这样的表现中，20 码麻布值多少多少，或者说表现为一定量的**价值**，但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 1 件或 2 件或 x 件上衣上，也就是表现在**使用物品上衣的量**上。因为上衣在这里当作等价物，也就是说，上衣在它的**使用价值形式**中

被看作是**价值体**，所以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也就足以表现别的商品的价值量。（注：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是当作**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对这一事实的非常肤浅的了解，使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

因而，在商品的等价形式中，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A₂']

例如，40 码麻布**值**什么呢？2 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与麻布相对立时是充当**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麻布的一定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 40 码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件上衣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以某物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出现，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

其实，在商品的等价形式中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 * *

向等价形式的特点过渡

等价形式所包含的矛盾，使我们有必要更详细地考察一下等价形式的特点。

[B]

[21] (3) 等价形式

[B₁]

(a) 我们说过，当商品 A (麻布) 通过不同种商品 B (上衣) 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 B 取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当麻布自身表现为与上衣**等同的东西**时，它就表现出它具有**价值**，正如我们说过的，在这一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充当**价值体**，与麻布等同，能够代替麻布，并能与麻布**交换**，是**同一单位**即

人类劳动力的表现。

结论：因此，通过上衣能与麻布直接交换，麻布表现出它自身具有价值，具有等同性，从而具有可交换性。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一个商品获得这种形式，只是由于另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这个商品表现出来，因而只是由于这个商品在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中的地位。

(b)这样，正如我们说过的，对麻布来说，上衣这个物体成为价值体，或者说，上衣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

· [B₂]

(第 768 页^⑥) < 8 > 我们说过，当商品 A (麻布) 通过不同种商品 B (上衣) 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 B 取得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麻布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性质，是通过另一个商品上衣本身在其自然形式中与麻布**等同**这样一种关系。这样，麻布表现出它自身具有价值，实际上是通过另一个商品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⑦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只有当另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这个商品表现出来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它在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中的地位，一个商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这段话放在 < 8 > 的结尾。

[A]

[9] 3 < 6 > **等价形式。第一个特点**

(第 770 页^⑧ < + + + > I) 和 (第 774 页) (775 页)^⑨

[A₁]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量**是铁和塔糖的物的属性，相反，麻布

^⑥ 参看《资本论》德文第 1 版第 1 卷中译本第 757—758 页。

^⑦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这里起用红笔划了这个符号。

^⑧ 参看《资本论》德文第 1 版第 1 卷中译本第 759—760 页。

^⑨ 参看上书，第 764—766 页。

和上衣或者说所有商品体的**价值性质**则是**社会的印记**，因而，它在价值关系中成为商品的物的属性。这种转换出现在商品的**等价形式**中比出现在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确当，虽然它说明了两种形式的特性。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明显地是以它同另一个商品的关系为媒介的。这种形式把商品体的**价值存在**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存在及其物的属性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这种形式说明，**价值关系**本身只能是一个隐藏在它后面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等价形式**却相反。

当然，一个商品所以起等价物的作用，只是由于而且仅仅由于另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这个商品表现出来。商品的等价形式由这种关系产生，也只存在于这种关系中，并因此以这种关系为媒介。同样，一个老太婆的巫婆的性质也只存在于迷信的农民同她的关系中。但是，对农民来说，老太婆所以被看作是巫婆，只是因为她似乎没有农民的帮助就具有了这一性质。同样，商品例如上衣所以是另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只是因为它似乎没有麻布的帮助就具有了这一性质。上衣所以获得等价物的形式，只是因为麻布使上衣成为反映麻布自身价值的镜子。麻布通过上衣来反映自身的价值，似乎是因为上衣天然就是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由此得出

[A₂]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这个物体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一种纯粹社会印记的性质。一种商品体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感觉存在和物的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20码麻布与1件上衣等同，因此，这一相对价值形式表明，商品体的**价值关系**表现为一种隐藏在它后面的**社会关系**。**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这种物本身直接表

现价值。

[10] 4 < 7 > 当然，只是在别个商品例如麻布与商品上衣的价值关系中，才是这样。（注 21，第 23 页）^{②③}但是，既然一物的一定的物体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一属性发生作用——产生，而是相反，这种关系只是使存在的属性表现出来，上衣就似乎与价值关系无关而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象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为他的短浅的实用目光所注意。他丝毫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 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就已经包含了等价形式的谜。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错误地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

[B]

等价形式。第一个特点

< + + + > I (第 770 页)^④ 和 (第 774、775 页)^⑤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这个物体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東西。

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相同的东西，这个形式说明这一表现隐藏着某种社会关系。

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象上衣这样的物体，这

^{②③} 参看上书，第 31 页。

^{④⑤} 参看上书，第 759—760 页。

^{⑥⑦} 参看上书，第 764—766 页。

种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当然，只是在另一个商品例如麻布把商品上衣当作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才是这样。（注 21，第 23 页）^{②③}但是，既然一物的物体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象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时，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这时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他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 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决。

〔13〕价值形式 第二个特点

（第 770、771 页）^{②④}

在价值表现中，等价物这一商品体总是被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方式在这里就只用来表现抽象人类劳动。例如，如果上衣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那么，在上衣内实际地实现的缝劳动也就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形式。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缝劳动的有用性不在于造了衣服，从而造了人，而在于造了一种物体，使人们看出它是价值，因而是与物化在麻布价值内的劳动毫无区别的那种劳动的凝结。要造这样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缝劳动本身就必须只是反映它作为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属性。

缝的形式同织的形式一样，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二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在价值的生产上，就可以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并不神秘。但是在商

^{②③} 参看上书，第 31 页。

^{②④} 参看上书，第 760—761 页。

品的价值表现上事情却反过来了。例如，为了表明织不只是在它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动，即实现抽象人类劳动的明确形式，与织相对立。这样，缝劳动本身就转化为它的抽象属性的单纯表现。

[A]

第三个特点。等等(第 771、772 页)②

因此，只要私人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形式**，即具有与其他劳动产品等同的**形式**，从而能与其他劳动产品交换，那么它就只有**社会形式**。一当一个劳动产品在另一个劳动产品的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因而它的物体形式**同时**是价值形式，是能与另一个商品交换或等同的形式，那么，这个劳动产品就具有**直接的社会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包含在**等价物**中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是人类劳动一般的实现形式，因此它具有同另一种劳动**相等和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

[B]

[21](第 772 页)③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也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第 772 页)④ <±> 和第 771 页 <+>

② 参看上书，第 761—762 页。

③ 参看上书，第 762 页。

④ 参看上书，第 761—762 页。

[A]

[13] §(4) 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简单价值形式,那么首先就得出,**交换价值**只是质和量一定的商品价值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但这种表现方式由**商品价值**本身的**本性**产生。只要两种商品是人类劳动的结晶,那么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与一个作为自己等同物的不同种商品发生关系,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价值量。

[B]

[14] 价值形式等等 第775、776页^② <§4>

注24, 第34页

§(4) 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

* * *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

^② 参看上书,第762页。

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22^a第二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加尼耳(注：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之流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实际地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苏格兰人麦克劳德，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的杂乱的经济学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的一个成功的综合。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A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表现价值的商品B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一旦劳动产品的价值取得**交换价值**的形式，即与它的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相对立的形式，从而表现为这种对立的**统一体**，它就取得了**商品形式**。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某种与它不同的商品B上，只是使商品A的价值同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A同某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A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15]然而简单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简单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一样。（第777页^②，4）随着同一种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可能它有的价值表现的数目，只受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未完待续）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2部分第6卷

（裘挹红译 张钟朴校）

^② 参看上书，第768页。

关于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

张 钟 朴

198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第Ⅱ部分第6卷,在发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原文的同时,新发表了马克思的一个手稿。这个手稿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一章(即目前流行的《资本论》版本中的第一篇)的正文所作的修改和补充。新华社驻柏林记者曾作过报道,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兴趣。手稿总篇幅译成中文约四万五千字左右。虽然手稿的结尾部分已涉及对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修改,但只是列了一些页码。而在手稿中占最大篇幅的是关于价值形式问题的反复修改和论述;其次,是关于价值实体、价值量、商品拜物教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等部分的修改手稿。这个手稿是反映马克思不断完善《资本论》中价值理论的重要文献,对我们学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重要参考价值。下面根据有关资料,对这个手稿的写作背景和它的理论意义作一简要介绍。

根据原文版编者的说明,这个手稿的原件保存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馆里。原手稿无标题,也没有从头至尾的贯通全手稿的页码,没有写作日期。现有的标题、页码和写作日期,都是编者经过考证加上的,因此都放在四角括号内。原手稿包括七个对折页(每个对折页为四个书写页)六个单页(每个单页为正反两个书写页)和一个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单页(正反两个书写页)。因此,编者按书写页的顺序编了[1]—[42]的页码。另外,还有两张纸片贴在第[30]和[32]页上,分别被编为[30a]和[32a]页。马克思的手稿是对《资本论》第一版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写的一些

片断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因此内容是不连贯的。有的手稿段落前加了页码并划上“+”号，表示是对第一版中某一页某一段内容的修改或补充，有的则单纯标了阿拉伯数字，而且有的标了几次数字。这说明马克思曾多次整理过这个手稿，最后一次是用红笔标的数字和符号（译文中用尖括号〈〉标出）。编者断定，这个手稿不是《资本论》第二版的最后定稿，而是第二版修改和补充的预备稿。正因如此，可以从中看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看出对一些重要理论的反复思考过程，因而更显得珍贵。

至于手稿的写作时间，编者是根据马克思及其亲属的一些信件和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推断出来的。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包含有关于价值形式问题的两种论述，即除第一章正文中的论述以外，马克思听从恩格斯和库格曼的意见，又写了一个较为通俗的讲义式的论述，作为“附录”放在书后。这种双重的论述本身就要求在第二版中加以改写，使之合并在一起。^①因此，马克思一直打算修改第一章。当1869年经拉法格介绍由凯累尔开始将《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时，以及1870年俄国的洛帕廷同马克思联系，开始将《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时，马克思都告诉他们，翻译应从第二章（即通行版的第二篇）开始，把第一章暂时空出来，以便他作了修改后再补译。实际上，由于巴黎公社革命以后的形势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频繁活动，还有马克思面临的大量其他事务，直到1871年11月马克思都未能从事修订第一章的工作。当尼·丹尼尔逊接替洛帕廷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以后，在1871年年中向马克思索要修订后的第一章时，马克思两次回信都说这项工作尚未进行。如在1871年11月9日致丹尼尔逊的第二封信中，马克思说：“用不着再等待重新修订第一章，因为我最近几个月来忙得很……，根本不能从事理论工作。”^②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9页。另一封信马克思1871年6月13日致丹尼尔逊的信见同上书第316页。

1871年11月28日出版商迈斯纳写信通知马克思,说《资本论》第一版已经缺售,要求马克思在短期内作好修订工作,尽快出第二版。大概在此之后,马克思才开始着手修订第一章的工作。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1871年12月21—22日致库格曼夫妇的信中告知,马克思当时正抓紧时间修订他的书的第一章,以便出第二版。^③后来,马克思在1872年5月28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件事:“很遗憾,我实在(确实是这样)不能在1871年12月底以前着手准备第二版。这本来对俄文本是很有好处的。”^④根据这些材料,编者断定1871年12月是本手稿开始写作的日期。而在1872年1月22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致库格曼的信中又说,马克思已经把一半以上的书稿寄给迈斯纳,其中第一章作了重大的修改。^⑤因此,编者把本手稿写作的结束期定在1872年1月。编者认为马克思是在这个预备性手稿的基础上,最后写成定稿寄给出版商的。这些就是编者在标题后面的圆括号内所加的写作日期的依据。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不同的问题写了许多不同的修改方案,有的方案虽总的轮廓相同,但其中局部的论述不同,而且这些方案分布在不同的页上。编者在发表这些手稿时,把这些手稿整理过了。他们把论述同类问题的手稿片断放在一起,按写作先后的顺序分别标上[A]、[B]、[C]等字母。如果同一方案总的內容相同,只有局部论述不同,则标以[A₁]、[A₂]等符号。局部论述有所发展的,则标以[A'₁]、[A'₂]等。因此,发表出来的手稿顺序不是原来手稿的写作顺序,而是按《资本论》的理论顺序编排的。根据编者的考证,在原来写作这个手稿时,马克思最先写的是价值形式问题。然后才是价值实体、价值量和劳动二重性等问题。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修订第一章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关于价值形式的两种论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第2部分第6卷第7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24页。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第2部分第6卷第734页。

述合并到一起。大概正是由于修改价值形式的论述所取得的成果，才促使马克思进一步修改其他问题。

如果把本手稿同《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有关正文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手稿中较为成熟的理论论述已经被吸收到了第二版的正文中，并且一直保留到目前通行的《资本论》版本即第四版中。但在吸收到正文中的时候，个别词句和文字往往又进一步作了修改，所以和手稿中的论述又不完全一样。这说明马克思在以这个手稿为基础写成《资本论》第二版的定稿时，又进行了加工。我们知道，《资本论》译成法文版的工作是紧随在德文第二版之后进行的。通常的情况是，马克思把出版社分批寄来的德文第二版清样交给法译者约·鲁瓦进行翻译，然后自己再认真校订译稿并作出新的修改。但是，把本手稿和《资本论》法文版的前三章加以对照则发现，手稿中有的论述没有吸收到德文第二版中，却吸收到了法文版中。以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的编者认为，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法文版的前几章不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清样翻译的，因为鲁瓦在1872年1月翻译这几章时，还不可能印出清样来。而马克思这时已把第二版付排稿寄给了出版商，手中只有这个预备性手稿保留下来。这样，这个手稿又成了法文版前几章的基础，并且造成了法文版吸收的内容和德文第二版吸收的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情况。^⑥当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下面，我们概述一下手稿反映的理论成就。

应当看到，促使马克思对第一版的理论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内在原因，如存在关于价值形式的两种论述等等之外，还存在着外在的原因。《资本论》第一版出版之后，马克思的朋友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一方面欢呼马克思取得的伟大理论成就，努力设法把《资本论》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象库格曼、李卜克内西等人也向马克思提出，书中商品和价值的分析很难理解。马克思当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设法改进。而资

^⑥ 参看上书，第734—735页。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方面,在对《资本论》实行沉默抵制之后,接着几乎都集中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如1868年《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号上的一篇匿名书评就说什么,否定劳动价值论“是同马克思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唯一任务。这是因为,如果容忍这一公理,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以极严密的逻辑所展开的几乎全部结论”。^⑦他们或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古老的李嘉图的教理”等同起来,或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说成是什么“思辨的产物”。他们还把马克思的方法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混淆起来,把马克思的分析说成是唯心论,如欧·杜林的书评就是这样。^⑧敌对营垒的这些攻击,无疑也是促使马克思把他的理论修订得更严密更完善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对他所进行的修改作了概括的说明。关于第一篇前三章的修改,马克思写道:“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⑨本手稿具体反映了马克思进行上述修改的努力和经过。

从本手稿和第二版的正文来看,马克思的修改使得关于商品和价值的论述更加严密而科学了,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加强了正面的阐述。为了反击论敌说他的价值理论只有思辨性质,他强调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为了分清他的价值理论

⑦ 《〈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4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

⑧ 参看上书,第207—20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页。

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之间的原则区别，他强调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修改和补充了第一版中从分析交换价值等式得出价值和价值实体的抽象过程各论点。关于“价值实体”，第一版中说，商品的“价值存在构成它们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产生于自然界，而是产生于社会。这个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只是得到不同表现的共同社会实体就是劳动。作为价值，商品无非是结晶的劳动”，接着还指出这种劳动是“简单平均劳动”。^⑩ 马克思显然认为这段论述不够充分和精确，在本手稿中首先针对这段话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对价值实体提出了确切的规定，指出商品交换关系的特点在于抽掉使用价值。而随着劳动产品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因此，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抽象人类劳动”。后来马克思把这些论述吸收到了第二版中。^⑪ 关于形成价值的是社会平均劳动，马克思也作了重要补充。他在手稿中指出抽象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个人的人类劳动力只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起作用。这个思想在第二版中被写成：“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⑫

马克思的修改突出了价值存在的客观性。在第一版中讲到价值时有一段话说，“本身是抽象的、没有其他的质和内容的人类劳动的对象性，必然是抽象的对象性，是观念的物”。^⑬ 在第二版中，这段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话都被取消了，因为这类的话容易引起误解，使人怀疑价值的客观性，进而怀疑马克思的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相反，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修改，特别指出了价值对象性和抽象劳动都是劳动特有的社会形式。例如，他指出，在商品同商品的关系之

^⑩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译本，198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12页。

^⑪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51页。

^⑫ 同上书，第52页。

^⑬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译本第25页。

外，任何商品都没有价值对象性或作为人类劳动一般的单纯凝结的对象性；商品只是作为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之中）才具有这种社会对象性。^⑭而在价值量的规定中，这一点表现得更明显。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对价值分析的重要补充。

关于劳动二重性问题的论述，第二版中也作出了新的概括，这在本手稿中也可以看出来。为了寻求更精确的叙述，^⑮马克思写出了好几个方案，最后把完善的方案写入了第二版中。在第一版中，马克思概括劳动二重性时说：“在商品中不是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劳动，而是同一劳动看它是同作为它的产品的商品使用价值相联系，还是同作为它的单纯物化表现的商品价值相联系，而得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规定。……劳动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才能算作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从而算作一般人类劳动。”^⑯第二版中收入的修改后的方案则是：“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⑰在这里，“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成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矛盾统一体的共同要素，使这两个概念更具有了现实性。马克思还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特点。而本手稿中的不同方案所反映的正是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逐步成熟的过程。顺便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中论及这个问题时，又成功地把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的论述综合了起来。^⑱

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本手稿反映了马克思把第一版中的两种论述合并到一起的多方面努力和反复进行的尝试。整个来看，马克思尽量改变原来存在的黑格尔式的哲学痕迹，而改成政治经济

^⑭ 同上书，第21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0页。

^⑯ 参看《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第23页。

学的论述。如第一版附录中在价值形式的最后说：“如果我们知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种形式是使任何劳动产品……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的最简单、最不发展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就很容易看出……简单的商品形式，为获得它的完成的形态……即为获得货币形式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形态变化”。^①从第二版起，马克思把分析价值形式的任务改为：“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②从而解决货币之谜。

如果说第一版正文中的价值形式的分析是着重从商品的内在矛盾展开的，那么第一版附录中的论述则偏重从两个商品在交换关系中展开的矛盾进行分析，因而较为通俗易懂。从本手稿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第二版中的修改着重以附录中的论述为基础，使之更加完善。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交换过程中价值表现的两极的展开，叙述了这种发展关系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不仅叙述了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发达的形式，一般价值形式是发展了的形式，他还作了重要的补充，指出价值形式的社会对象性是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步步固定下来的形式。如果说简单的价值形式是一种“胚胎形式”，到了总和的价值形式时，商品所有者间的偶然关系就消失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一般价值形式进行了新的概括，比第一版中的论述丰富和提高了。在一般价值形式中，商品的社会存在表现为现实的东西，表现为社会公认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简单价值形式和扩大的价值形式都是现实的价值形式的预备发展阶段。

总之，马克思的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发展了第一版中的价值理论，比第一版更详细地论证了价值实体、价值量和价值形式的社会

^①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译本第7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页。

性。手稿还表明,在分析价值形式的过程中,马克思感到需要严格地把价值同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在概念上区分清楚,因为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把事情搅得一团混乱,如他们把价值量同相对价值等同起来,把价值同等价物混为一谈等等。这些情况使马克思决心在第二版中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马克思在第一版中曾加过一个脚注:“如果我们以后对‘价值’这个词不作进一步的规定,那就总是指交换价值”。^{①⑨}在第二版中,这个脚注取消了。本手稿也反映了马克思这种认识的成熟过程。手稿中关于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原来写的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在第二版中已改成“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和价值量)”。关于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最初写的是“价值形式”,后来则改成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大大丰富了原来第一版中的论述内容。马克思增加了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的大量正面论述。在本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进行这种补充的努力,例如,他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段话对于揭示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被马克思吸收到了第二版中。

为了说明商品拜物教现象是商品生产特有的现象,马克思用其他的非商品生产的形态来加以对比。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只举了“鲁滨逊的故事”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两种情况,来和商品生产的社会作对比。如果说这两种情况都是为了理论论述的方便而设想出来的、因而缺乏现实感;那么在第二版中马克思增加了欧洲昏暗的中世纪的例子和农民自给自足的家庭内分工这样的实际例子。马克思的这些重要修改在本手稿都有充分的反映。

^{①⑨} 《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译本第12页。

关于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价值尺度的详细修改，本手稿也有充分的反映。马克思经过反复努力，对于金充当价值尺度的这第一个职能作了补充，详细论证了它是为商品世界提供的表现价值的材料。其次，马克思关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这两种职能作了充分论证，指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概念是极为混乱的。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价值尺度的双重化，即实行金银双本位制，是同货币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马克思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金价值的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

总之，马克思这个手稿的发表，对我们加深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很有益处的，有待我们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

〔波〕 奥·兰格

本文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前期的重要论文。他在文中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近代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和长处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他认为，上述两个体系各自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这两种体系的相对优点属于不同的范围，马克思经济学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放在一个首尾一贯的理论中加以研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并不比历史记载更深一层。二、从这两种经济理论中推断出的预测属于不同的时间范围，马克思经济学的预测属于长期，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属于短期。三、近代经济学实质上是静态的经济均衡理论，它分析既定因素系统下的经济过程和运行机制，而对这些既定的因素本身并不作详细的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特色就在于：把对制度因素的详细说明，作为分析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经济均衡理论，还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总之，马克思经济学优越性的真正原因，在于阐述和预测经济发展的过程。——译者

一、在最近一期《京都大学经济评论》上，芝田教授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一般均衡论——吸收了洛桑学派著作中最精确最完善的系统——“在系统地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和它的发展规律两个方面都是徒劳无益的。”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尽管现在看来包含不少缺陷，但这一理论或者试图系统地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以及支配其发展的规律，或者与这些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芝田教授进一步问道：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

的经济学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基本现象的如此有力的工具，而经济均衡的数学理论对此却一筹莫展呢？

的确，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经济学无视自李嘉图时代就开始的整个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采用了那些由来已久的传统概念，它的上述这一优越性就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芝田教授认为，一般均衡论的失败是由于它的复杂性和那种不可能运用于实际问题的高度抽象性。而马克思经济学——与其说它关心参加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个人的心理结构，毋宁说它更关心总量和平均数——更经得起直接实践的检验。所以，芝田教授试图把洛桑学派的均衡体系加以重新陈述并将其简化，以便使之有可能适用于实践。在这一方面，芝田教授已经完成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分析工作，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应对此表示感谢。然而，在我看来，芝田教授还没有触及到证明马克思经济学优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之点。所以，我的目的在于论述：(1)真正的或声称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优越性究竟是什么？以及(2)这一优越性是由于马克思运用的经济概念，还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经济运行构架的制度上的（或者，如果读者愿意的话，社会的）因素的确切而详细的说明。

二、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优越性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完全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解释。这些趋势是：(1)通过大规模生产取代小规模生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了十九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当前垄断的（或者说市场供应垄断的）资本主义；(2)干预主义和“计划”代替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在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转变为高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张，如果通过竞争的方法，这种扩张就自然向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平普及的方向发展；但若在垄断和干预的资本主义情况下，这种扩张就导致了几大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5)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不稳定性增长，由

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感被破坏，致使他们反抗现存的经济制度，——不管这种反抗是以什么思想和纲领作为基础(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趋势，并且无法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中系统地阐述这些问题——这一断言看来确实是有道理的。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一点上的彻底失败是多么引人注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否认这种发展，直到事实变得如此明显，以致于每个人——除了那些专业经济学家，他们总是最晚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对此都非常熟悉。这种生产集中的趋势被忽视，或者，即使承认的话，也不认为它对经济制度的本质会有多大意义。直到基础工业的垄断特征变得如此突出，以致于不得不发展出一种限制竞争的特殊理论来作为正统经济理论的补充。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转变被大抵解释为一桩经济蠢行，而这一转变与自由竞争到垄断控制的转变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认识。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垄断竞争和为垄断控制而进行的争夺之间的关系，而主要是用政治上的术语来解释资本主义势力间的垄断竞争，在20世纪初和1929年前的几年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稳定性正在增长而商业波动却变得越来越不剧烈。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断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能把握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就被证明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否认这些趋势的存在，或者，即使考虑到它们的话，也没能成功地用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比历史的记载更多。另一方面，必须承认，马克思经济学已经正确地预测了这些趋势，并且创建了一个研究这些发展的原因结构并从中揭示其必然性的理论。

然而，这一点也许是有争论的，即：专业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因素的贫乏的理解，并不是他们科学的失败，而毋宁说是个人——由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失败，当然不可

能期待他们欣赏一种能得出中产阶级将在发展过程中被全部消灭这一结论的理论。如果事实就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个“人为的错误”而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这一情况的心理原因是不难解释的。不过,似乎有理由认为,这一失败并不仅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一些“技术性错误”也应包括在内。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想象两个人,其中一个只从奥国学派、帕累托和马歇尔那里学习他的经济学而从未听到过或者看到过马克思的或马克思的追随者的只言片语;与此相反,另一个人则完全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习他的经济学,甚至根本没有发觉还有马克思学派以外的经济学存在。这两个人中哪一个将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呢?提出这一问题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经济学在把握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这仅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在一些问题面前,马克思经济学显得相当无能为力,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能容易地对它们作出解释。马克思经济学对垄断价格能谈些什么呢?对有关货币和信用理论的主要问题它又能谈些什么呢?对分析租税的影响,或者一项技术革新对工资的作用,它提供了些什么工具呢?而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源的最优分配问题能作出什么贡献呢?(这可真叫做命运之神的讽刺!)

很清楚,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关成就属于不同的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放在一个首尾一贯的理论中加以研究,——其发展的必然性正是从这一理论中推导出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并不比历史记载更深一层。另一方面,不妨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能够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日常生活的现象,这比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高出一筹。进一步说,从两种经济理论中推断出的预测涉及到不同的时间范围。如果人们想要预测资本主义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发展,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提供了一个比维塞尔、庞巴维克、帕累托、甚

或马歇尔(尽管这最后一位在这方面是更为优越的)的理论所能提供的更为有效的出发点。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对经营一个中央银行或者预测贴现率变化带来的后果所能提供的依据则是微不足道的。

三、如果现代经济理论的根本特征被恢复,那么,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各自说明的价值之间的区别是容易论证的。经由奥国学派、马歇尔派和洛桑学派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的经济均衡理论,它分析在一定的因素系统下的经济过程以及能使价格和产量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机制。这些因素本身,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技术上的(生产函数),以及组织上的(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货币银行制度等等),则被认为是超出了经济理论的范围。这些因素的研究是记述和统计调查的事情,这些因素中某些变化的研究属于经济史的职责范围。至于在这些因素的变化中是否有“规律”可以发现,这一问题甚至已超出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进一步说,这一理论没有对制度上的因素作具体说明,只要经济均衡理论纯粹是一个关于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分配的理论,就根本无须考虑任何制度上的因素。因为需要考虑的实质性问题能够从鲁滨逊·克鲁索的范例中推导出来。仅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经济学甚至不是一门社会科学。当这一理论考察定价过程时,对有关制度因素的说明是非常一般的。所有被假定的只是一个交换经济的功能所要求存在的机构组织。但是,那种把资本主义从其他商品经济形式中——在那里存在着一个纯粹的不生产阶级——区分出来的超出一般假定以外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几乎是未被考察的。

从对这一附加制度因素的详细说明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类型交换经济的关键特征,这一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的独到之处使马克思经济学独树一帜。马克思经济学的另一特色是(我们将会看到它与第一个特色有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提供了一个经济均衡理论,而且还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对现代资产

阶级经济学来说,经济发展问题不属于经济理论的范围,而是经济史的问题。他们认为,对经济制度因素变化的研究已经超出了经济理论的范围,因为这些变化是来自经济学家们的灵感,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与这一观点相反,马克思经济学进一步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这一论点基础上的,即:某种情况下一定经济因素变化的必然性和范围,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是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中推断出的。至于这一机制是什么,以及这里所说的“必然性”这个术语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里有资格说:因素中主要的变化发生在生产中(一个生产函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结构中才能推断出。这样,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发展的规律”就建立起来了。因此,从马克思理论中推断出的有关未来事件过程的预测就不是一个纯粹经验主义倾向的机械的推断而是建立在对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上的推断,而且,即使非常谨慎也还可以说,它并不比建立在经济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预测缺少说服力,比如,在一定的条件下,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某种商品需求量的下降这类预测。

四、眼光没有超出纯粹静态均衡理论界线的经济学家总是否认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他们过分习惯于把他们理论中纯粹因素的发展作为一种“例外”来看待,这种例外可以被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描述,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被经济理论逻辑所证明。他们的论点一般是:现象是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可能进行理论上的系统说明,也就是被单一的(或少数几个)原则所证明。他们坚持认为:在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只能被历史地描述,而不能被强行纳入一个过于简化(以致错误)的理论模式之中。但是,这一论点是很少具有说服力的。它与那种主张以历史学派来反对静态经济理论可能性的论调非常相似。历史的或纯粹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定价问

题是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用单个的原则(边际效用)来解释,还不如用历史和统计的方法加以叙述,以便充分考虑影响一个商品价格的所有要素。如果这个商品是衣物,那么除了效用,这些要素还应包括:生产费用、稀缺程度、运输费用、进出口商品规模、质量、风土等等。在他们看来,竟然有人主张用单一的原则如边际效用来解释由如此众多的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结果,是多么的奇怪。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经济发展理论原则上是可能的,它也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若以这种观点来看,经济发展理论就要求有超出经济均衡理论所包含的假定以外的附加假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经济均衡理论已包括了这些假定,那它就可以推导出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取代某一种均衡状态。致于从一定原则中得出的关于一定因素变化的必然性的推断,能否被称作经济理论,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一因素的变化正是从作为经济均衡理论基础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中推导出来的。而这一原则被古典经济学家们看作传统上已被认定的经济理论的主干。因此我认为,把一定因素的变化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的这种经济发展理论,可以适当地包括在经济科学之中。

五、我已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优越性的真正原因在于解释和预测了经济发展过程。它不在于马克思所使用的特殊的经济概念,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明确而具体的说明——在这一构架中经济过程不断进行,这样就使得建立一种不同于单纯历史叙述的经济发展理论成为可能。但是,大多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优越性是由于马克思研究时所运用的经济概念,也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论。⁷他们认为,放弃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支持边际效用论,就无法逃避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现象方面那样的失败,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经济意义的考察,就可以容易地看到他们错了。劳动价值论不是别的,正是一般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在一个以分

工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交换经济中，不存在中央当局对生产哪些商品、生产多少的规定，这些问题是通过下述过程自动解决的：竞争推行这样一种不同产业间生产资源的分配，即价格与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成比例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然价格”）。这在本质上与现代经济均衡理论一样都是静态的，因为它仅仅在特定因素的假定条件下来解释价格和产量均衡。（也就是一个给定的劳动总量——比如，对于生产一个商品来说是必要的——是一个由生产的技术确定的量。）因此，也不能说这一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特殊制度假定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均衡理论的基础上的。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而且在任何有自由竞争的交换经济中，它都是适用的。然而确切地说，它真正精确掌握的仅仅是非资本主义的、个人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的小生产者的交换经济。（一个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小自耕农组织的交换经济，例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的那样，由于不同部门间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也就是投入资本中用于支付资本物品部分与支付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同）这一理论就需要作一定的修改。这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劳动价值论就并不具有使之优越于现代更为详尽的经济均衡理论的性质，它仅仅是后者更为原始的形式，受到纯粹竞争狭小范围的限制，甚至在这一范围内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进一步说，它的最有意义的陈述（那就是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加“平均”利润）已被包括在现代经济均衡理论中了。这样，劳动价值论就不能成为马克思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现象方面优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源。事实上，拘泥于经济均衡理论的陈旧形式，恰恰是马克思经济学在许多方面落后的原因。马克思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优越性是由于它对特定的制度因素的精确而详细的说明，正是这一制度因素把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经济中区分了出来。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能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并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理论。

六、如果同时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由于其陈旧的经济均衡理论而造成的缺陷和由于它所拥有的经济发展理论而得到的优点,都将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经济学都不能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劳动价值论——它仅仅能把价值当作均衡价格来解释,(亦即李嘉图所说的“自然价格”)马克思经济学失败了。任何与“自然价格”的背离都或多或少被当作是偶然的,劳动理论对它们说不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中心问题正是一个与均衡背离的问题——这种背离的原因、过程及后果。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不可避免地失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不能有效地解决商业周期问题,这已被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著名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所证明。甚至,这一整本著作都试图在不打算运用数学分析工具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的基本问题。

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没能建立一个首尾一致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它在解决对一个商业周期理论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一组细节方面已经做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如研究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法定货币的不同弹性的作用。而且,它以史无前例的方式阐明了货币和信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但它还不能系统地表述一个完整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这一方面的不成功是它仅仅是作为一种静态的均衡和调整过程理论的直接结果。这种理论能够分析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失衡就必然随之发生一定的调整过程,它还能分析在给定因素的某一变化后发生的调整过程的性质,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失衡有规律地不断发生,因为只有运用经济发展理论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因此,现代经济均衡理论能够说明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信用扩张带来的裨益必然导致崩溃和清算过程。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信用膨胀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与技术革新被当作商业周期的一个原因相似,经济发展理论将证明,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借以发生的形式。

只有通过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才能对导致稳定并反复发生的商业周期的一组因素的“必然”重现问题作出解释。那种认为因素变化问题属于它的范围之外的单纯经济均衡理论只能用两种方式处理商业周期问题：(1)通过非经济力量导致经济因素变化的规律性来寻找商业循环的周期性；比如气象的周期，或者，人的心理状态在乐观悲观之间的不断波动；或者(2)通过否认这种规律性再现的商业周期的存在以及把商业波动看作是从经济理论家的观念中产生出的那些因素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偶然的”，并且因此更多地是经济史所考虑的事情。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理论就只限于把经济均衡理论的原则运用到由经济史学家们收集来的事实材料上去，从而把每一独立的商业波动当作唯一的历史现象来解释。

七、我已经强调了这么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经济学的显著特色是对制度因素的精确而详细的说明，借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简单商品经济即由独立的各自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小生产者组成的交换经济的对立面。制度因素，——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独到之处——其中就有把人划分为两个部分的分配方式：一部分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仅仅拥有劳动力，很明显，只有通过这一制度上的因素，利润和利息才能作为从工资中分离出的一种收入形式出现。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制度在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问题就在于：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定义基础的这一制度因素在经济方面有无意义。大多数的现代经济理论，或者把这种意义当作暗含的前提，或者干脆否认这种意义的存在。一般认为：(作为与简单交换经济不同的)资本主义概念对社会学和经济史或许是重要的，但对经济理论却无关紧要，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过程的性质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的经济过程的性质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这一论点就经济均衡理论而言是完全正确的。那些经济均衡理论的正式的原理对于不同类型的交换经济都是相同的。瓦尔拉斯的均衡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都是不加区别地

可适用的。占有劳动和资本的生產性服务(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是否一样,这当然会影响经济均衡过程的实际结果,但并不影响它在正常理论上的状态。这对于马克思所使用的经济均衡理论即劳动价值论也同样是正确的,它也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只要那里存在着纯粹竞争。马克思本人就反复论证过以下观点,即:在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中,均衡借以维护自身的“价值规律”对于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都是适用的,无论资本主义或“简单商品经济”。马克思甚至首先是为了“简单商品经济”而创立了他的价值理论,而后再说明了如果要把它运用到资本主义经济中去的话,就必须对它进行一些小小的(他的观点中非本质的)修改。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对于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就不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经济学家的一般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制度因素的全部意义乃是以对经济均衡过程所作的社会学的解释为依据的。

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因素的分析在经济发展理论所考察的范围内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对经济过程进行于其中的制度构架作非常确定的假定,经济发展理论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在非常特定的制度因素下,生产技术的的不稳定性这一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才能被证明是必然的。很清楚,在封建社会,或者甚至在一个“简单商品经济”中,我们都看不到它的存在。当然,任何类型的人类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技术进步,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技术进步才被证明是制度生存的必要条件。

八、马克思经济学通过证明只有在发展的经济中,资本家的利润和利息才可能存在这一点,推断出了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必要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利润——资本的利息正是从中瓜分的——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与工人所创造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的费用决定的。由于任何文明社会中的工人都能够生产超过他自身生存所

需的东西，这样他就创造了一个剩余，这个剩余便是雇主利润的基础。马克思理论中关键的论点便是劳动价值论在工资决定中的运用。如果棉布的市场价格超出了它的“自然价格”，资本和劳动就会流入棉布行业，直到，通过棉布供给的增加，它的市场价格与其“自然价格”一致为止。但这一均衡的机制——它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能应用于劳动市场。如果工资上升到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以上，以致有取消雇主利润的危险，那就不存在资本和劳动从其他部门转移到一个对劳动力的需求更为强烈的生产上的可能性，就这一点来看，劳动力根本不同于其它商品。不过，为了说明工资不能超出某一确定的最高界线以致于取消利润，就必须导入一个原理以区别于使市场价格趋向于“自然价格”的普通机制。

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人口理论中发现了这一原理。他们认为人口再生产的本能对生存手段的压力，有效地抑制了工资上升到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以上。李嘉图明确指出：“很多这样的劳动的市场价格会偏离它的自然价格，就象众多的商品一样，它有着一种与它（自然价格）相一致的倾向……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由于高工资对人口增加的刺激，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工资重新又降到它们的自然价格水平。”这样，工人阶级就被假定为处于一种他们自身无法超越的恶性循环之中。马克思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坚持认为，即使没有这样的再生产机制，工资也不会上升到取消利润的程度。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通过技术进步、以机器取代工人，创造出了它特有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过剩人口的存在，阻止了工资上升到吞噬利润的程度。因此，技术进步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必要的。这样就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率的性质。

显然，对这一论点来说，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它在劳动市场上的运用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而作为这一理论基础的均衡机制并不是在劳动市场上发生作用的。阻止工资吞掉利润的是技术进步。（或者，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是“生产规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学从理论的考察中推导出了经济发展为“必然性”。当然，那种事实的“必然性”，即减轻劳动的技术革新在当时通常是有效的，并不能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而且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无法证明。不过马克思经济学并非试图证明它。它所建立的全部内容：如果没有这种革新，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维持自身的存在。有一种经济学提供了这一证据，它证明了资本的利润和利息可以仅仅因为某一特定因素的不稳定性而存在，比如说生产的技术，而一旦进一步的技术进步证明是不可能的，它就必然消失。这里提出的经济思想当然只是有关马克思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概要，以及关于如何完成他的理论以弥补他留下的缺口的一个建议。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创立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理论成为可能。

很明显，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制度因素，正是这一制度因素把资本主义同“简单商品经济”区分开来了。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因素的确切而详细的说明，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因为这样一种理论通常是不可能从有关交换经济的非常一般的假定中发展起来的。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考察，以下这点变得明显起来，即：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并不是交换和定价过程本身的结果，而是这一过程在一个资本主义条件下赖以进行的特殊的制度结构的结果。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对制度因素的描述过于一般，它只不过提供了任何类型的交换经济都具有的制度因素。由于这一描述提供的是过于一般以致无法应用于特殊问题的结论，所以，它通常附加一个有关货币银行制度因素的非常狭窄的特殊说明。（例如，是否存在金本位制，银行系统能否制造一种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信用膨胀）但是，在第一种关于制度因素的描述即非常一般的说明和第二种描述即非常狭窄的附加说明之间，存在着一个缺口，即：把资本主义同“简单商品经济”区分开来的制度因素。而这恰

恰就是那种对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构架的精确而详细的说明，马克思经济学能够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一定的因素从经济制度内部展开。但是马克思理论并没有用这一方法来解释所有因素的变化，正是经济制度结构导致的一定因素的发展，影响了某些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政策、政治和社会思潮等等，而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反作用于经济制度，改变它的其它部分。这一考察解释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垄断竞争的出现等一系列现象。然而，经济因素的发展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制度因素的反作用的因果关系链条并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它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这一理论旨在阐明那种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的因果关系链。但并不能单独用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所有具体事物的充分发展。只有同时运用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能对它们作出解释。后者，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十、我们的结论也许可以总结如下：

1. 马克思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优越性，不是由于马克思所使用的经济概念，而是由于对把资本主义从一般交换经济概念中区分出来的制度因素的确切而详细的说明。

2. 有了对这一制度因素的详细说明，就能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就能推断出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定因素变化的必然趋势。

3. 这一经济发展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发生的实际变化，并且提供了一个预测未来的基础。

原载《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
现代读者出版社英文版

（许彬 译）

关于列宁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等问题的再思考

〔日〕 静 田 均^①

一

1960年2月,我在京都大学学报《经济论丛》第85卷第2号上发表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一文中,曾提到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3篇论文,其中收录了他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要点。对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重要批判,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第7—10章中已提到,可以说,列宁既挖苦又讽刺地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反驳。接着,一阵猛烈炮火,使敌人无喘息的余地,战斗完全以一方胜利而告终。不可否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考茨基一方没有直接地进行反驳。今天重新回首往事,一旦同当代的问题联系起来,冷静地进行反省,恐怕提出某些问题是很难避开的。当然,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否正确,这另当别论。

二

列宁在分析和反驳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规定之后,进而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到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上。他说:“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

^① 静田均是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会研究员。——译者注

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②。

作为抽象理论,说它正确,但又说它荒谬,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缺少具体性的观念理论,过于脱离现实。取代死的抽象的是面对活生生的现实。考茨基是怎样空谈的,我们会立即判明。现在来看一看列宁的基本思想。

列宁引用理·卡尔韦尔对世界经济现状的分析,指出经济和政治条件惊人的多样化,各国发展速度的极不均等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狂暴斗争,阐明了整个世界被划分为数个领域,铁路在近20年间在以怎样的速度铺设以及是怎样分布的。一句话,他从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论。而只要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间的政治和经济的平衡就只能是暂时的状态,不可能具有持久性。“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③

当然,在现实世界,类似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的萌芽也不是绝对没有的。例如,列宁虽然承认国际卡特尔和国际间的资金协调和通融之类情况的存在,但并不情愿。但是列宁对它们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这不能持久地消除国际间的对立和竞争,而只能暂时起到缓和的作用。“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④考茨基则认为,关于帝国主义的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列宁针对这一提法,坚决强调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同战争联系起来。

总之,我们不得不承认,两者的对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理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13页。

③ 同上书,第815页。

④ 同上书,第817页。

解的不同,毕竟是有来由的。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是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更正确地说,是一个同一的存在。这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本身。不过,帝国主义要导致战争,而战争会同革命联系在一起。超帝国主义即继续和平的这种路线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与此相反,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大国政策。政策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应充分认识到,形势的变化会导致政策的改变。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考茨基的这种观点,我们来援引一下他的论文。

考茨基在《帝国主义战争》一文中说:“的确,不理解帝国主义,也就不理解现在的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最明显、最强大的推进力,但不是唯一的推进力。例如,帝国主义具有来自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贯穿帝国主义的是一种努力,即追求超额利润的努力,虽然这一点不单单是帝国主义所具有的特征。这种努力当然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这一点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而消灭,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克服。不过,帝国主义虽然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如果这条道路不通,资本还会另寻一条道路。”他又说:“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必要性,就是说生产并不是如果没有它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有效地进行,因此不如说,帝国主义政策只是从某些资本家阶层的利润意图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阶层越来越强大;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问题就是它的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它取决于国内能从帝国主义获利的阶层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强大到什么程度。……不过帝国主义就其整个本质来说,不仅是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而且也是对外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帝国主义的政策正是实力政策,别无其他。”^⑤

总之,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国际的权力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强国大国的问題,而不是弱国小国的问題。既然帝国主

^⑤ 见《新时代》杂志1917年(第35卷)第1期第475、482页。

义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理性的狡猾,另一方面由于作为反帝势力的无产阶级的成长,就要充分考虑到它有改变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向超帝国主义升华的可能性以及对这一政策的研究,如果不是迂回地进行的,就毫无意义了。可以认为,这就是考茨基的观点的本质。就这一意义来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可以说是一种设想。

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8章的标题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这一章在该书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章。在双重意义上值得注意。第一,关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寄生性问题,被当时大多数人,甚至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而列宁重新强调这一点,就是要唤起世人的注意。第二,不仅如此,他以此为据点,果敢地发起向考茨基的挑战。

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究竟何指呢?其次,导致这些现象的是一些什么原因呢?列宁针对这一问题谈了以下三点。

第一,存在着资本主义垄断阻碍技术进步的趋向。他说:“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么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④虽然他只是举出一个事例,但我认为这类事例必定还有。在今天,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再举出一些更新、更有说服力的实例。私人垄断是有阻碍技术进步的一面,这一点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但是问题的重心在于,它已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怎样理解这一点。

自19世纪70—80年代以来,德国和美国私人垄断的确立和迅猛发展显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宣告了所谓垄断资本主义的到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818页。

来,与此同时,新发现、新发明接踵而来,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作为新工业能源的电力和石油出现了,利用柴油和石油的内燃机车制成了,在钢铁工业中研究出转炉法、平炉法、托马斯法,合成化学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等等。随之而来的是,产业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有人称这种转移为新的产业革命,也有人称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因为它涉及面很广,影响深刻。

这种技术革新同上一代相比有何特色呢?第一,当时进行革新的不是从经验和直感中得出的业余发明家,而是依靠科学,根据足够的理论的知识份子,是他们的发明登上了新的舞台。爱迪生和西门子只不过是证明这一点的两个例子。他们中有些人是技术人员,同时又是企业家、经营家。第二,新技术的完成,从最初起,就已产生了垄断的大企业。无论是机电工业还是化学工业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不投出巨额资本,不大规模地经营,就无法核算。因此,企业的命运在起点上就应当是一个巨大垄断体。第三,这些垄断的大企业,为了改进技术,要进而成立大规模的研究机构,雇用众多的专门技术人员,专心不断设计新产品。所以,能否认为垄断是创造新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原动力呢?另一方面,我提倡这样一种见解——技术的跃进是形成垄断的杠杆。

列宁是怎样考察当时的技术革新的,这一点我虽不好判断,但是不能认为垄断长期以来在全面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我前面引证的那句话后继续说,“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说,“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忽视资本主义的有生气的性格。而“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以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为根据的一根支柱。但是问题在下面一句:“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还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占上风。”⑦

⑦ 同上。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垄断有妨碍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但是能不能说，垄断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全局的东西，而是所谓部分现象、过程中的现象呢？换句话说，垄断是否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必如此重视作为造成寄生性和腐朽的动因的技术停滞呢？

四

造成寄生性和腐朽的第二个动因是对殖民地的剥削。列宁说：“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特别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的事实，也在发生同样的作用。”^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看起来殖民地的意义以至作用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发生变化的。在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具有主要的意义；在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过剩积累的投资领域逐渐增加了重要性。不过这种变化同本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相应的关系。就是说，在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轻工业扮演着主要角色，与此相反，在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金属、机器、化学工业等重工业的比重增加了，产业结构提高了。随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输出越来越增大了它的重要性。

不过，当前的的问题不是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殖民地，而应当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殖民地。列宁在第7章阐明殖民地的意义时，不是从商品输出的角度出发，而是专门从资本输出的角度出发，而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不是使我们在默默之中想起了上述的差异了吗？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只要殖民地吸收宗主国的过剩资本，就会缓和过剩积累和过少投资的矛盾，其次，只要把对殖民地的超额利润的掠夺归还给宗主国，就会阻止利润率下降的趋向。因此，如果承认这些设想，例如承认殖民地能暂时活下去，

^⑧ 同上。

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体制具有增强和延长寿命的效果。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把殖民地的意义单纯地同寄生性和腐朽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就过于片面了。

五

最后，作为寄生性和腐朽的第三个动因，列宁指出了食利者阶层的形成。在股份公司制度盛行时，虚拟资本以至证券资本同实体资本以至职能资本明显地分离了。股票、公司债券的持有人可以依靠红利和利息过活，已经同企业经营本身彻底地分离了。于是这批人成了靠红利生活的人，成了寄生虫。列宁的观点大体上就是如此。但问题果真就此结束了吗？

不言而喻，股东具有二重权利，其一是参与利益分配的权利，其二是出席股东会议参与决策的权利。他们对后者是不关心的，一般来说关心的是满足利益的分配。分配多寡是问题所在，对经营不必费神。这样他们就成了食利者。多数是这类股东。委任投票制和无表决权的出现无非是上述事实的证明。不过最重要的是行使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财产，A公司支配B公司，持有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股份这样的事例，在今天多得数不胜数，而参与这种经营的股东实际上是应当引起重视的。这类股东就不单纯是食利者了。

股份的分配是利润的一部分，实质上等于利息。资本主义越发展，利息率就越低，这是总的趋势。在这个限度内，食利者也许在等待安乐死吧！不过在这里议论要分成两点去说明。第一，不管是股份还是公司债券，证券财产所带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但其中大部分与其说用于消费，毋宁说用来储蓄，过不久用于投资。不过，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是不相吻合的。结果，如果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少同时存在，就会妨碍扩大再生产，阻碍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一旦陷于停滞，就要强行把资本输出国外。这一点是众所公认的。

第二,如果食利者将所得到的大部分利润用于消费,用于享乐,那就会阻碍储蓄,使扩大再生产产生困难,使经济发展停滞。生产力的发展接近边缘,就难于发展再生产。资本主义得了动脉硬化症,等等。不过,这种意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霍布森的寄生帝国主义论的篡改,是随意的发挥。在上述的两种逻辑中,列宁是否总是把重点放在发展自己的观点上呢?老实说,让我作出判断是很难的。不过我相信,列宁太强调寄生性和腐朽了,需要警惕不要陷入对不劳而获的索朴的弹劾论中。

另一方面,是否要考虑以下的情况呢?这就是,随着证券数量的不断增大,它分散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甚至向普通群众普及了。结果,涉及到了中小企业阶层和所谓的劳动阶级,成了他们的第二收入源泉。而这种事态会使他们欢迎这种变革,虽然不至于导致对现状的肯定以至对现体制的拥护,不过即便不如此,也会逐渐形成极其温和或渐进的改良主义趋势。可是我们看到,列宁感到没有必要对这种问题浪费他的精力,而把彻头彻尾脱离生产过程,只顾埋头剪息票的人当成他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食利者阶层的形成不是一国的问题,它在国际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霍布森的观点,列宁不仅注意到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中取回的利润和利息确实已经超过了通过贸易所得到的利润,而且进而得出形成了寄生国家的结论。他说:“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⑥他援引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鲜明地描述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变成了食利国。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霍布森的看法格外重视。因此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对霍布森要多着几笔。

列宁通过巧妙的归纳,把霍布森论述的古代帝国主义的典型

^⑥ 同上。

大罗马帝国的自毁作用归结为两个原因，这就是经济上的寄生性和利用从属民族编成的军队。霍布森说：“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⑩关于第二个原因，他说：“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危险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⑪简单地说，把当地民兵编成军队，用以统治殖民地。

总之，霍布森所说的，就是把当代帝国主义国家比作古代帝国主义国家，他推论前者如踏前辙将导致没落的过程，并进而就瓜分中国和非洲对西欧的影响问题，发表了如下见解：“到那时[分割完毕]，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像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像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⑫

就是说，浮现在霍布森的头脑中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后命运无非是本国生产经济的残废化和畸形化。换句话说，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产业将显著衰退，不再是生产中心，而成为消费中心，靠亚洲和非洲的生产经济寄生。霍布森对未来的描述，可以说使世界局势处于极限的状况。

这是不是对世界历史的讥讽呢？今天的中国彻底地背叛了霍布森的预想。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列强的铁锁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现在进行着新的开发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已达高潮，相继在独立。归根到底，虽然霍

^⑩ 霍布森：《帝国主义》1938年第3版第194页。

^⑪ 同上书，第316页。

^⑫ 同上书，第314页。

布森的预想不过是夸大了的幻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霍布森作为警世家的片面性。

六

现在我们再返回到列宁上来。列宁在第10章《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中说：“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⑬这是他本人的概括。不过问题在于，应当怎样去评价呢？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即资本主义越成熟，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越慢，就越强烈具有长期停滞的倾向呢？不，似乎不应这样理解。列宁断言：“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分，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⑭

列宁的这段话意味着什么呢？虽然在这里出现了腐朽化的斑点，但通观全局，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在健壮成长，——这似乎是列宁想说的真意。

我们转换一个方向。大体说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在什么地方表现得最露骨呢？我们马上会想起列宁的如下一句话：“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⑮这里谈到物价高涨和卡

^⑬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

^{⑭⑮} 同上。

特尔的压迫。总之，这是否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和中小企业的没落问题呢？关于前一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取代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出现了相对贫困化的理论，当时工人的经济地位已经有了改善；关于后一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没落论，转向间接从属大资本的理论。

其次，我们进而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在欧洲列强之间正在进行白热化的军备扩张的竞争。随着军备扩张，非生产财政开支是否已经成为国民生活中的沉重负担了呢？如果是肯定的，作为帝国主义的矛盾，列宁所未加暴露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

无论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确尚未出现大批慢性失业，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后期相比，其深刻度是不同的。如果谈到30年代的大批失业、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和危机，一般说来尚无这种实感。不管愿意与否，把资本主义成熟和长期停滞问题提到日程的同时，这个问题对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提供了新的大量兴奋剂。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视野扩大了，而这种扩大对当前这一课题来说也许使人摆脱了离谱的讥讽。我这里所指的是如下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和30年代相比，情况是相当不同的，进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相比就更加不同。因此对列宁的观点的评价，就是在他的追随者之间，其见解也未必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动摇。为了更加慎重起见，我们论证如下：

首先是斯大林的论文，换句话说，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有这样一句话，即尽管资本主义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⑩，而这一命题在现在是否仍然有效？关于这一问题，斯大林的解答如下：“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

^⑩ 同上。

的新条件，……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①⑦}。关于列宁的命题是否适用于今天的这场争论始于1951年11月的讨论，斯大林的解答，作为苏联的权威解释，成为这场争论的最后一言。

但是，斯大林逝世后所刮起的一阵旋风采取了批判斯大林的形式，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得十分清楚。他驳斥了斯大林的见解，重新证明列宁的这一论题的正确。他说：“应当说，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意味着完全停滞，意味着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停止，这种想法始终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不相容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总的腐朽趋向并不排除技术进步或者在某一个时期内出现生产增长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的学说采取简单的看法”。

在斯大林看来，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经济范围的缩小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的狭隘化，而赫鲁晓夫认为，技术革新会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加倍的效果。不过他们二人都缺少精确的论证，其断言的命题都带有神谕的语调。

七

关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问题，列宁多半是根据霍布森的观点，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全面的倾慕。列宁在有关欧洲联邦的可能性问题上冗长地援引霍布森的话后说：“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①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看起来列宁是有保留的赞成，实际上却是加了注释的。他说：“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

^{①⑦}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563页。

^{①⑧} 《列宁选集》第2卷第822页。

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①⑩}这就是说，列宁认为霍布森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这就是，“帝国主义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①①}。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命题成了列宁的信条的核心。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了这样的话。“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造成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①②}显然，这就是所谓的工人贵族理论。不过，其特点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光环赋予了权威性。

列宁认为，工人让帝国主义分裂了，在他们之间加强了机会主义，工人运动暂时衰退了，而这种衰退趋势在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清楚地表现出来。列宁说，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①③}。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证了恩格斯写的好几封信和恩格斯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新版写的序言。最早的信写于1858年，最晚的序言写于1892年，最后的结论是，第一，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第二，一部分无产阶级正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者至少受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

不过，问题的性质不单单是暴露客观的事实。这一点自然要同战术结合起来，而且必须结合起来。他要使工人群众脱离工人贵族和腐败干部的领导，激化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言外之意。同时，用来结成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夺回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权的理论跳板就在这里。

如上所述，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话，是要论证自己学说的正确

^{①⑩} 同上。

^{①①} 同上。

^{①②} 同上书，第824—825页。

^{①③} 同上书，第825页。

性。不过我怀疑,这种企图能否真的获得成功。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从恩格斯晚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92年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援引极为重要的一节。恩格斯说:“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③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恩格斯的话和上述列宁的主张。

如果我们把1915年的论文《第二国际的破产》和1916年的论文《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也包括进来一起去读,找出前后的脉络,指出不同之处,那么要点如下:

第一,恩格斯作为问题提出的是特指由于英国工业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而从占领殖民地中得到的超额利润则另当别论。与此不同,列宁不限于英国,他想到的是帝国主义列强;而且,他不仅把工业垄断当成问题,还把从殖民地流进的超额利润当成问题。不过他强调的是后者。

第二,恩格斯认为,英国在保持工业上的国际优越地位期间,会因此增加超额利润,不过一部分超额利润主要是分给工人阶级的上层份子,广大群众也能沾到一点。这是英国社会运动一般低落的原因。相反列宁认为,英国即便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问题也不会改变。殖民地所产生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装进工人阶级上层的腰包,成了他们囊中之物,而一般工人大众却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在工人贵族和工人群众之间隐藏着一个断层。

第三,恩格斯认为,由于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工业国的急剧发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3页。

展,随着英国失去昔日的霸权,英国工人阶级也将全面地被夺去特权地位。这种变化过不了多久就会使工人左倾,成为使社会主义势力再次活跃的转折点。当时非熟练工人结成的“新工联”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议员的当选,就是这种预兆。而列宁认为,资产阶级虽然把工人贵族当作傀儡,把工人群众拉到自己一边,但在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断层,所以一旦工人群众觉醒,看破事情真相,就必然会离开他们,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战术的要点。

八

在恩格斯和列宁之间虽然存在着若干分歧,但是显然列宁从恩格斯那里吸取了重要指示,因此我们看到列宁试图创出一种外加补充法。如果我们从这种意义出发,那就没有必要拘泥于列宁对恩格斯的解释是否正确。我们宁可大体上容忍两者的不同,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者根据对形势的判断都有更多的恰当性。关于这一点我们援引施莱辛格的见解也许不无裨益。他说:“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利益的只有‘工人贵族’这一列宁的观点是有益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主张的,但尽管利润分配得不平等,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全体居民却都分沾利润这种恩格斯的论断,对明显处于垄断地位的国家来说却是实情。”^②恩格斯从工业出发,通过超额利润,为英国工联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保守性质寻找理由这一见解,对我来说虽然是一个疑问,但我不打算深入研究。让我们保留疑问继续前进吧!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切社会运动的事实上的基础,是出发点。恩格斯年轻时是确信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他在19世纪40年代尖锐地解剖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然而列宁在20世纪初关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何种状况,就是说工资多少,劳动时

^② R·施莱辛格:《马克思,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1950年版第200页。

间多长,失业保险和灾害补偿怎样进行等等状况,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却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这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漏洞呢?

施特恩堡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度享受高生活水平的只有工人阶级的极少数人,只有工人贵族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真实情况是,欧洲大工业国的整个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改善。当然,在各个部门之间,工人的生活水平是有差异的。但是重要的是,这种差异是整个工人阶级一般地说处于改善中的差异。仅这一点来说,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例外。他说:“列宁在他的论述帝国主义的书中尽管发表了许多统计数字,但是却省略了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欧洲大工业国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变动的统计资料,这一点十分明显,而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又说:“的确,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各国的社会对立并不象列宁想像的那样激化了,而是后退了,正是这一事实成了改良主义(列宁把改良主义称为社会的排外的好战主义)不仅受到所谓工人贵族,而且还受到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支持的理由。结果,向列宁及其追随者证明了,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以后,绝大多数工人绝对不可能同他们的领导人相脱离。”^⑤

施特恩堡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击中了要害。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着大量慢性失业这种深刻的问题,而战前却不是这样,所以战前同战后的情况完全不同。而施特恩堡有把战前形势同战后形势同等看待之嫌。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减少了,大批失业固定化了,危机的形势出现了。当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工资而是失业。这一点暂且不论。如果谈到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的形势的判断,那么不应否认在观念的把握和历史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列宁关于实行分裂的教条,在他逝世后依然发挥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他所创立的第三国际长期以来遵循他的遗训献身于同社会民主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两

^⑤ F·施特恩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法庭之前》1951年版第201页。

者相尅的结果,却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自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岁月。人们在今天是否应当重新反省这一期间的历史,就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批判以丰富自己的精神呢?

原载日本京都大学《经济论丛》

第 85 卷第 5 号

(刘焱摘译)

马克思恩格斯和巴·瓦·安年柯夫

〔苏〕H·H·科诺别耶夫斯卡娅 B·A·斯米尔诺娃

一

马克思恩格斯同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先进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相互关系，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思想在这个年代渗入俄国的历史，不止一次地成为历史学和文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同俄国的著名著作家、批评家、普希金著作的俄国第一个科学出版者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已广为人知。这些材料来源于现存的马克思同安年柯夫的通信和安年柯夫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它们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出版。1846 年 12 月 23 日马克思的一封关于蒲鲁东的著名的书信正是写给安年柯夫的。这封信早已成为选入马克思思想宝库的珍品。

19 世纪 40 年代认识马克思或与马克思通信(赫尔岑)的所有活动家中，对马克思个人及其活动评价最客观和最正确的要属安年柯夫。安年柯夫始终把马克思同其他西欧社会思想著名代表人物加以区别。他认为，马克思是“权威的、优秀的和起决定影响的人物”，他是“拉萨尔的老师”和“国际协会的领袖”。^①

在谈到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时，他决不支持巴枯宁，虽然他们是朋友。只是在 1848 年革命初期，正当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之间就革命行动的目的和方法问题展开的政治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安年柯夫曾经对马克思说过一次非善意的话。他终生怀着对马克思的崇敬心情。这

① 《文学回忆录》1960 年莫斯科版第 318、301 页。

在19世纪40年代他致马克思的信以及70年代的回忆和私人通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②

在俄国和苏联的著作中,安年柯夫本人,他的政治观点和他同赫尔岑的分歧,不止一次地遭到人们,其中也包括彼·拉·拉甫罗夫^③和格·瓦·普列汉诺夫^④的严厉的和公正的批评。

无疑,这些批评中的许多意见是公正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不提出关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安年柯夫及其著作的影响问题。

1912年,И·Б·梁赞诺夫首先在《卡尔·马克思和40年代的俄国人》一文中谈到安年柯夫和马克思的相互关系。^⑤

梁赞诺夫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他首先援引了安年柯夫1846—1847年间致马克思的书信并叙述了他们相识的经过。但是,他根据对介绍安年柯夫认识马克思的Γ·М·托尔斯泰^⑥本人不符合实际的成见,对安年柯夫本人及其活动和他同马克思相互来往的经过作了带有偏见的叙述。

“50年代的无聊批评者”,在《俄国通报》和《欧洲通报》上发表“温情脉脉的文章”的“软弱的人”的辩护者,值得怀疑的普希金研究者,科学的普希金学早已把他写的有关普希金的著作变成须要验证的“一大堆材料”,他写的回忆录大有问题,其中只有许多“历史学者才感到兴趣的鸡毛蒜皮的东西”^⑦——梁赞诺夫就是这样绝对地、毫无根据地、主观地评价安年柯夫的。梁赞诺夫把安年柯夫也看作是俄国思想界“爱吃甜食的人”,他利用安年柯夫致马克思的信只不过是作讽刺性的注解。

② 见《安年柯夫在致M·M·斯塔夫列维奇的信中对马克思的评述》,载于《M·M·斯塔夫列维奇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的通信》,1912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352页。

③ 彼·拉甫罗夫:《40年代的俄国旅行者》,载于《事业》1877年第8期。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3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592页。

⑤ 《当代世界》1912年第8—12期。

⑥ 《文学遗产》第49—50期第365—366页。

⑦ Б·瓦·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40年代的俄国人。马克思主义史概论》,1928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86—87页。

梁赞诺夫引导读者作出的结论,30年后Д·О·扎斯拉夫斯基在《关于别林斯基的政治遗嘱问题》一文中提出来了:“安年柯夫读过马克思著作,给马克思写过信,在马克思家里做过客,——但完全不理解马克思,他对马克思来说完全是格格不入的”。^⑧

梁赞诺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判决是有许多理由的,部分理由是安年柯夫本人的言论。他回忆马克思论蒲鲁东的书信给予他的印象时写道:“我承认,当时许多人也和我一样,不相信马克思的揭露性的书信,因为我和多数读者一起被蒲鲁东著作的激奋之情和辩证逻辑迷住了。”^⑨

但是,除了梁赞诺夫和扎斯拉夫斯基所持的观点之外,关于马克思的观点影响安年柯夫的可能性,在苏联著作界还有И·Н·萨库林所持的另一种看法。

萨库林认真分析了《国外来信》、《巴黎书简》,深思熟虑地考察了作者个人情况,并得出结论说,“安年柯夫本人结识马克思,不是单纯由于受了好奇心和虚荣心的影响,而是出于更贴近地考察当时日益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运动的愿望,而马克思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日益引人注目”。^⑩他接着指出,马克思和安年柯夫相互来往的经过的全部事实,“能使人们认为,我们的旅行者给马克思留下非常好的印象”,^⑪而且他了解到,“他面对的不单纯是幅员辽阔的俄国,而是一个对西欧生活的社会现象中有真知灼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一个值得推心置腹的人”。^⑫萨库林没有把揭示马克思对安年柯夫观点的影响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他认为,安年柯夫由于了解1848年革命和19世纪40年代欧洲生活现实,完全可能成为马克思的密友。萨库林写道:“既不是蒲鲁东主义者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安年柯夫,在40年代对《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两位

⑧ 《文学遗产》第55卷第66页。

⑨ 同上书,第306页。

⑩ 萨库林:《俄国文学和社会主义》1924年莫斯科版第1册第251页。

⑪ 同上书,第252页。

⑫ 同上书,第254页。

作者的思想极感兴趣。马克思思想的科学的现实主义和严格的历史主义博得他的好感。”^⑬

虽然马克思和安年柯夫的相互关系尚未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是萨库林的观点是最坚实的,并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著作研究中得到了发展。

В·И·库列绍夫高度评价安年柯夫的作用,把他看作是欧洲哲学、经济学和美学的一切新思想的“熟练的情报员”,他指出,结识马克思使他能够在许多方面提供这样的情报。^⑭

В·С·涅恰耶娃很重视作为《祖国纪事》和《同时代人》的通讯员的安年柯夫。她分析了安年柯夫的《巴黎书简》、1847年他同果戈理的通信、在扎尔茨布龙同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交往、1847年夏天同别林斯基的欧洲之行、安年柯夫在巴黎发生的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进程的作用的辩论(当时别林斯基在巴黎)中所持的立场,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安年柯夫才华出众,他对当时的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了如指掌。还应指出,涅恰耶娃首先注意到安年柯夫在《巴黎书简》中所作的个别判断接近于19世纪40年代末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出的论点。^⑮

1968年Б·Ф·叶戈洛夫的研究成果《巴·瓦·安年柯夫——19世纪40至50年代的著作家和批评家》问世。作者根据对《巴黎书简》的分析,不仅指出了马克思对安年柯夫关于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有影响,而且得出了更为深刻的结论:“人们可以想象,马克思的总的方法论(研究社会运动历史规律把个别事实引入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用一般解释个别)对安年柯夫的思维也产生了某些影响”。^⑯

在本书(《巴黎书简》——译者)中发表安年柯夫的著作和手

^⑬ 同上书,第265页。

^⑭ 库列绍夫:《19世纪(上半期)俄国和西欧的文学联系》1965年莫斯科版第93页。

^⑮ В·С·涅恰耶娃:《维·格·别林斯基。生平和创作(1842—1848)》1967年莫斯科版第373页。

^⑯ 《俄国和斯拉夫语文学著作。第11卷。文艺学》1968年塔尔图版第59—60页。

稿,再次使人们有可能回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对安年柯夫的概念和观念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除了《国外来信》、《巴黎书简》和本书中第一次发表的《游记》、《1848年法国革命札记》和《1848年巴黎的二月和三月》特写以外,马克思和安年柯夫的全部保存下来的书信引人注目。这些书信实际上没有人研究过。^①

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对安年柯夫关于西欧现实的某些方面的观念的影响时,不能直线地对待这个问题和在这位俄国作者的著作中寻找真正的马克思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是直接在安年柯夫观念中表现出来,而是在这位作者对他在欧洲所目睹的那些事件的理解上留下极重要的痕迹。同时还应记住,这些观念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作用下,而且也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例如,安年柯夫的同胞,特别是赫尔岑和巴枯宁对他的影响,是不容争辩的。此外,安年柯夫本人在作出自己的结论和判断时有充分的自主性。19世纪50年代俄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围绕废除农奴制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他的观点中得到反映。

还必须提到的是,在研究当中要注意的是作者对事件和思想的理解,而不是他同这些事件和思想的关系。后者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正是这个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在著作中讨论过,无须赘述。

从该文提出的问题来看,应把安年柯夫的活动分为三个时期来加以考察。

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当时安年柯夫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时安年柯夫是个初出茅庐的著作家,《国外来信》、《游记》(未曾发表)的作者,别林斯基的朋友。

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安年柯夫已是19世

^① 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两封信(1846年12月28日和1847年12月9日)保存了下来;此外,据可靠消息,还有3封信(1846年5月27日、9月和10月初),1846—1847年安年柯夫致马克思的6封信收入《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1867年莫斯科版第127—146页。

纪40年代俄国社会运动和创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不仅是别林斯基的朋友,而且也是赫尔岑和许多西欧主义者的朋友。他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政论作品中优秀著作之一《巴黎书简》的作者,是不准备出版的《1848年法国革命札记》的作者。正是在这些年里,安年柯夫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个人会晤,并和马克思通信。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俄国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在这些年里,安年柯夫积极参加俄国创作运动,写过许多关于俄国当代著作的评论文章、关于俄国作家的出色的研究著作,《亚·谢·普希金传记资料》。《传记资料》收入《普希金全集》学术第一版第一卷。他就是《普希金全集》学术第一版的出版者。

在这些年里,安年柯夫继续保持同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友谊,保持同所有的俄国大作家、特别是屠格涅夫和列·托尔斯泰的友谊;安年柯夫积极为俄国许多主要杂志《同时代人》、《阿泰纳奥斯》、《读者丛书》撰稿。他是至今存在的著作基金会的组织者和筹备者之一。

二

在考察安年柯夫的政治活动的第一个时期时应着重指出,他的关于西欧现实、社会思想和社会过程的观念形成的条件某种程度上是同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世界观形成的条件相同的。自然,这里无论如何不能划等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政治现实和先前的人类思想史的因素的理解,甚至在当时经历的革命民主主义阶段,也无论如何不能同安年柯夫的知识相比。但是,下述事实值得注意。安年柯夫和恩格斯几乎同时都住在同一些国家和城市。1841年夏天,恩格斯离开故乡巴门,游览了瑞士和伦巴第,9月到柏林服兵役。安年柯夫于1840年10月离开俄国,1841年1月到柏林,3月到维也纳,1841年夏天和恩格斯一样,游览了

意大利,1842年到瑞士。

1842年恩格斯去英国,在那里呆到1843年。1843年夏天,安年柯夫也到达那里。

在欧洲安年柯夫和恩格斯经常阅读同一些著作,观看同一些戏剧,欣赏同一些音乐家的演出,而他们对欧洲艺术的这些表现的看法有时也是相同的:他们赞美亨·海涅的诗、称赞格利巴策尔的喜剧、Γ·格律恩和弗·吕凯特的诗作。^⑩

关于他的旅欧的印象,恩格斯为德国和英国的报纸写了随笔、通讯和书信。安年柯夫也写过同一类作品。恩格斯的《乌培河谷的来信》(1839年)从写作手法和结论来看,同安年柯夫《游记》中的关于欧洲城市札记有某些近似之处。

恩格斯和安年柯夫关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见解也有一些相似。恩格斯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中,安年柯夫在《游记》的《柏林》札记中都严厉斥责普鲁士制度。在英国安年柯夫和恩格斯都对深刻的社会矛盾感到吃惊。他们一面指出英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指出贫穷阶级的赤贫化。1842年12月,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他在文中谈到英国失业现象的增长和宪章派,而在1843年5—6月间为《瑞士共和主义者》杂志撰写了《伦敦来信》一文。他在文中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谈到爱尔兰的取消英爱合并运动。安年柯夫在自己的札记《在英国》中报道了爱尔兰贫民的状况和丹·奥康瑙尔领导下的爱尔兰抗议运动的发展。

1843年秋天,恩格斯在为美国报纸《新道德世界》撰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写道:“……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他强调指出上述的每个国家将单独地得出共产主义思想:“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

^⑩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76年莫斯科版第418、420、432页。

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①⑨}

安年柯夫的见解是由另一种立场决定的。但是他也象恩格斯一样，在《国外来信》和《游记》中谈到19世纪40年代初席卷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解放运动的高涨，他把这个运动称为争取在平等和正义的原则上改造社会的运动。^{②⑩}同时，他几乎“按照恩格斯的样子”描述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这一运动的民族特点。^{②⑪}

见解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为安年柯夫是一个细心的和善于思索的观察者，他能够看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差别。同时还应指出一个事实：恩格斯的观点直到1844年并未超出革命民主主义的范围。

但是，关于恩格斯的某些文章，人们有某种理由说，这些文章对安年柯夫的通讯产生了影响。这首先是恩格斯关于谢林的文章。

1841年秋天，恩格斯在柏林大学听谢林的讲座。谢林是19世纪40年代初所谓青年黑格尔派所代表的黑格尔哲学进步的一翼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安年柯夫在讲座开始以前离开了柏林，但他已经知道了准备中的谢林讲演。

恩格斯写了三篇文章批评谢林：《谢林论黑格尔》（1841年12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和两篇匿名文章《谢林和启示》（1842年3月）和《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1842年5月）。他在这三篇文章中把谢林的讲演看成是“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②②}

В·Ф·奥多耶夫斯基把恩格斯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带到俄国。别林斯基小组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В·П·波特金在1843年1月号《祖国纪事》上发表的德国著作简评中摘录了这个

①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576页。

②⑩ 安年柯夫：《巴黎书简》1983年莫斯科版第43、45、73页。

②⑪ 同上书，第45、250、450页。

②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6页。

小册子。^②

也许是安年柯夫的旅伴 M·H·卡特科夫使他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卡特科夫象恩格斯一样,1841年11月15日在柏林大学听过谢林的第一次讲座。无论如何,从安年柯夫12封国外来信中可以看出,安年柯夫已经知道了恩格斯的这三篇著作中的一篇,也就是他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见12封国外来信的第21、23、25注)。

还可以假定,他读过恩格斯的文章:《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841年载于《德意志电讯》和《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1842年7月载于《德国年鉴和艺术年鉴》,署名:奥斯渥特)。波特金为了给《祖国纪事》撰写德国著作简评曾很留心德国刊物,他把恩格斯的后一篇文章用于1843年4月号杂志。所以,有一定理由假定,安年柯夫在显然是回国后写的《汉堡》随笔中所谈的关于“青年德意志”的见解,是受了恩格斯的文章的启发。当然,根据恩格斯和安年柯夫的个别观点的相似就说恩格斯对安年柯夫的第一批国外通讯有直接影响,则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可以假定安年柯夫读过恩格斯的某些政论作品,尤其是他特别注意定期刊物,而定期刊物是《国外来信》的资料来源之一。

分析《国外来信》和《游记》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应当是,1840年至1843年安年柯夫旅居西欧,熟悉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社会思想的基本倾向,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思潮,因而大大开阔了安年柯夫的眼界,同时使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成为一种潜在的可能。

三

1846年安年柯夫再次出国。经过Γ·M·托尔斯泰的介绍,

^② B·舒尔金:《40至70年代俄国合法报刊上的恩格斯》,载于《历史杂志》1940年8月号第25页;并见A·C·尼卡托夫:《1848年的俄国》1949年莫斯科版第17页。

1846年3月安年柯夫开始结识马克思。他们在布鲁塞尔结识了。马克思邀请安年柯夫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会议。在他出席的这次会议上，对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威·魏特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的论点给安年柯夫留下强烈的印象，尤其是马克思的为人使他倾倒，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②④}

马克思和安年柯夫的个人接触继续到1846年4月中旬。马克思把安年柯夫介绍给恩格斯。安年柯夫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巴黎时，马克思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见亨·海涅、奥·艾韦贝克和卡·贝尔奈斯。^{②⑤}1846—1847年安年柯夫和马克思之间经常通信。安年柯夫写信给马克思，报告他在巴黎同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的人相遇的情景，叙说在这些小组中争论的问题。他设法办理马克思委托的一些事情。1846年5月8日，他向布鲁塞尔写信说：“至于艾韦贝克，在这里不论是海尔维格，还是巴枯宁，谁也不知道他的住址，但是我希望很快打听到。近日内我打算去拜会深居简出的贝尔奈斯”。^{②⑥}

1846年6月2日安年柯夫在下面的一封信中向马克思报告说：

“亲爱的马克思公民：

我接到您5月27日的来信，马上通过艾韦贝克给贝尔奈斯寄去140法郎，因为意外的情况妨碍我亲自把钱寄给他。我希望仍有机会去探望沙尔塞利的邻居蒙莫朗西。”^{②⑦}自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交往对安年柯夫的第二批国外通讯、他的兴趣范围和见解的性质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影响。

安年柯夫在《巴黎书简》中描述了处于革命暴风雨前夕的法国首都巴黎的多方面的生活。他作为一个“悠闲的”观察者能够看到法国人民的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情绪。

^{②④} 《文学回忆录》第302—304页。

^{②⑤}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第127—128页。

^{②⑥} 同上书，第128页。

^{②⑦} 同上书，第128—129页。

1847—1848年发表在《同时代人》上的《巴黎书简》成为俄国社会中的引人注目的东西。1847年3月20日波特金在寄往巴黎的信中说道：“……您的信简直是杂志的珍宝；我认识许多人，他们一收到这本新杂志，首先阅读其中的您的信。”^②

这样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1847年3月杂志发行将近两千册。

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使安年柯夫看到了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真正地位，使他结识了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安年柯夫到巴黎后经过马克思的介绍，同一些工人小组，特别是同聚集在《联合会。工人通报》周围的工人建立了联系。^③

1846年5月8日，安年柯夫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不久以前，我出席了《联合会》报工人编辑的会议。他们也交谈和争论，但是他们挤出睡眠时间来沉湎于这样一种智力的享受，而他们编辑的新的一号报纸永远是他们秘密辩论的最终成果”。^④

安年柯夫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出一种明确的认识：研究社会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他凭空臆造的改造社会的方案是实现不了的。因此，应注意安年柯夫对1848年革命前夕流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想法。这些流派也出现在《巴黎书简》中（例如，在第一篇文章中就对埃·卡贝和维·孔西得朗进行了严厉的和毫不留情的批判），由于祖国的西欧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在进行斗争，他在《美妙的十年》中关于这个问题谈得特别明确：“那时的欧洲社会主义还没有立足于实践的 and 科学的土壤，而暂时只是研究它随意描绘的社会生活的未来制度中类似的‘幻想’的东西。尖锐地批判所有经济规章和现存的宗教的信仰和信念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的重要部分，这个批判成为它在社会思想中为自己夺取地盘的方法，因为这个批判使它具有了明显的标志和战斗的性质。

^② 《安年柯夫和他的朋友》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5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3部分第2卷第2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第128页。

而且这种性质是用多么有力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除了蒲鲁东的臭名远扬的感叹：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财产就是盗窃——作者）和裁缝魏特林的颇为著名的格言：“我们享有的只是自由劳动的一种形式——抢劫！”之外，还有当时年轻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其他新的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和震耳欲聋的论题。社会主义的新信徒无须在这些论题上面下功夫。”^①

安年柯夫在评价中强调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体系的空想性质。把安年柯夫的这段回忆同他在那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严厉批判魏特林的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委员会会议的描述加以比较，就能确定安年柯夫根据什么找出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尖酸刻薄的演说的实质在于，煽动民众，但并不给他们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接着，马克思指出，现在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不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那无异于传教士们的空洞而无耻的把戏……”^②

安年柯夫在《巴黎书简》中根据法国生活，法国艺术的经验，指出某一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复杂依存关系。不能排除他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得出这个观点的。

他在《美妙的十年》中回忆同马克思交往的这一时期时写道：“马克思第一个谈到，国家形式，以及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道德、哲学、艺术和科学只不过是人们经济关系的直接产物。”^③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著名的信中恰恰是阐述了这一思想。

没有马克思的影响，安年柯夫关于法国艺术的见解也可能会改变。正如在《国外来信》中一样，法国文学渴望服务于社会利益并

^① 《文学回忆录》第272页。

^② 同上书，第303页。

^③ 同上书，第305页。

迎合社会情绪,现在已不使他窘迫了。他压制自己内心“对艺术性的追求”,认为法国文学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是法国文学的特殊功绩。并且安年柯夫研究了艺术家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家反映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趣味之间的一定依存关系。他以维·雨果和Γ·别尔利奥兹的作品为例阐述了这个论点。

马克思的影响在安年柯夫对待蒲鲁东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蒲鲁东的思想在《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以后在相当可观的人当中赢得了崇信者。1846年11月1日,安年柯夫读了刚出版的蒲鲁东的著作以后,就写信给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信中说:“亲爱的马克思先生,非常抱歉,我几乎一个月没有给您复信。我是那样全神贯注地阅读蒲鲁东的书(《经济矛盾的体系》),以致几乎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全都忽略了。我希望知道您对本书的意见。作者关于神、天命、事实上不存在的那种精神和物质的对抗的思想非常混乱,但经济部分我觉得写得很有份量。从来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清楚地告诉我:文明不能拒绝它依靠分工、机器、竞争等而获得一切东西——这一切都是人类永远要争取到的东西。我看清了事情的恶劣的一面(在蒲鲁东那里,这是很容易的),但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同时又利用它的一个教条来解决困难,所以我不再相信它的药方了……正因如此,我才写信给您,以便弄清他的体系中未被发现的缺陷(如果有这种缺陷的话),总之,弄清您对这本书的意见。老实说,在我看来,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观察了德国哲学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因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④

安年柯夫在这封信中表现出对蒲鲁东的新作的远非单一的态度。7天之后,即1846年11月8日安年柯夫寄自巴黎的第一封信中主要对这本著作作了肯定评价。他只顺便提到“作者的宗教动摇”。

安年柯夫的判断立即得到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波特金11

^④ 《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革命》第130页。

月26日在寄给巴黎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您的几句话给我指出了这本书的全部合理之处，光荣属于作者，他不再是社会学派的青年宣传者，看问题直率、果断。”^⑤

于是，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安年柯夫写了著名的信。这封信引起收信人的思想慌乱。马克思的部分批判，安年柯夫是绝对接受的，1847年1月4日写的第二封巴黎书信就是明证。安年柯夫在这封信中的论点直接同马克思信中的如下一段话相呼应：“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激愤，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⑥

正是马克思信中的这段话以及信中结尾处所谈的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和马克思本人发表文章的计划，安年柯夫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完整地加以引用，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温情批判，在安年柯夫的第五封巴黎书信中得到反映——他对法国写生画的一个纵容资产阶级多愁善感的激情的流派进行了评价。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生产方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必然改变、一定时代的生产形式（包括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内）的历史暂时性等等的论点，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范畴体系的批判，对蒲鲁东否认群众的革

^⑤ 《安年柯夫和他的朋友》第5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7—488页。

命实践活动的批判,在《巴黎书简》中没得到直接反映。但是,这些论点和批判决没有被安年柯夫所忽视。1847年1月6日,他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您对蒲鲁东的著作的意见十分正确,十分鲜明,特别是坚持不脱离现实,因而对我起了真正的鼓舞作用……友好的声音,它使我们回到经济事实和历史事实上去,向我们说明了这些事实的比纯粹范畴和逻辑矛盾的杜撰的发展有意思得多的实际发展。这个友好的声音终于摧毁了脱离生活、历史和真正科学的体系的极端复杂的大厦的基础。这个声音完全值得我们感谢,因为它有治病的疗效。”^⑦

这位俄国政治家面前出现了新问题。他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我承认蒲鲁东对经济进化进行分类是随心所欲的,他用理论压倒实践的方法是毫无根据的,反过来也一样(类似循环论的一种东西,效果不好),但我还不明白,他的著作的部分是否值得重视。他对官方经济学派的某些论点的严厉批判颇有说服力,凡是受到蒲鲁东攻击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些论点的意义。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例如,他对路易·勃朗的学说的攻击,使人产生很深的印象,毫无疑问,将有助于使这一学说永远威信扫地。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书对法国有用,但依我看来,他的贡献还要多。他敢于向那个在自己的革命理想中不超出93年和罗伯斯庇尔体制的民族指出,在国家中居于独特地位的任何政府都是不道德的。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造成了沉默抵制的受害者……因此,我得出结论,蒲鲁东的书虽然对经济思想的一般发展来说没多大意义,但它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倾向的论述仍不失其重要性。”^⑧

接着,安年柯夫请求马克思给他解释共产主义学说某些原理的实质:“事实上,这对我有极重大的意义。”^⑨

^⑦ 《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革命》第142页。

^⑧ 同上书,第142—143页。

^⑨ 同上书,第143页。

在马克思批评以后，与第一封巴黎书信以及1846年11月1日致马克思的信不同，安年柯夫否定了蒲鲁东“寻找财富藉以正确地自我发展的规律”的主张，而他对这位法国政论家的书的“经济部分”已不再觉得“很有份量”了。他仍旧认为，该书的批判部分是蒲鲁东著作的优点。这个意见某种程度上是与马克思的话相吻合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说，他同意蒲鲁东对“社会主义温情”的批判。后来，安年柯夫谈到过蒲鲁东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他无论在《1848年法国革命纪事》还是在已发表的随笔《1848年巴黎的二月和三月》中都指出，蒲鲁东的《人民代表》一书的特点是：“观点新奇，语言有力”，全书“转向对革命的人们、原则和进程本身进行无情的谴责”，按照安年柯夫的意见，这本书同时也是法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乌托邦思想的来源之一。^④

和马克思的通信，使安年柯夫弄清了蒲鲁东与共产主义思想拥护者分歧的实质。在最后一封巴黎书信中，安年柯夫分析了发表在《两大陆评论》上的沙·鲁安达尔的文章《论法国十五年（1830—1845年）以来的精神生产》，^⑤批判了鲁安达尔提出的法国作家政治和经济观点分类法。安年柯夫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法，这个方法反映了马克思对蒲鲁东在法国社会思想中的特殊作用的评价：“……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表达者，这是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⑥

安年柯夫直接借用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折衷主义方法所作的批判，例如，他在分析柏纳尔的《十九世纪的民主》时就是如此。安年柯夫还把这一批评运用于许多要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出版物上，应用于充斥法国和德国的书市和俄国出国旅行者渴望看到的那些小册子和抨击性文章上。

安年柯夫知道马克思在写批评蒲鲁东这本书的著作，该著作

^④ 安年柯夫：《回忆和评论》1877年圣彼得堡版第1部分第319、32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

出版后他急于从马克思那里弄到一本带有亲笔题字的书。我们从1847年11月1日海尔维格致马克思的信中找到了有趣味的证据：“看来，安年柯夫多少有些不愉快，因为你没有把你的书寄给他。如果你有书，就寄给他，让他高兴。”^②

根据1846年12月8日安年柯夫致马克思的信来判断，他没有收到所盼望的书。他怀着某种遗憾的心情给布鲁塞尔方面写信说：“我手头还没有您写的关于蒲鲁东及其学说的小册子，因为据我所知，巴黎唯有的一本是海尔维格的，正在传阅。轮到我看时，我要很仔细地阅读一遍。”^③

后来，安年柯夫在我们都知道的关于蒲鲁东的回忆录中，对蒲鲁东的评价是相当客观的，再也没有达到第一封巴黎书信中所表现的热烈程度。

安年柯夫在《美妙的十年》中对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写给他的信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关于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这本名著，马克思用法文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他对蒲鲁东理论的看法。这封信写得非常好：它以其两个特点超越了写信的时代——一个是对蒲鲁东论点的批判完全预料到了后来对这些论点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另一个是提出了对各国人民的经济史的意义的新观点。马克思第一个指出，国家形式以及各国人民的整个社会生活同他们的道德、哲学、艺术和科学不过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直接结果，并且随着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甚至完全废除。问题在于：要懂得和把握住那些会引起具有如此巨大后果的人们经济关系变革的规律。蒲鲁东把一些经济现象同另一些彼此任意结合的、根据历史的证据根本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之中产生的经济现象对立起来，在蒲鲁东的自相矛盾中，马克思只看到作者的一种倾向：把资产阶级不喜欢的现代经济制度的事实上升为黑格尔的不得罪人的抽象概念，上升为事物本性似乎所固有

^② 同上书，原文版第3部分第2卷第3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革命》，第144—145页。

的规律,使资产阶级的良心得以解脱。根据这一点,他把蒲鲁东斥之为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神学家和小资产者。”^④

上面援引的片断使人毫不怀疑,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和所叙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论点,一定程度上已被马克思的通信者所理解和掌握。他的手稿《1848年法国革命纪事》也证实了这一点。对这篇手稿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在这位俄国著作家对蒲鲁东的评价上有影响,而且在他对当时现实的比较广泛的看法上也有影响。因此应考察一下恩格斯对安年柯夫的《巴黎书简》的影响问题。安年柯夫住在巴黎时,恩格斯也在那里住过。恩格斯从1846年8月15日至1848年1月底被逐出法国首都为止,断断续续地逗留在巴黎。很难设想,在这个时期里他们既然都有同样的熟人(艾韦贝克、贝尔奈斯、萨宗诺夫、海尔维格以及其他入)竟会彼此未曾见过一面。况且,根据1847年5月20日以后贝尔奈斯从萨塞尔寄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信中所间接提到的事情可以断定,这时恩格斯和安年柯夫之间已有了直接的交往。^⑤

安年柯夫可能看到过马克思战友的政论文章。恩格斯当时为巴黎《改革报》、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和《德意志—普鲁士日报》(从1847年9月起马克思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编辑)撰稿。后两种报纸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组织可以收到。安年柯夫完全能够看到,并且能从英文和德文阅读。看来,恩格斯发表在《北极星报》上的《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以及其他文章,对他写作《巴黎书简》有所帮助。

恩格斯关于法国的第一篇文章于1846年9月发表在《北极星报》上,标题是《法国政府和反对派》。该文对由金融生意人组成的新众议院,对由米·德恩威尔针对路特希尔德公司的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和其他事件而在法国刊物展开的争论作了评价。

④ 《文学回忆录》第504—50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3部分第2卷第337页。

两个月以后，安年柯夫于1846年11月4日和波特金同游伦巴第返回巴黎之后，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有趣的是，他写书信所根据的事实正是恩格斯《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一文内容所分析和评价的那些事实（见第一封巴黎书信的第1和第2注）。可以假定，在选择事实方面的这种一致具有偶然性。但是，分析一下安年柯夫下述几封巴黎书信就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

安年柯夫在详细研究前面提到的L·路安德尔的文章《法国十五年（1830—1845）以来的精神生产》时，揭示了七月王朝近15年来国内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安年柯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恩格斯所谈的意见是相呼应的。恩格斯写道：“1830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得完全的统治，这个统治阶级就只有逐渐地走向灭亡。它也正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没有向前进，它不得不后退了，它限制出版自由，取消集会结社的自由，颁布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以便压制工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所揭发的丑闻十分明显地证明，在法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了。”^④

看来，安年柯夫也没有对恩格斯为《北极星报》撰写的文章《法国的改革运动》置之不理。该文的影响，不是出现在《巴黎书简》里，而是在随笔《1848年巴黎的二月和三月》里。这篇随笔恰恰是从详细分析这个运动开始的。安年柯夫对运动性质的解释，同恩格斯的解释和描述是一致的。

阅读恩格斯的文字，可能帮助安年柯夫更深刻理解了整个七月王朝的性质，承认法国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一些社会集团，这一点不只是在《巴黎书简》中，而且在关于资产阶级的争论中都有所反映。这场争论是在1847年8月别林斯基逗留巴黎时由于赫尔岑《马里尼林荫大道来信》的发表而在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小组中发生的，后来在私人通信和《同时代人》上继续进行。这场争论和双方的立场在著作界是非常清楚的。

安年柯夫在《纪事》的头几页上对法国工人和他们的为争取自己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5页。

的权利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作的评述,同恩格斯在《法国的改革运动》一文中对法国工人的评述几乎一字不差:“……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们会立刻出现在大街和广场上,挖断马路,把公共马车、运货马车和载客马车放倒横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⑦

在这个时期,安年柯夫的许多见解同恩格斯的某些观点接近,当然是由总的事件进程,所使用的资料决定的;例如,安年柯夫对有关拥护和反对禁止关税争论的蛊惑性质的见解,接近恩格斯1847年6—10月写的《经济学会议》、《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制度》等文章,而安年柯夫是1847年1月在第二封信中写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仍不应排除恩格斯对安年柯夫的直接影响的事实。

通过全部《巴黎书简》清楚地反映出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安年柯夫特别重视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安年柯夫在第四封信中叙述围绕贸易自由问题的争论时谈到无产阶级的独特立场。他认为两家工人报纸《工场报》和《1845年的博爱》在这场争论中反映出对无产阶级的看法。

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安年柯夫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概念。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回忆别林斯基的精彩片断中清楚地看出来。安年柯夫在回忆中把别林斯基的艰难处境同“欧洲当时的工人和无产者”^⑧的物质状况进行了比较。(待续)

原载《巴黎书简》1933年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版第464—480页
(楚舒译 孙魁校)

⑦ 同上书,第402页。

⑧ 《文学回忆录》第294页。

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

[俄]弗·亚·巴扎罗夫

编者按：巴扎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的中译文，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所着力批评和分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的第一篇文章。《论丛》（曾译《概论》）共刊载7篇论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偶像之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奥·伊·格尔方德的《狄慈根的哲学和现代实证主义》、谢·亚·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已译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其余两篇的译文亦将陆续发表。《论丛》这本文集的译出，对于研究列宁的《唯批》一书是有所裨益的。

一、唯物主义神秘主义或不自觉的神秘主义

这第一章的标题本身就可能使读者费解。什么是“唯物主义神秘主义”？难道唯物主义就其理论原理来说不是和任何神秘主义完全对立的吗？难道唯物主义在它的实际结论中，不是神秘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吗？

和普遍流行的意见相反，我认为，并非如此；我认为，现代神秘主义不只是“主观唯心主义”即那种自己以此命名的哲学派别的危机，而且是其他许多以自己的“客观主义”而自豪并和理论上荒谬、实践上反动的哲学——唯心主义作斗争的派别（但是这些派别没有发现，自己的体系正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以这些偶像为

依据)的危机。

在这些不自觉的神秘主义流派中，最有意思的是那种典型的唯物主义，在俄国著作界它的代表人物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正统派^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②是从如下原理出发的：在构成世界图景或所谓“世界观”时，局限于经验感知的任何哲学，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陷入“唯我论”的无出路的矛盾之中。事实上，经验的一切感知——颜色、声音、气味、形式——都只是我的感觉。这些感知所在的空间，它们在其中相继而发生的时间，也都不是不依赖于我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普列汉诺夫赞同康德的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我的”直观形式。那么，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在经验感知之外的实在，没有任何“自在之物”，显然，在世界上除了“我”和我的主观感受，就不存在别的东西了。在我的主观幻想中宙宇之谜解开了。宇宙随着我的出生而出现，随着我的死亡而逝去。对世界作这种理解，那寻求客观真理就是荒谬的，也不必谈及历史，提出超出我的个人存在界限的某种任务就完全没有意义。自然，普列汉诺夫同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所有不认为世界上有自在之物的哲学家作无情的斗争。如果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不走向唯我论，那么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这就只是证明他们的不彻底性。康德使普列汉诺夫较为满意，但远非完全满意。的确，康德说到“自在之物”，甚至有时提到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但是同时又十分肯定地断言，我们不可能了解自在之物，加给“现象”的一切定义、直观形式、范畴在应用于自在之物上没有任何意义。显然，事实上，有

① 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译者注

② 我在分析普列汉诺夫—正统派的哲学时，将特别依据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正统派使自己的哲学著作比普列汉诺夫的具有更加完整和系统的形式，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体系主要在反对康·施米特的论战性文章中和在给恩格斯论路·费尔巴哈一书所加的注释中得到阐明。然而，在总的信仰方面，与其说正统派，不如说普列汉诺夫是这一学派的首脑。

了这种观点,就不应该谈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康德的自在之物不能使现象世界具有任何实在的基础;其中没有任何与色彩、声音等具体形式相适应的我们的经验,自在之物在空间和时间之外,并且不能和现象发生因果依存关系。普列汉诺夫在这点上补充和修改了康德的哲学。他把以下的论点作为出发点:自在之物或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使我们产生感觉的东西。但是“作用于”、“使产生”——这意味着是原因;从而因果性的范畴适用于自在之物。在对待“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方面,普列汉诺夫已经不表现得那么坚定。在这里他同意康德,认为关于存在于我们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空间和时间的设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拒绝把“自在之物”纳入我们的空间和时间,并且断言,在空间和时间里只应该有与我们的空间和时间相应的某种东西。因此,“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尽管不完全);它们为我们所了解是由于它们在我们中间的表现,它们具有使我们产生感觉的“特性”,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最后,普列汉诺夫极力反对这种说法:“唯物主义企图把一切现象归结为物质的运动”。和这种谰言相反,并且和自在之物的定义相对立,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下面的第二个论点:“感觉和思想、意识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内部状态。”^③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确切地说,是由普列汉诺夫作了唯物主义的修改和补充的康德的观点就是如此。

普列汉诺夫的论敌已指出他的哲学体系中的许多矛盾(例如,见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而普列汉诺夫至今对论敌没有进行反驳,也没有对自己的体系作相应的修改,来排除这些反对意见、再多列出一些这类矛盾并不困难。我们且注意一下刚才列举的论点中的第二个论点:“意识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内

③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单行本第130页。

部状态。”只有在空间才能运动，然而因为物质即“自在之物”不存在于空间，而存在于“和空间相当的某种东西”中，因此显然物质不能运动，而只能完成“和运动相当的某种什么”。康·施米特指出了这类矛盾——对普列汉诺夫的整个体系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施米特写道：“如果认真地承认因果律能作用于自在之物的话，那么，很明白，我们所赖以设想因果关系的那些条件，即是，空间、时间和物质（或力的中心），也应当被认为是属于自在之物的条件。”④

正如普列汉诺夫公正地指出的，如果抛开“物质”或“力的中心”（施米特既没有把它们和村庄、也没有和城市联系上），那在其他方面，这种反对意见确实十分重要，发表了文章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认为反对意见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普列汉诺夫是如何“反驳”施米特的呢。他写道：“说空间与时间是意识的形式，说因此它们的第一个特性是主观性，这在托·霍布斯就已经知道，而且现在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肯否认这点的。⑤ 全部问题在于，物的某些形式或关系是否与意识的这些形式相符合……物的形式和关系不会是我们看起来的那种样子。我们关于物的形式和关系的表象不过像象形文字；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准确标记着这些形式和关系的，而这就足够使我们能研究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我们对它们起作用。”⑥

不幸还在于在这里“象形文字”是十分不够的，施米特恰恰

④ 《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 232 页。

⑤ 我着重强调的这个声明有些冒失。在我们时代这种唯物主义者总是有的。例如，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写道，“他（康德）在时间问题上就自相矛盾。自在之物显然只是在时间上可以作用于我们，然而康德认为时间只是我们直观的主观形式。”我们在这里所引证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同一个格·瓦·普列汉诺夫（《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 172 页）。但是因为在康德那里有可能从非常客观分析矛盾的意义上面说明上面的引语，还因为我在本文中所依据的文章较晚发表，从而反映了普列汉诺夫成熟的哲学体系，因此我认为对这个地方可以不予重视。

⑥ 《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 233、234 页。

指出了这点。事实上，“原因”何在呢？在因果依存性的一切定义中——从最形而上学的定义开始到道地的实证主义的和怀疑主义的定义——肯定有一个共同的要素（没有它因果依存性概念本身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即：原因总是先于后果。但是只有在实现某一事实的同一时间内，原因才可能先于这一事实。显然，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即使这种作用“真是”被当作原因），只是在我们的按照康德-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直观的形式”所构成的时间内才能发生。如果我们的时间只是自在之物存在于其中的“某种东西”的象形文字，那自在之物就不能成为我们感觉的真正的、实在的原因，顶多不过是所谓这个原因的“倒的象形文字”。显然，在这里象形文字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但是，普列汉诺夫反对说：“我说过并且证明过，假使我们不承认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依照因果律），那么我们必然走到主观唯心主义。”^⑦而主观唯心主义必然走向唯我论即走向荒谬。——当然，这是十分可悲的，但是决不证明有利于“象形文字的因果性。”要知道当我们想避开唯我论而躲藏在自在之物的浓荫下，我们指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摆脱矛盾的避难所，而结果从一种矛盾的手掌中落到另一种矛盾的怀抱里。谬论甚至当它用来反对另一种谬论时，也不是论据。

但是，我们且不谈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唯物主义所内含的矛盾。假定说这种唯物主义是一个真正的整体，且看一看它甚至在这一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能把我们从唯我论的黑暗深渊中拯救出来。

为了描绘出唯我论的可怕面貌，普列汉诺夫毫不吝惜涂料。首先我们在冒死于“良心的谴责”的危险，因为我们成了唯我论者，我们要承担于世界上的一切蠢事的责任。普列汉诺夫写道：“且举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假使没有康拉德·施米特先生这一自在之物的存在，假使他仅仅是现象，即是说，仅仅是存在于我的意识中的

^⑦ 《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232页。

表象，那么我就永远不会宽恕我自己，因为我的意识竟产生了一个哲学思维如此笨拙的博士。但是假如我的表象是和真实的康德·施米特先生相符合，那么我就不必为他的逻辑错误承担责任，我的良心也会安静，而在我们的红尘世界这是很重要的。”^②

老实说，我并不很清楚，“自在之物”如何保证普列汉诺夫的良心得到宽慰。在普列汉诺夫的思维 and 施米特两种思维之间，自在之物的差别何在？普列汉诺夫的思想是从自在之物出发并经过普列汉诺夫根据他的感官本性加工的“某种东西”。普列汉诺夫所了解的施米特的思想同样是“某种自在的东西”，它同样经过普列汉诺夫加工，但只是有如下差别：它事先就经过适应施米特的感受器官的加工。普列汉诺夫的感受器官构造得很好，而施米特的则不行。但是，因为这种构造显然不依赖于普列汉诺夫或施米特的意愿，而仍然依赖于“自在之物”，那普列汉诺夫为施米特器官的蹩脚结构承担或不承担责任的程度，和对待他自己的器官的优良结构一样。情况并不比“唯我论的东西”好多少。

但是对世界负责，——这还不是唯我论最坏的特点。要知道，在世界上，除了施米特，还有马克思、黑格尔和许多其他的大人物，在这些大人物面前施米特一流就完全黯然失色了。如果普列汉诺夫不得不对宇宙负责，就象对自己意识的产生负责一样，那良心大概不致于特别折磨普列汉诺夫。要知道在宗教史上至今还没有一个神认为自己担负起创世主的重任，有损于自己的尊严。

主要问题当然不在于承担责任。认为其他人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这里包含着很不恰当的东西：取消了诸如社会活动的全部意义。仍然使人奇怪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怎么能够存在。他们的命运是如此悲惨，这就很自然产生一个疑问：任何唯心主义都是唯我主义，这是真的吗？认为现象是“我的”表象是否排除了其他的“自我”的自身条件？要知道，如果在经验中被感知的现象是我的表象，那同时显然其他“自我”的表象本身也被感知。在康德那

② 《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第199、200页。

里——至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个“自我”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只是作为统一的意识而存在着。但是许多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继续往前走。他们认为“自我”是现象的实在的体现者，是某种绝对稳定的存在，始终如一，但同时又和意识的一切变化有关，意识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之中的每个人身上，印上自己的特点：“我的”。

显然，这个“自我”不是作为表象而存在，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设想另一个代表他及其他人以至无穷尽的“自我”。其次，因为空间和时间只是形式（在其中我观察我的现象），那观察者本身，即我的“自我”本身应该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也就是说，“自我”是不同于作用于我的感官的物的“自在之物”，只是因为它不是在表现中，而是本身直接使我感知到。

我们是否一定要把这个“自我”，即对我们来说内在的“自在之物”当作世界上唯一的物呢？并非如此。我并没有陷于某种逻辑上的矛盾之中，我可以说出许许多多其他的“自我”，他们和我并存于“自在之物”的范畴内，在和我同样的时空中创造每一种和我的观念世界相同的观念世界。不可能具体想象这些世界——单子的总和，——但是，自然，这丝毫不比想象“从外面”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自在之物更加困难。

因此，主观唯心主义绝不会去否定其他的“自我”，而只是宣布它们的存在是无法证实的。主观唯心主义只否定一点，即感知的经验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对其他人来说可以存在，正象它对于我而存在一样。另一个人不可能看到“我”所看到的那棵树，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描绘的自己的印象和“我”所描绘的完全一样，那就说明，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所观察到的物体和“我的”世界的物体一样。

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有什么长处呢？

很遗憾，什么长处也没有！施米特针对普列汉诺夫（象对任何唯心主义者一样）所写的文章被感知为他的表象。“唯物主义”只是

指出，在自在之物领域内存在“某种”和普列汉诺夫的“自我”表象相符合“的东西”。而这“某种东西”是思考、感觉和表现着的施米特的“自我”，和普列汉诺夫的“自我”一样，——关于这一点，“作用于普列汉诺夫的感官的物”丝毫没有对他谈及。对普列汉诺夫（正如对任何唯心主义者）来说，施米特的实在存在本身是无法证实的假想。

使人感兴趣的是他赖以得出这种假想的途径是什么，也就是，在主观唯心主义者那里有些什么东西。在上面的摘引中普列汉诺夫断言，要使他摆脱唯我论的苦恼，只能设想，施米特先生是“自在之物”。至今我们听到的只是关于在我们之外并且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自在之物。现在看来，我们自己即我们“自我”也是自在之物。确实，问题只是涉及到“康·施米特先生”，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普列汉诺夫在把自在之物领域中的一小块地盘让给施米特的“自我”时，他使自己的“自我”失去这种荣誉。很明显，相反，他只是因为并且能够编出这种假想，他早已认为自己的“自我”是自在之物，——否则他就甚至不能产生出施米特的“自我”的存在的假想。因此，无庸置疑，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和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中完全一样，“自我”不是被想象成一种现象、现象的总和、现象之间的联系，——而是被想象成现象的实际代表、自在之物。

只有在现在我们才有可能把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唯物主义论点（“意识是物质的内部状态”即自在之物）归到第一个论点（关于从外面作用于我们的物）中，而不陷于一般矛盾之中。如果不承认“自我”是独立于这种归并之外的自在之物，那倒是十分荒谬的。结论是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引起我们的感觉，这些感觉同时又是物的内部状态。显然，感觉并不是自在之物（从外面引起感觉）的内部状态，而是另一种东西（在其中引起这些^些感觉）即我们的“自我”的内部状态。很清楚，并不在于这种对比，因为感觉不可能是没有个性的自在之物的内部状态。我们都知道，感觉只能存在于构成某个“自我”的主观的直观形式的空间中，——而自在之物，

——因为它本身不是“自我”，因而，不建立自己的空间——总是处于属于每个一定的“自我”的空间之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列汉诺夫的物质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还没有为我们帮什么忙。在关于个体多样性的问题上物质并没有使我们比唯心主义“单子论”前进一步。认为他人的“自我”了解“我的”经验世界的对象，正象我了解他人的“自我”一样，这种思想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完全不相符的；而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个“自我”是独立的、带着“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中的“自己的”观念世界的“自在之物”。

现在我们只好在我们可靠的向导^⑨的领导下，走到唯我论地狱的最底下的最可怕的一层里面去，在这一层里，据普列汉诺夫断言，每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都面临这样的威胁，即必须以鱼龙和始祖鸟的直观形式来想象世界。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地球上只有人类的极遥远的祖先存在的那个时代，如第二纪^⑩。试问：那时候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怎样的呢？那时候它们是谁的主观形式呢？是鱼龙的主观形式吗？那时候是谁的知性把自己的规律加给自然界呢？是始祖鸟的知性吗？康德哲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和现代科学完全不能相容，它应该被抛弃。”^⑪但是，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是否提供了我们所要得到的回答？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按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我们对于物的本来面目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表现，只知道它们对我们感官作用的结果。“除了这个作用，它们没有任何形态。”^⑫在鱼龙时代，有什么样的感官呢？显然，只有鱼龙以及和它类似的动物的感官。那时只有鱼龙的表象才是自在之物的真实的、实在的表

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这段话时注明这是指普列汉诺夫（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78页）。——译者注

⑩ 第二纪是地质年表里的中生代的旧称。——译者注

⑪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列宁在《唯批》中引用了这段话。——译者注

⑫ 同上书，第94页。列宁在《唯批》中引用了这段话。——译者注

现。因此，就按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如果古生物学家愿意站在“实在的”基础上，就应该以鱼龙的直观形式来描写第二纪的历史。因此，和“唯我论”比起来，这里并没有前进一步。

上面我已经谈到，普列汉诺夫的哲学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性，即使是在它消除了主观唯心主义矛盾的情况下，也不能被接受。现在我们都看到，它甚至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它没有消除主观唯心主义的任何一个矛盾，而只是使之加上自己发明的新东西。

但是，人们对我说，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毕竟有健康的、实在论的成分。它认为不能断言思想统治自然界，它完全排除对自在之物的任何宗教解释。是这样吗？

普列汉诺夫把自己的“自在之物”的特点和康德的“自在之物”作一比较，同时指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通过从现象的一切具体特性中抽象出来的途径而得出的。因此，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一种思想，并且是他的包罗万象的抽象中的十分空洞、毫无内容的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残渣(*caput mortuum*)。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普列汉诺夫如何避免这种不幸呢？他是否只是抽象出感性的物表象这种主观的东西的某些特点，同时宣布它们的其余部分是客观的东西——不仅为我们的表象所固有，而且为“自在之物”所固有？例如，把“第一性的”实在的质和“第二性的”主观的质区别开的洛克，就选择了这条确实使宇宙具有某种“实在的”支柱的道路，许多唯物主义者都持这种观点。不，普列汉诺夫同意康德，认为经验世界的一切形式和一切内容都是主观的。他创造了“自在之物”的概念，和康德完全一样，不得不在思想上从一切具体的、感性上所感觉的特性中抽象出来。他只是不使这一作法进行到底，即达到完全消灭“僵死的”抽象中的感性的质。他企图在概念中抓住这一抽象过程本身。感性上所感受的物的特性已经从他的意识中逐渐消失，无论是声音、颜色、气味都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尚未彻底消失，还留下某种痕迹，即“某种”和物的质“相应的东西”。普列汉诺夫正是把这“某种相应的东西”，这种抽象过程中感

性世界消亡时对感性世界的确定的企图当作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可靠支柱。

普列汉诺夫认为具体现象的活生生的形和色是主观的、虚幻的东西，只不过是真实的物的影子。而他却把这种影子的影子、幽灵的幽灵当作真正的实在，当作必须巩固可看见世界存在的自在之物。至于僵死的或正在死亡的思想，抽象的残渣或废品，何者更好，我不打算评判了。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和康德的一样，它用这种或另一种世界观统治着自然界。

这种思想的假的反宗教性质的状况也不妙。

任何神的基本标志是——它能引起一种**神秘**的感觉，即隐秘的感觉，这种感觉同依靠这种隐秘并崇拜它的感觉结合起来。为此有必要使被崇拜者的思想无限高于崇拜者“自我”，并且对于后者的认识来说，被崇拜者的思想是难以揣度的、不可及的。但是，神的绝对无法了解对于我的认识来说意味着神和我是完全隔绝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崇拜的感觉还是依赖的感觉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就有必要使神在**某种程度上**被了解，使它在“我的”经验世界中的表现为我所了解，使我的全部命运依赖于神的这些表现。

普列汉诺夫的体系是否符合宗教创造的这些基本要求呢？毫无疑问，在普列汉诺夫的世界观中并不缺少神秘感。我们知道，对物质实在性的最小的怀疑都使普列汉诺夫陷于最绝望的境地；对他来说，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思议的，周围的整个世界具有虚幻性和不祥之兆，历史在消失，认识成为不可能。不信宗教的人认为，只有在他突然相信他所知道的一切认识方法实际上完全无用的情况下，世界上才会出现如此完全混乱的状态。但是神圣的物质并不是认识的方法或工具；在认识过程中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越出“我们的”现象世界的范围；我们组合和分解现象，——从现象出发，建立认识体系，——按照被感知的现象推测

未来及其他。对我们来说，物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经验中被遇到；它只是**伴随着**我们经验的过程，是一种超验的思想。物质从自在之物的彼岸世界赞许我们所作的经验的努力，向我们保证，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产生我们可怜的主观幻想，“在彼岸”——在真正存在的范围——某种真实的、实在的东西和我们的每一感受“相符”。显然，我们不需要认识自身，而是要有设想的作为一切认识及一切人类活动支柱的**宗教信仰**。

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因为他的哲学——有别于唯我论——不把实体看作神。普列汉诺夫不想只是使用“神”这一词。的确，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不允许要求仁慈和报偿等意义上的祈祷，因为自在之物是严格合乎规律地行动。但是难道斯宾诺莎的神不是规律性本身吗？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不是和一般宗教相对立，而只是和那种承认“神灵”是神的意愿的表现的宗教学说相对立。但是，就是神灵本身并不总是可以想象为绝对的意愿，想象为神对现象的合乎规律性的简单破坏。例如，在笛卡儿体系中神灵只允许在宇宙的某个定点上——即在思维实体作用于延伸性实体或相反作用之处显现（格林克斯、马勒伯朗士）。笛卡儿的神灵没有破坏自然界的规律性，而是相反，去“论证”规律性本身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的体系则完全是建立在神灵的基础上。当超空间和超时间的自在之物征服了逻辑规律，“因果性地”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这种自在之物就成为真正的神灵。然而普列汉诺夫和笛卡儿派同样认为，正是这种神灵论证了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和合乎规律性。

普列汉诺夫自己也承认，他的世界观不是以经验的事实，也不是以经验的结论作为基础，而是各种经验的宗教前提，即形而上学的“获生的跳跃”。在他给《路·费尔巴哈》一书写的注释第119—120页上我们读到：“休谟说，人应当行动、推理和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我们唯物主义者只要加上一句就行了，即：这样的‘信仰’是含义最好的批判的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黑体是巴扎罗

夫加的),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 *Saltfo vitale* (获生的跳跃)。”^③的确,“信仰”一词在这里是加了引号的,显然,带有讽刺性。但是如果我有象普列汉诺夫那样用小说体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天赋,那我一定使他想起果戈理小说中的一位市长的话:“打扫什么?把自己打扫打扫吧!”

把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对立起来,可能只是出于误解;这只不过是神秘主义形式中的一种。普列汉诺夫并不只是一般地反对神,而是为了赞颂真正的神以反对假的神。

这种神秘主义的特点是它的不自觉,是它顽固地不想认识自己的本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的最新反响,这种世界观有时真和神秘主义不同,是认识创新的强有力的工具,由此说明了这种顽固性。那时物质不是哲学的宗教的获生的跳跃的产物;而是经验世界的具体实在性,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在认识的目前状况下,这种兼有现象是难以想象的,关于这点我还要详细谈。物质——世界实在性的支柱——从活生生的真理变成了陈旧真理的尸体。或许可以带着祝愿把尸体埋葬,追念逝者的功绩,或把尸体保留下来,当作圣尸。普列汉诺夫选择了后一种做法。

现从这种“自在”的神秘主义转而谈“自为”的神秘主义,即自觉的神秘主义。

二、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或 自觉的神秘主义

我国现在最引人注目、最时髦的神秘主义流派就是所谓的“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要想总的来评述它是十分困难的。大家知道,首先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分成神秘主义者和故弄玄虚者。后者本身又分成力图愚弄别人和欺骗自己的两种人,他们用时髦的术语把与之完全不合的观点包裹起来。例如,伊·达维多夫在《火

^③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页。

炬》的第二部中，运用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术语（“反抗上帝”、“不愿接受和平”等）十分郑重地宣传“柯尼斯堡的大哲学家”即康德的思想，现代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康德是自己的最不能妥协的敌人之一。正统的新康德主义者欺骗着自己。

显然，引证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所阐明的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学说，那是最可靠的了，它的代表无疑是维·伊万诺夫。但是必须拒绝这样做。问题在于伊万诺夫远未被列入由于Г·丘尔科夫之走运而获得“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称号的特殊意向的范围。在他的生动语言奇特的神话般的象征意义背后，在他的某些一贯取悦和讨好读者的思想发生突变和中断的背后，常常是隐藏着和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毫无关系的实在论内容。“青年小组”中的另一位年轻信徒没有耐心地读着关于“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反抗上帝的行为”，读着关于真正的创造意志（“只是经过了个人意志薄弱的介质才能得到”），——他已经感到自己处于“最后的”宗教启示的最边缘。思想还须提高一点，意志还须加强一点，——于是通向十分渴望的创造地“改变”世界的“宗教行为”领域之路即将敞开。同时，透过这种词的戏谑神秘主义辩证法，可以看出关于各种人类创造（不仅是宗教的或诗歌的，而且是最实证的，如科学的或工业技术的创造）心理本质的十分合理的想法。

我认为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心理倾向在迈耶尔先生的《巴枯宁和马克思》^①一文中表现得最地道，也可以说赤裸裸。我也利用这篇文章来评述这一派别。

上面我已经提到，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疑是和康德主义对立的。如果说康德的“自我”害怕“自己”表象的感性世界，就象害怕某种最无望的、偶然的、主观的东西一样，如果说康德的自我力求尽快在认识和行为的“客观”规律领域找到牢固的支柱，——那对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的“自我”来说，正好相反，现象世界，恰恰由于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自己的规律的绝对必然性，是十分客

^① 《火炬》第2部。

观的、令人苦恼的和可怕的。康德的“自我”是完全抽象的：这是世界上不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的代表（不仅对所有人来说，而且对一切有理智的生物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论证认识和道德的客观性，——这就是他的全部使命，是他的最大的骄傲。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的“自我”——和康德的“自我”相反：它想成为具体的人，成为单独的、独特的“自我”，即认为自己的革命使命是确认自己的单独性，进而和一切客观的、标准的、普遍的东西作斗争。“个人认为自己是高举反对它之外的生活规律旗帜的不可调和造反者。”^⑮而这种对规律的造反并不是象自然地逃避世界、沉溺于佛教涅槃那样的简单地否定。否定应该是有结果的，应该是和世界作实际的斗争：“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⑯；否定并不满足于消极地摆脱压迫，它要求积极的自由，创造崭新的东西的自由，而不仅仅是“把现有的组合起来或是在‘可能条件’中进行选择。它创造着新的生命要素”^⑰。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自我”的生命力是不停顿的，也可以说，是“根本性”的破坏。它的动力就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否定激情”^⑱。至今为止的一切过去的革命破坏了原有的规律，只是为了用新的、更好的、更“明智”的社会生活的规范来代替它们。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超出破坏法律的、外部强制的规范，并且只是把个人的自由结盟和这些规范对立起来。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者不能容忍这种不彻底性。他敌视摆脱外部强制的规范，正如他敌视法规一样，可能这种规范甚至更坏：自由地自我约束比从外部以暴力强制的纪律更加厉害、更加无望地约束着富有创造性的自我。因此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座右铭是“不断革命”；这并不是某些政治革命家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不断革命，也就是说，不是“一直到建立理想的制度”，——不，这是绝对意

⑮ 《火炬》第2部第99页。

⑯ 同上。

⑰ 同上刊，第92页。

⑱ 同上刊，第118页。

义上的不断,是永远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停止下来。它的目的是消灭规范事实本身,不仅消灭社会中的,而且消灭自然界中的规范。自然界中的必然性本应由“自我”的创造性功绩来破坏;而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东西”,即把自然界从必然的有规律的自然界变成自由的和不受约束的自然界。

正如我们看到的,作为被研究的学派的神秘主义者并不是随便把自己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神秘主义者的革命一直要革到神奇地改变世界”,——确实是这样骄傲地喊着。迈耶尔先生有充分权利断言,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首先揭示了完全不妥协的革命哲学。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的革命性(他们只是在规范失去其历史意义时,才否定规范)和这种否定相比,无论如何是十分可怜的机会主义;但是要知道,自然界本身正是这样否定自己的规范,辩证的革命者是自然界的顺从的奴隶。按照迈耶尔先生的说法,从这种否定中剩下的只是那种“十分简单而枯燥(黑体是我标的——作者注)的辩证真理,以致那时在这短暂的世上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并且应该毁灭”。^⑨ 迈耶尔先生并不是这样否定规范,他是当规范还有“意义”时,否定它们,当规范具有的意义越大,越合理,他就否定得越厉害;他否定理性本身、规定的原则本身。举例来说,如果迈耶尔先生看见警察如何殴打居民,他很气愤,——当然并不是由于居民受苦,也不是由于居民的某个权利被破坏了,——这是一种低级的、庸俗的、十分“乏味的”否定。促使实现殴打过程的该死的合法性使迈耶尔先生很恼火:每一次,当警察的拳头落在居民的身上时,在居民身上通常必然出现血红的斑痕。迈耶尔先生的革命的“自我”对此不能忍受。那么,如果说第一拳以后出现了青紫斑,第二拳之后居民两颊的红斑扩大了,而第三拳之后则降调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迈耶尔先生的造反精神才会得到满足。这时,也只是在这时,自然界的枯燥的规律性才会取得胜利,奇异地被改

^⑨ 《火炬》第2部第118页。

爱面说的世界在各方面才呈现出自己自由无羁的魅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迈耶尔的心感到高兴。你看，例如，雄鹰在云层中飞翔。一方面，迈耶尔先生不会反对欣赏雄鹰两翅高傲地搏击——这是它的“自我”强大的创造性的暴发的象征——然而该诅咒的雄鹰却按照自然界的规律飞翔。啊！要是它不受规律约束地飞翔该多好。

不难看出，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的否定——在它的极端革命性的指导下——是完全抽象的。凡是康德的“自我”肯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的自我就否定，凡是前者说“对”的地方，后者则说“不对”……就是如此。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的“自我”和康德的“自我”一样，也是抽象的、一般的、有普遍意义的。显然，事实上，“否定一切规律”的这种规则也是一种“规律”，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准则，和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一样的。康德的“自我”（带有负号的）= 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在这个“自我”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和唯一的东西，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东西。只有某种把这个自我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的具体任务，才可能成为“自我”中真正独一无二的东西。这种任务始终是“某些要素的重新组合”，而决不是发现“新的要素”。迈耶尔先生把自己如此激动地宣布的关于“创造生命的新要素”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意味着作什么呢？这意味着集中自己的视线以便直接看到 X 光，这意味着集中我们的全部感觉以便通过某种方式直接感触到大气电，如此等等。

但是在这里我们甚至没有获得关于“创造新要素”的准确概念。而关于 X 光和电我们多少知道一点；无论是 X 光，还是电都是某些要素的组合，我们只是想通过新的方法来“了解”这些组合。“新”要素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关于“无”我们只能说是那种我无法说的什么玩意，——显然，这种“无”不能提出具体的实体活动的任务；对无的想往是完全抽象的和无意义的，——这对于想避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愿望来说，只不过是另一种表达形式。

迈耶尔先生援引一些演员和艺术家，正象援引他的万能的抽象的革命性的代表者一样，是徒劳的。演员总是通过这个自然界的各种成分，表现某种具体构思；他反对对自然界的必然性“采取盲目的态度”，只是因为这种盲目性妨碍他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他同时毫不动摇地利用自然规律，因为自然规律是他创作的手段。如果说迈耶尔先生真正建立了什么，而不仅仅是共鸣和反响，那他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自然规律不仅仅是“从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必然性，而同时又是我们的奴隶，是我们实践活动的手段。

但不巧的是，真正的、实在的创造领域即和自然作斗争并战胜自然的领域是在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身外”的。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用一个无所谓的观察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辩证地”创造到破坏这全过程（他没有参加）使他厌烦以致憎恶。他想跑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但是到那里去呢？跑到“自我”那里去吗？——唉！那里没有什么“自己的”、个人的东西，没有一点强烈的具体愿望，那里充满了最空洞、无味和令人作呕的东西。自然，仍旧只是重复我们的一位诗人的著名叫喊：“我希望得到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东西！”

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完全不是新的财富的创造者和生产者的哲学。这是穷极无聊的消费者的哲学，是精致的寄生生活的哲学。它的原动力不是创造性的斗争，而是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迈耶尔先生本人在批评恩格斯的辩证的革命主义时，就曾脱口说出了这点。

因此，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对涅槃的否定态度是一种最纯粹的误解。可能在这里我们只有未完全抹掉的俄国革命的痕迹，这个革命是完全机械地、“从外部”给神秘主义者的心理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事实。按照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奇迹般的改变世界应该通过改变“自我”的途径去进行。应该从合乎规范的、受法制约束的、康德的自我变成破坏性的、不守法的、巴枯宁的“自我”。从而应该首先使“自我”抛弃确定规范的恶习；当将来达

到这一点时，当“自我”完全“自由”时，这种改变会把整个宇宙吸引到自由的王国。但是，正如迈耶尔先生公正地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革命活动都是通过确立另一些规范来破坏一些规范。甚至当迈耶尔先生著述推翻规律性的原则的文章时，他实际上只是在巩固这种规律性。他拿着笔并且是严格按照规律在纸上写；他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是按照自己“随便的”规律，而是用“从外部”强加于他的俄文字母来表达。他用俄语语法“规律”来约束自己的作品，他用逻辑“规范”来束缚自己自由的智慧……显然，他不是使摆脱“自我”以及奇迹般地改变世界的时刻加速到来，而是反之。黑格尔老人并不是无缘无故谈到世界精神的“狡猾”。自然界是十分狡猾的：它把自己破坏者的最粗野的暴发变成巩固自己实力的过程。

迈耶尔先生的共同战斗的同志丘尔科夫先生在同逻辑和语法规规范作斗争中还要勇敢一点。他常常谈关于“非经验主义的经验”这类东西。他得出一种结论：按照自己的逻辑结构对已有的思维规范来一次勇敢的造反，就象一首著名的诗中所写的：

“黄雀在船上走来走去，
佩有将军头衔，
因这等由缘，
而滴酒不沾？”

但是丘尔科夫先生的革命方法正是自然界的狡猾表现。这是事实。显然，必须二者择一：或是丘尔科夫先生的三段论将只会使读者困惑不解，如果丘尔科夫先生想继续自己的文学活动，那他就不不得不多少要顺应已有的逻辑；或是思维的各种自由形式最终为其他人所了解，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特性，而具有“普遍意义”，即狡猾的自然界为新的符合规范的成果所充实。

无政府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如此蔑视印度的哲人一遁世者是徒劳的。这些遁世者比我们天真的反抗者更清楚地了解自然界狡猾的全部奥秘；他们懂得靠自然界自身的武器和“自然界”作斗争

是荒谬的，革命地否定自然界是逃避自然界。不言而喻，这种结论只是对于那种真想实现否定自然界，而不愿只是由于自己的这种“有意思”的情绪而在社会中产生强烈反响的人来说，是必然的。

* * *

大家知道，现代神秘主义不仅是无政府的，而且是“共同的”。从形式上看，从社会制度方面看，当然，这种共同性是不会屈从于定义的。它的唯一标志正是不要任何“制度”，没有规矩，反对常规。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者认为理解为“Эрос”即性爱的这种爱情是人的共同性的主要联系环节，同时又是世界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神秘主义一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描写关于性爱：带着自己通常的扭捏和轻佻来描写，而这里面会意地充满了隐私和暗语。但是在这里他们也没有创作出任何“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在现代色情症的悲剧性地垮下去和“极度痛苦”后面通常隐藏着最基本的东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即使不是“有普遍意义的”，也可以说是“普遍的”——性欲感，这种性欲感是由完全新的、从未有过的表现形式刺激起来的。当代想建立爱的形而上学的企图以自己体系的牵强，无谓的奇特和理性而令人吃惊。僵死的宗教的可怜上帝，僵死的哲学体系的贫乏“实质”再次——应该认为最终——在我们的“创造者”手中消亡。

例如，不久前出笼的别尔嘉耶夫先生的作品《新的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是从自己内部挣扎产生的神秘论的枯燥乏味的、纯理性的华而不实文章的典型。对于理解别尔嘉耶夫先生的“神秘论”精神来说，只要注意到他是如何提出“神秘论问题”就够了。当然，他常常谈到神秘的“经验”，神秘的“创造”，但是他没有一处是以他的神秘感受的事实为根据的。他一直在解决下面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改变和组合抽象概念，以使神秘论（他只是从其他神秘主义者的言谈中知道的）在理论上能站住。这就是研究“神秘论如何站得住？”这个认识论问题的渺小的——十分渺小的康德。

可以说，神秘主义者一无政府主义者是站在现代宗教探索的极左翼。在自己观点和愿望方面接近官方教会的那些想用恢复古代正教会议精神来进行某些改革的代表人物的神秘主义者是极右翼。别尔嘉耶夫正好处在这两者的中间。正是从这一观点来说，他的书是无价之宝，——也就是说，是一种中庸之道的心理学，一方面，它凭着自“我”的强烈愿望献出应有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同“非高贵出身的”和“非贵族式的”、“自尊地造神的反”格格不入。但是对这种特别有教育意义的“中庸”神秘论的分析越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将只是简略地指出别尔嘉耶夫神秘主义体系的最基本的路线。

别尔嘉耶夫先生和神秘主义者一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从“自我”出发的（把“自我”看作最宝贵的东西），是从“个人命运的独特性”出发的。但是他感到，赤裸裸地否定世界决不会创造出任何独特性。因此，不否定世界，而是相反，和世界融为一体，消除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不把“自我”同“普遍的存在”视为同一，这是必要的。这种融合并不是把“自我”溶化于经验的世界之中，别尔嘉耶夫先生和任何一个神秘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憎恶这个经验的世界。“普遍的存在”不仅有世界，而且还有神；这是绝对的统一，但是其中包含世界的全部复杂多样性，在其不变中包含永恒的东西，以及永远创造着的东西，即在改变着的和被改变的。与神融合并不是盲目地服从，而是把自“我”和神这个大写的“我”随便等同起来，这是在融合这一行为展示在我面前的逻各斯、最高理性（和我自己的理性一样）。虽然世界逻各斯自身是统一的和同一的，然而各个人的“自我”是各自绝对不相同的，在和逻各斯等同时，并不失去自己的“独特性”，而是相反，确定这种独特性。

因此，别尔嘉耶夫先生的宗教寻求的可以理解的目标就是实际上体现某些逻辑上的矛盾：不变 = 变，许多 = 一个等等。逻各斯的神灵，首先是作为一种“战胜”“超理性的辩证同一规律”的能力。

当然，并不是逻辑的谬论本身包含别尔嘉耶夫先生的宗教感情。谬论在某种情况下只不过是某些具体的心理上互相矛盾的愿望的抽象表达。现代神秘论的心理动因是矛盾的，互相麻痺，致使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有某种完善的愿望。这些在心理上互相矛盾的“愿望”中的每一种愿望对神秘主义者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此外，他消除其中之一种，从而就在消灭对立者的价值。于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的推动下，神秘主义者提出（作为自己的“创造”目的）一些意志指示，这些指示不仅排除了进行任何创造的可能，甚至使得想去创造的愿望本身也不可能有。别尔嘉耶夫先生不仅期待着他难以设想的东西，而且——这也就是他的论点的主要“可悲之处”——，想期待着他在事实上不可能期待的东西。我们现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历史宗教的信条中，逻辑上互相矛盾的关于神的本质的定义，如一个神的三个位格（3 = 1）等等，特别引起现代神秘主义者的兴趣。

并不是任何谬论都能创造出宗教的价值，但是在现代神秘论中**只有**谬论才具有这种能力。神必定是超出人的理智界限，否则它就不是神。在英雄的时代，在崇敬“权威者”的时代，对于神的理智来说，在力量方面，即从量上说而不是从质上说，曾经大大超越人的理智；在关于神的本质定义中，逻辑上的矛盾在当时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没有形成它的实质。随着树立个人威望的原则逐渐失去影响，随着自“我”的产生，这种神的量的优势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从另一方面说，过去不仅存在没有被认识的“现象”，而且还存在不能认识的“现象”。巫师、祭司、术士则不断说明这些现象。但是对于巫师本人来说，他们法术的秘密仍然是神的秘密；在经验世界中是用完全特殊的方法（完全不同于认识中和实际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方法）来揭露这些秘密。认识的进步并没有消灭未被认识的领域，而是相反，扩大了这个领域，并且——应该指望——将无限扩大这个领域。但是在这个经验地被感知的世界中，原则上不可认识的领域则无疑被消灭了。今天，当医生象蓖麻油那样清

晰地记载下催眠暗示时，难以设想表现为超理智的“现象”能被揭示出来。今天我们不能认识的只是谬论（当它“被当作”实在时）。谬论是神秘论的“基本”特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现代宗教创造的唯一有价值的本质。

我们认为，自觉的神秘主义的“探索”心理学和先验的唯物主义的不自觉的神秘论相反。神秘主义者渴求他们心理上无法现实地达到的那些宗教感受。在这个“自然的”世界——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理世界——中，任何东西都不能激起他们的宗教感情。他们把最奇异的概念组合堆在一起，从过去宗教的上帝和鬼神的历史灰尘中去发掘，他们把逻辑上的谬论宣布为逻各斯，把发疯宣布为高尚的英雄主义……经过每一次带着隐秘的希望进行的勇敢实验之后，他们看看世界：发生什么事？怎么样？这个世界在自己“实证的”基础上是否有所动摇？哎，没有！世界就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大象，一直前进，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你们的造反行为。寂寞的太阳始终是那样有规律地沿着寂寞的太空运行。行星象从前那样毫无意义地按着自己可笑的椭圆形在移动着。人的观念总是象十分服从班长命令的士兵一样排成联合观念的队列。呵，多么奇妙的现象！你在哪里？！……在这里，奇妙的现象被想象成神的行为，它彻底破坏“这个”宇宙的制度，把神秘主义者抛到“这个”宇宙之外，并且创造一个按神秘主义者的要求改变了的世界。

对于神秘主义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来说，这个世界具有很高的价值。世界的规律性不仅没有使他不快，而是使他感到极为高兴。他在理论上是敌视宗教的，正是因为某些神有破坏世界规律性的愚蠢习惯，随意把某些奇异现象染上现象的因果序列色彩。但是在普列汉诺夫那里这种规律性本身是建立在奇异现象的基础上的。“自在之物”对他来说是必要的，是这个世界实在性的绝对、超经验的保证。自在之物不破坏自然规律性，而是以自己的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奇特影响大大巩固了自然规律性。普列汉诺夫没有必要离开自然界而去寻得奇异现象，相反，他应该从奇异现象出

发,去寻得自然界这一真正的“实在”。

第一种情况,绝望的无神论心理无论如何都希望成为宗教心理。第二种情况,真正强烈而深厚的宗教感情则认为自己是无神论。(待续)

(郭值京译)

个人迷信和党史学^①

〔苏〕И·И·曼科夫斯卡娅 Ю·И·沙拉波夫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党的中央委员会 1956 年 6 月 30 日的决议,都公正地指出,个人迷信并没有改变我国制度的实质,没有引起列宁党和苏联国家的蜕化,未能阻止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阻止的运动。我国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充满了苏联人英勇的业绩。虽然如此,但是个人迷信仍然给党和国家,给社会科学,尤其给党史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我认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整个历史学,包括党史学带来的不良后果,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贬低了列宁的作用,贬低了群众和党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其次,在历史研究方面盛行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上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恣意妄为。第三,在学术界采用行政手段,搞不正当的批判,贴各种不同标签。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党史学的影响是整个个人迷信形成的组成部分。随着大量著作和口头宣传越来越把党的活动同斯大林一个人活动联系在一起,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这种影响逐渐加强。斯大林在党史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功绩被突出了。这样一来,列宁作为理论家、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创始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就被降低了。列宁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多方面的紧张的活动的真实情况被隐瞒了。

① 本文叙述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苏共党史学的研究所带来的危害,译成中文时作了删节。作者分别为苏联历史学副博士和博士。——译者注

“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这一公式广泛流行。斯大林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

斯大林的名字周围天才的光环掩盖了他的错误。党史著作不再阐述重大的学术问题，党史学家只能去研究个别问题。科学参考资料逐渐从文章和书籍中消失，很少引用档案资料。一般性官样文章比比皆是。历史学家不作自己的结论和总结，而是用材料去说明“必要”的引文，主要是斯大林的引文。大肆吹捧斯大林成为作者政治可靠性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一部党史著作都不能出版。党史书籍通篇是引文和固定的公式。死啃书本和教条主义不可能对我党的历史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给党史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然而，个人迷信对党史学的影响更早就有所表现。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党的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材料，那么就会看出，除了对斯大林在当时许多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批评之外，已经开始公然为斯大林辩护。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些党代会的普通代表把斯大林看作是体现党战胜反对派，首先是战胜托洛茨基的活动家。同时，那些不久之后便成为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培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积极帮凶的人已经登上了这些代表大会的讲坛。

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有两件事情，使得个人迷信开始在党史学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首先，是出版庆祝斯大林50诞辰的文章。其次是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1929年12月21日《真理报》出版了八版，而且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庆祝斯大林的诞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拉·莫·卡冈诺维奇和克·叶·伏罗希洛夫的文章。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和党》一文中说斯大林是“奠定党的第一批基石，建立第一批党小组时期”党的最优秀的组织者和建设者之一，把斯大林描绘成《真理报》组织者，等等。当然，斯大林在某些时期有过严重错误和动摇，卡冈诺维奇是知道的，但他不顾历史事实地写道：“斯大林的最出众的和

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正是他在自己的全部党政活动期间没有离开过列宁，既未向右又未向左动摇过，从隐蔽的地下状态到取得政权后的整个时期，他都是坚定不移地和始终不渝地执行地道的布尔什维克政策。”^②

伏罗希洛夫在《斯大林和红军》一文中违背事实地夸大了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作者写道：“在1918—1920年期间，哪个战线对革命最危险最危急，中央委员会就把斯大林调到哪个战线。”^③伏罗希洛夫认为，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活动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从而把他描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的，好象是唯一的拯救者。为此，文章把最重要的战线说成是斯大林所在的战线，过分夸大他在个别一些战役中的作用，而闭口不提1919年3月21日列宁早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军事问题发表的演说中所谈的他的错误。

除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上述文章以外，《真理报》还发表了瓦·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米·伊·加里宁、阿·伊·米高扬、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文章。《斯大林和国家工业化》、《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钢铁战士》这些标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这里还刊载了米·柯尔佐夫文章《斯大林是一个谜》。

1929年12月发表的庆祝文章对党史学家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就是说，这些文章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加紧渗入党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1931年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一封信发表了。如果说1929年的庆祝文章毫不掩饰地促使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观念渗入党史学，那么他的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则把党史学的领导方法运用到实践中了，从而促使这一反马克思主义观念推广开来。

^② 1929年12月21日《真理报》。

^③ 同上。

众所周知,斯大林写这封信的直接起因是 A·斯卢茨基 1930 年《无产阶级革命》第 6 期上发表的文章《布尔什维克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在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中对犯了真正的错误或是臆造的错误的党史学家戴上了“托洛茨基主义走私贩子”和“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这样的帽子。这些和由此而派生的公式为政治上指责任何时候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托洛茨基主义都毫无联系的党史战线的许多工作人员提供了理由。斯大林实际上禁止研究党的重要历史时期。1931 年 10 月 20 日编辑部送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份声明,其中谈到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有关布尔什维克和战前第二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切问题。斯大林在答复这项声明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研究该问题事实本身似乎会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带来危害。他对编辑部成员说道:“……你们在声明中犯了一个新的错误,因为你们宣称:‘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布尔什维克和战前第二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切问题’。这就是说,你们打算重新把人们拉来讨论那些本来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的问题。这就是说,你们想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问题由公理再次变成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④实质上,斯大林怀疑党的文献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他说:“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⑤应当说,这种轻视文件的“药方”导致歪曲事实,为在党史学中创造个人迷信观念提供了便利条件。

斯大林批评斯卢茨基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行动时,实际上把他们在那个时期的行动不正确地说成是完全错误的。他转移重点并只是顺便指出他们的功绩后,就歪曲左派,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历史中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77 页。

^⑤ 同上书,第 86 页。

的真正作用。

大家知道,列宁严厉批评过卢森堡的错误,他当时写道:“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⑥

瓦·乌布利希谈到列宁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时写道:“虽然列宁批评左派没有及时从组织上和修正主义决裂,但是他仍然高度评价德国左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从而捍卫了德国工人阶级的荣誉。”^⑦

继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之后,卡冈诺维奇在庆祝红色教授学院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更加强调斯大林这封信的错误观点。他“深化了”关于打着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学家招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题,声称“因而机会主义现在企图爬进我们的队伍,企图以浑水摸鱼、奴颜卑膝、匍匐前进的手段乘隙而入,特别是企图通过我党的历史大门钻进来。卡冈诺维奇仅仅把卢森堡及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叫作“所谓的左派”。^⑧他把研究党的文件称作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在纸堆里跛行”。^⑨

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和上述卡冈诺维奇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讲话,在学术机构中作为无条件的命令接受下来,并且讨论这些文件时通常是新“托洛茨基走私贩子”和“伪造者”帽子随着“出笼”。在刊物上出现抨击党史学家的毁灭性文章。这类的“批判”为创造吹捧斯大林,为树立斯大林个人迷信效力的文风扫清了道路。

其实,在党史学中形成的局面不只是同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

⑥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54页。

⑦ 《难忘的列宁》1958年莫斯科版第9页。

⑧ 拉·莫·卡冈诺维奇:《为了党史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1932年莫斯科第2版第27页。

⑨ 同上书,第16页。

⑩ 同上书,第26页。

命》编辑部的信和卡冈诺维奇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讲话有关。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直接过问党史学的一些问题，主持各种委员会和编辑部，监督出版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任何一个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任何一个出版物不经斯大林个人签名或他的同意（由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沃伊签字）都不能出版。与学术干部的调动和配备有关的问题，也由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来解决。那些年的文件证明，党史学中的个人迷信不仅经斯大林批准，而且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搞起来的。

必须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П·П·波斯特舍夫也掌管意识形态问题。他反对杀害学术干部。特别是1932年1月他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发表以后，波斯特舍夫说道：“不经审查就开除出党，这样一来也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即不是同志式地帮助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而是整人使他离开队伍或者至少受到伤害”。波斯特舍夫认为必须“区分人的个别错误和观点体系”。他说，在同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时，应善于同志式地批评诚实的但又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把他们说成是倾向分子。^①但是，波斯特舍夫没有能力对抗经斯大林签署和奉行其指示的方针。

П·Н·戈罗杰茨基在1962年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发言时说道：“能不能说，根本没有人反对在历史学界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呢？不能这样说。只要翻阅文件，我们就会看到是有人反对的。在米·斯·奥里米斯基、纳·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卷宗里就有许多文件反对搞个人迷信、歪曲我们的历史。当然这是危险的，谁反对，他就受到了迫害。”^②

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给党史学家干部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只是第一次打击。在这之后，在党史学中仍继续

^① 见П·波斯特舍夫：《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论文和发言》，1934年莫斯科版第269页。

^② 《全苏改进历史学科学教育干部的培养方法会议》第364页。

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这首先是1931年11月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党的各地的研究所、十月革命史和联共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的科研人员。1932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与此同时,又出版了完全相同的第三版。30年代前半期首次出版或再版了党的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党的第七次、第八次和第十次代表会议记录。重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明星报》、《军营报》。为了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5周年和开始撰写《苏联国内战争史》,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许多工作,例如收集和出版党的文献和回忆录,研究党组织的活动。特别是1930年第一次出版的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一书具有重大意义。马·高尔基倡议的对工厂的研究,推动了对最大型企业党组织的历史的研究。

但是,还在30年代前半期个人迷信就给所有这一工作打上了明显的印痕。它限制了选择文件和回忆录发表的可能性,逐渐渗入到文件汇编的科学附录中。

克鲁普斯卡娅的3册《回忆列宁》出版(1933—1934年)后,《真理报》上发表了И·И·波斯佩洛夫的书评《评〈回忆列宁〉》。文章把列宁最亲近的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同乌里杨诺娃-叶利扎罗娃的回忆进行对比,认为后者似乎更为准确可靠。这种方式本身是令人遗憾的。但主要问题还不在这里。波斯佩洛夫断言:“书中存在主要问题是对布拉格代表会议阐述得不充分。绝对不能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评价。”^⑬当然啰!本来克鲁普斯卡娅所写的内容是同当时灌输的关于这次代表会议是党的奠基者的说法直接相矛盾的。书评的作者责怪说,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中只是“简单地列举一下列宁同斯大林的会见”,并作出结论说,回忆录“需要作重大的更正和修改”。^⑭

然而,对党史学术研究著作,首先是对同编写党史方面的大部

^⑬ 1934年5月9日《真理报》。

^⑭ 同上。

头总结性著作有关方针的打击最为明显。

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中的叶·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个人档案可以说明这一点。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党的最早的活动家和著名历史学家之一，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真理报》编辑部、《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编辑部担任领导工作。他的著作在培养许多学者——党的历史学家中起了重要作用。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发表以后，雅罗斯拉夫斯基成了猛烈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无力阻止这一“加工”。总之，他的政治威信和学术威信被用来为个人迷信效劳，他成为歪曲历史真情以迎合斯大林的罪人之一。

对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改造”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1932年开展对1926—1929年出版的由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4卷本《联共（布）党史》的批判。4卷本的作者有П·巴耶夫斯基、П·金、Г·克拉莫尔尼科夫、И·明茨、Н·尼基廷、С·皮翁特科夫斯基、Н·鲁宾施坦、А·西多罗夫、Н·埃尔沃夫。全部作者都被扣上党史的“托洛茨基走私贩子”和“托洛茨基伪造者”帽子。批判是根据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所定的调子进行的：扣帽子，从政治上把作者搞臭，对斯大林在某些时期犯的错误保持沉默，要突出他个人，把不存在的功绩硬加在他的身上。作者们被指控对斯大林在我党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歪曲并保持了沉默。

1931年11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雅罗斯拉夫斯基未被邀请出席会议，甚至没有收到这次会议的记录和所通过的决议。他提出抗议并在1931年11月11日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席团的信中说：“这未必能说是个手续问题”。^⑮不久，斯大

^⑮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89，目录7，案卷30，第1张。

林的信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全体会议上，然后又在协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中进行了讨论。讨论也是正在休假期间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全体会议上，而后在党团中讨论开始时把4卷本的错误说成是“我国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学家”的错误。但是，到党团会议结束时批判变得更加“彻底”了。1931年12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讲话中认定这部著作是“染上了托洛茨基主义色彩的事件”，从而对《联共(布)党史》的后来的所有批判定了性。中央委员会开始收到对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诬蔑性的声明。声明指责他纵容斯卢茨基，还指责他，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某些时期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还夸大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错误等等。

1931年12月10日，《真理报》上发表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由于4卷本的错误而写的一封信。12月15日，他以此为题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中作了长篇报告，1932年1月8(或9)日在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区党代表会议上，而1月13和14日在扎莫斯克沃列茨克区和莫斯科州党的代表会议上谈了4卷本的错误。最后，雅罗斯拉夫斯基2月10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谈了4卷本的错误。他在所有这些讲话中，承认了4卷本的错误，并承担了编辑工作粗心大意的过失。

1932年1月12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扎莫斯克沃列茨克区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还指出了对党的历史学家的批评有过火行为。他在1932年2月1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发表以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著作不再出版。因此，1933年3月9日他写道：“……我的党史著作已停售一年多了……”。^⑩

这时，雅罗斯拉夫斯基着手修改他所写的1930年出版的教科

^⑩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89，目录8，案卷827，第3张。

书《联共(布)简史》。在业已形成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条件下,在遭受毁灭性批判的形势下,雅罗斯拉夫斯基本着突出斯大林在党史中的作用的精神修改教科书,他知道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对这本书表现了很大兴趣。

1933—1934年出版的两卷集《联共(布)党史》,从开头几页起就强调斯大林在创造性地发展列宁的理论遗产中的功绩。特别是从1917年事件起,斯大林处处和列宁并排,把斯大林说成十月革命的“领袖和组织者”、粉碎干涉者和白卫军的主要指挥者,等等。

关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他1917年3月实际上赞同加米涅夫的半孟什维克观点的一些错误,在教科书中只字未提。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发表之后,雅罗斯拉夫斯基立即想到要阐述1917年3月时期。1931年底,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休假期间写信给4卷本的作者们,谈到要修改第4卷,特别是关于“党的某些成员三、四月的动摇”那一章,希望尽可能再版这一卷。雅罗斯拉夫斯基向作者们建议,不要回避斯大林的错误,但要根据斯大林本人的说法进行评述。他写道:“关于这个时期的错误,最好根据斯大林本人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的说法(斯大林同志在那里谈到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来叙述……”^①。

然而,如果说斯大林还能够哪怕以这种形式谈到1917年2月以后自己的一些错误,那么在1931年底—1932年就把任何提到这些错误的地方,甚至间接提到这些错误的地方都从整个历史著作中一笔勾销。为了这个目的,《真理报》在1932年1月27日发表某个谢夫鲁克的一封信。这个谢夫鲁克1917年3月持反党的护国主义立场,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并转向孟什维克。过了15年,1932年1月,由于在刊物中开展对施略普尼柯夫的回忆录《1917年》的批判,谢夫鲁克则作为1917年3月事件的“目击者”出现了。他在自己的信中力图把情况说成是似乎在1917年3月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89,目录7,案卷66,第5张。

犯错误的只是他谢夫鲁克，以及成员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关于斯大林，这里则只字不提。这样，把关于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一笔勾销就名正言顺了。

2月5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自己记事本上写道：“目击者——谢夫鲁克。难道党史没有这样的目击者就写不成了吗？”^⑩然而，在联共（布）党史教科书修改本中，雅罗斯拉夫斯基不仅对斯大林1917年3月的错误只字不谈，而且还说他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似乎符合列宁在那个时期的立场，同时举出那个谢夫鲁克和他发表在1932年1月27日《真理报》上的信作为“佐证”。

1933年2月26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写信给斯大林说：“寄上我修改过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我根据您和斯捷茨基同志的一切指示，以最缜密的方式作了修改。”雅罗斯拉夫斯基请求斯大林批准出版教科书。看来，没有得到批准，因为3月9日他把教科书送给了卡冈诺维奇时，又请求指示党的出版社出版教科书。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这封信中又一次强调，他考虑了给他的全部指示：“我重新撰写了教科书的大约三分之一。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斯大林理论著作的意义等等）”。^⑪

1933年6月雅罗斯拉夫斯基收到对他的教科书的第二部分的未署名的评论，其中说雅罗斯拉夫斯基似乎缄口不谈斯大林在党史中的作用。雅罗斯拉夫斯基1933年6月26日写信给斯捷茨基对此提出异议，说《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指出了斯大林在党史中的特殊作用，书还写了专门的几章，如《国内战争中的斯大林》、《斯大林和民族问题》、《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这都是其他党史教科书所没有的。

当教科书已经付印时，雅罗斯拉夫斯基给党的出版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起初“《联共（布）党史》人名索引中，他没有为斯大

^⑩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89，目录7，案卷67，第4张。

^⑪ 同上，目录8，案卷827，第3张。

林写出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条目，但是后来因为斯大林传略印数不多，人们不大知道，决定补上这个条目。他要求提供列宁全集第22卷索引中关于斯大林的传记资料，并作了补充：“列宁逝世后，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工程。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在许多问题上……被斯大林独立地加以发展和延续”^②。

30年代中期的形势使斯大林个人迷信在党史著作中的影响得以加强。谢·米·基洛夫被害，大规模镇压阶段，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委员会2月和3月全会上发言以后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所造成的整个气氛，诬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生的运动——所有这一切使历史学家无法正常工作。对老布尔什维克和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的批评，虽然公正地讨论了他的著作中的公式化和抽象的社会学观点，而实质上把历史学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拒绝理论总结，拒绝分析史料和史实，搞经验主义和罗列事实。

1934年《无产阶级革命》第四期社论阐述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史学发展的宏伟纲领。除了规定党史学家要研究苏维埃时期的党史，出版联共（布）党史通俗教科书和民族共产党史教科书，巩固各共和国党史研究所和地方十月革命史和联共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之外，实质上直接号召通过党史学树立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社论中谈到，研究党史，特别是苏维埃时期的党史应当表现“斯大林的整个高大形象”。党的历史学者所遵循的方针是把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整个成就都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功劳。文章号召优先研究那些和斯大林的名字有关的历史章节和那些他工作过的地方党组织的历史。

1935年封闭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政治流放者和流放移民协会。在这之前，“重新抖落了”老布尔什维克组织——审查了政治流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89，目录8，案卷827，第5张。

放者和流放移民协会的会员，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关闭这些协会使历史书籍特别是回忆录的出版减少了。《老布尔什维》文集和《苦役与流放》杂志停止发行。1937年列宁格勒联共（布）党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红色年鉴》出了最后几期。斯大林的信发表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实际上处于半死不活状态。这个杂志在头10年当中每年出版12期，1932年就完全停止出版了。从1933年到1941年，几乎在9年当中总共出了19期。

这种情况也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带来特殊的影响。从1935年起，出版斯大林传记及其全集的筹备工作在研究院占了重要地位。早在1933年，研究院就着手收集所有中央和地方档案中斯大林的文件和关于斯大林的文件。1935年8月起，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8至10卷，为此规定了最短的期限：一至一年半。斯大林亲自过问有关他的传记和全集出版工作的问题。

当时，研究院安排的许多其他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工作都停下来了。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著作中提到所谓“令人反感的人物”。例如，已经印好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会议记录、《1905年革命中的党》文集和某些其他出版物都没有发行，一部分由党的出版社转交给研究院，当作原稿保管起来。

在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日益加剧的形势下，研究院也难以正常开展连列宁的学术性传记这类最重要著作的编写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开始编写列宁生平活动大事记，这是编写列宁学术性传记的最初阶段之一。1931年出版了《列宁生平活动年表。1870—1924年》第一版，1933年加以扩充，出版了第二版。然而，出版一部列宁的真正学术性传记在斯大林令人迷信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当时出版的列宁著作主要是从“列宁和斯大林共同工作”角度写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写的不是列宁，而是斯大林。研究院起草的纪念列宁逝世10周年的提纲草稿就是一例。提纲的第六章的标题是《斯大林》，分为五节：一、斯大林是列宁事业

的继承者；二、斯大林 1924 年以前的革命工作简述；三、1924—1934 年；四、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五、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932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多卷本《联共(布)党史》编写组。其中有以·克诺林、H·波波夫、A·布勃诺夫、叶·雅罗斯拉夫斯基、H·斯克雷普尼克、B·贝斯特良斯基、M·托夫斯杜哈、B·阿多拉茨基。审订工作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书记担任。1932 年 1 月 16 日编写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出版工作的性质和计划，解决各卷中的质量问题。研究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过工作进程。

作者集体编写多卷本《联共(布)党史》的条件是极为不利的。例如，A·库奇金 1936 年 9 月 28 日致 B·索凌和 M·沃林的信证实了这一点。库奇金负责编写 3 月事件有关的 1917 年党史一节。库奇金觉察到，这个时期虽然总共只有一个月，但是非常难写。对这一节作者来说，任务特别困难，因为他要写出，“斯大林同志认真地把党引到新的方向……斯大林文章的基本论点完全符合列宁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的基本论点”。^④自然，按着这个思想来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思想同事实是完全矛盾的！多卷史的编写工作根本没有进行到底。

一些文件证实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不准发表列宁的文件，或认为只能部分地发表列宁的文件。例如，他不批准出版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3 版）。这一卷应当收入以前刊登在列宁文集和其他出版物中的著作和文件。1937 年 1 月 7 日阿多拉茨基关于第 31 卷又一次写信给斯大林。1 月 25 日索凌给斯大林寄去带书签的第 31 卷，并请求斯大林能批准发表这许多文件。2 月 4 日索凌又请求斯大林决定第 31 卷的命运。5 月 9 日索凌请求斯捷茨基同斯大林商量列宁全集第 31 卷的出版事宜。他指出：“该卷已经在印

^④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 77，目录 2，案卷 140，第 1—2 张。

刷厂躺了几个月,如果不解决出版问题,那就要拆版了”^②。现存的关于列宁全集第31卷的最后一封信——阿多拉茨基致莫洛托夫的信日期是1937年5月13日。但是,该卷最终未能出版。

个人迷信也给地方党史机构,特别是列宁格勒联共(布)党史研究所带来影响。1934年这个研究所着手编写三卷本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史,《红色年鉴》杂志第2和第3卷上发表了出版计划草案。但是,大规模逮捕和许多工作人员被赶出研究所,妨碍了这项工作的完成。

贝利亚在那些年代给党史学带来巨大损害。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恐怖手段)来培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早在1932年,当时领导南高加索党组织的贝利亚就在斯大林的文章《高加索的来信》上大吵大嚷。当然,这篇文章斯大林写于1909年,1910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附刊上,当年在南高加索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1932年该信被赋予特别的现实意义。在一周内,格鲁吉亚和阿塞爾拜疆共和国党组织、第比利斯和巴库党委会作出决定,提议在党的整个教育系统“仔细研究”《高加索的来信》,在报刊上广泛加以宣传,以它为基础开展群众性政治工作。责成党史机构在一个月內根据斯大林文章《高加索的来信》的观点重新审订一切党史著作。

1935年贝利亚作了题为《谈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后许多年用各种文字大量发行。这个报告不外乎是对南高加索党组织的历史以及整个党的历史的用心恶毒的和无所顾忌的伪造。贝利亚摧毁了由A·叶努基泽、Φ·马哈拉泽、M·奥拉赫拉什维利撰写的所有关于南高加索党组织历史的著作,歪曲历史,把南高加索党的整个活动仅仅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贝利亚的伪造中,第一次令人极其厌恶地提出关于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存在开端的论点。这个论点后来

^② 同上,第36张。

在党史著作中广泛流传。他直接违背列宁关于“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政治思想流派和政党而存在的”著名论点，同1933年隆重庆祝布尔什维克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的全部党史著作背道而驰的。贝利亚讲话以后，许多读者来信指出贝利亚的论点同列宁的论点是相矛盾的。但是，贝利亚通过《真理报》答复这些来信时，不仅继续坚持自己的伪造，而且也进行了“发挥”和“论证”。

1937年出现了大量吹捧斯大林及其功绩的著作。1936年出版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第2版第1卷中通篇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了吹捧斯大林的功绩，几乎利用了一切连续不断的纪念日——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即第六次代表大会、《真理报》创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成立30周年、1902年巴统示威游行35周年等等。在所有的纪念文章和小册子中，斯大林是主要“英雄”。他被看作是南高加索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袖、《真理报》的发起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领导人等等。抓住各种藉口把斯大林的名字同列宁的名字并列起来。

渗透斯大林迷信的著作的大量出版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准备了基础。这部教科书成为所有党史研究者的经典，似乎是为树立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集歪曲历史事情之大成。《简明教程》不真实地阐述许多问题，贬低列宁、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在后来的几乎20年中，党史学家写的通俗小册子，基本上是千人一面，都是用斯大林著作和《简明教程》的引文拼凑起来的。

但是，《简明教程》的危害不限于此。主要之点在于在党史学中培植了教条主义。在党史学内搞思维和写作的“公式”。背离“公式”，要受到严厉的追究。

《简明教程》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教条主义。这本书对阐述党的历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历史产生了影响。正是在对这一时期的论述中表现出了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斯大林不管什么时候说的什么论点，都被说成是最终真理，这给反映现实的科学和艺术的后来全部发展留下烙印。

至于党史方面的历史著作，那么在《简明教程》之后 20 至 30 年代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学家的优秀著作都非法地收起来了。其实，尽管这些著作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是其中仍不乏许多有益的 and 可信的东西。

斯大林个人迷信对历史方法论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于是对历史过程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泛滥起来。过去的东西开始被理想化，而不管它有怎样的矛盾。不论对事件和历史活动家都是这样。对历史的阶级立场被破坏了，历史学的党性同客观性相对立。历史学家们也相信，似乎他们在理论上不够格，因为发展理论的权利只属于斯大林一个人。从此历史学家埋头于历史的细节，而不去从整体上对它进行研究。历史学家中的搞小题目风气不是昨天产生的，而是 30 至 40 年代的遗产。

争论实际上从历史学常规中消失了。如果说争论还存在的话，那只不过是争论一些次要问题，或是古代问题（例如，“基辅罗斯是不是奴隶占有制？”）。我们祖国历史的苏维埃时期的题目无需进行讨论，一切都早就有了定论。

当然，认为党史学的发展在那些年代完全停止了，也是不对的。在大量的通俗小册子和文章中也不乏真正有益的科学探讨。但是，通常它们只局限于地方的和次要的题目，没有广泛利用档案文献，因为当时研究工作者几乎无法查阅这些文献。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历史学家广泛接触党史方面的档案文献，并能够将它们发表。在中央和地方开始出版党史文献集，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史科学的科学基础。出版了许多列宁文件和党的文件，它们在个人迷信时代只是档案架上的财产。

经过多年停顿之后，开始出版和再版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读者在学术著作和回忆录中看到许多党的著名活动家的名字，他们在个人迷信时期遭到非法的批判，并不公平地被遗忘。广泛地开展了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列宁的重大活动的科学研究。历史学家根据大量文献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党史集体著作和

专著。

同时，那个时期也有自己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后者从 70 年代起被加深了。只有开始改革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党的思想工作的当前时期，才为在真正文件的基础上发展党史学，真实地和科学地阐述我党的英勇而复杂的历史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消极的结果和积极的结果一样，也会对科学研究有益。斯大林个人迷信影响的反面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首要的一点是，只有在民主、公开性、党的原则性批评、对于科学干部及其成长和提高了的列宁式的关怀的环境中，真正的科学才能发展并达到顶峰。一个人的垄断对科学来说便是死亡。创造、探求、试验、假设、讨论——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繁荣之路。

苏共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强调指出：“理论问题不能也不应用任何命令来解决。需要智力的自由竞赛。只有如此，我国的社会思想才能取得胜利，它的预测能力，也就是说，可靠地制定党的政策的能力才能增强。”^②

（原载《苏共党史问题》1988 年
第 5 期第 58—70 页）

（沉坚译 孙魁校）

^② 《苏联共产党全会材料。1988 年 2 月 17—18 日》1988 年莫斯科版第 10 页。

列宁主持召开的人民委员会会议 第4—10号记录^①

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1日会议
11时会议开幕⁶⁰

第6号

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叶利扎罗夫、斯图契卡、安东诺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博哥列波夫、库佐夫科夫、阿克雪里罗得、斯大林、格列博夫⁶¹。

听取了：

1) 库佐夫科夫关于城市不动产国有化草案的报告。

博哥列波夫关于同一题目的报告，该报告对库佐夫科夫的报告作了一些更正，即建议在实施国有化法令以前作为临时措施征收一个月的房租。

决定：

1) 责成博哥列波夫和库佐夫科夫同志组成一个委员会（布罗夫、库兹明、弗拉基米罗夫即舍印芬克尔），以研究、制定和审定有关下列问题的相应法令：

① 没收房屋。

② 从12月1日向国库交纳

① 1917年11月19—24日召开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10号续登（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5号见《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2期第59—73页^②）。日期一律按旧历。

由列宁列入1917年11月23和2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日程的几个事项用黑体字刊出。

在为这里发表的记录所加的注释中指明了记录中提到的人当时在国家系统中所担任的职务。在注61、68、76、82中只提供了关于没有参加以前几次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人的材料。

② 见本刊1988年第4辑。

2)市杜马选举委员会(三个资产阶级控制的地区)两位代表关于必须用在彼得堡立宪会议上获得了席位的各党的代表制来代替选举(因为估计立宪民主党会抵制选举)的声明。

3)博哥列波夫的报告——所得税新条例草案⁶³。

4)博哥列波夫关于下列问题的报告:

①禁止支付有息证券的息票,⁶⁴

②禁止支付已解除职务的官员的薪金⁶⁵,

③禁止从上面发放退休金⁶⁶,

④禁止向教会设施支付资金。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9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6号第2张。
原件。

房租。

③采取防止城市机制可能陷于混乱的绝对必要的起码措施。⁶²

2)重申选举的必要性。不采纳用各党的代表制代替选举的建议。

3)转交委托博哥列波夫同志成立的委员会。

4)推迟到下一次会议再讨论这个报告。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

1917 年 11 月 21 日

1917 年 11 月 21 日 [晚] 议程⁶⁷

1) 克拉西科夫和科兹洛夫斯基关于马尼科夫斯基和马鲁舍夫斯基事件的声明。

2) 邦契 - 布鲁耶维奇关于政府的命令、法令等等——登载在《工农临时政府报》上的所有官方材料的出版手续的报告。

3) 阿克雪里罗得做关于取消税收制度中的限制的报告。

4) 关于任命人民委员会财政司司长。

5) 财政委员会关于按照未经预算司同意但需要紧急支付的预算预先部分支付 10 万卢布的申请 (弗·邦契 - 布鲁耶维奇的报告)。

6) 对从 500 万基金制度中拨付金钱的手续草案的修改意见 (由弗·邦契 - 布鲁耶维奇代表财政委员会提出)。

7) 关于批准给莫斯科市各区杜马苏维埃拨款 2000 万卢布。

8) 关于在企业主怠工的情况下地方苏维埃有权没收企业及其所有的货币资本的说明。

9) 以贷款方式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支付 5 万卢布。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 全宗第 19 号, 目录第 1 号,

卷宗第 7 号, 第 6 张。

打字稿。

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1 日会议

9 时 40 分会议开幕

第 7 号

出席会议的有：托洛茨基、叶利扎罗夫、波德沃伊斯基、克拉西科夫、明仁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格列加耶夫、柯伦泰、邦契-布鲁耶维奇、格列博夫、施利希特尔、奥博连斯基、彼得罗夫斯基、斯大林、拉斯科尔尼科夫⁶⁸。

听取了：

1) 克拉西科夫和科兹洛夫斯基关于马尼科夫斯基和马鲁舍夫斯基事件的声明。

决定：

1) 通过托洛茨基的决议：鉴于担任象陆军部长这样负责职务的马尼科夫斯基将军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即由他马尼科夫斯基负责管理的军队本身几乎一致承认的政权；

鉴于马尼科夫斯基、马鲁舍夫斯基将军等人采取的这种伪装和观望的反革命政策——苏维埃政权方面采取的纵容态度——引起了指揮官和一些部队（突击队员、哥萨克等）的动摇和骚乱，引起了革命群众的激愤，这又导致爆发内战（大本营、日洛宾等）和施用私刑；

鉴于这一切情况，人民委员会拒绝施略普尼柯夫、波德沃伊斯基和柯伦泰同志关于释放马尼科夫斯基，尤其是关于

委任他担任负责职务的建议；

人民委员会建议各位委员加倍努力清除各个反革命巢穴，不要一次再次地提出关于修改旨在反对反革命上层分子的工农专政制度的问题⁶⁹。

2) 以更正后的形式发表⁷⁰。

2a) 托洛茨基同志确定施略普尼柯夫声明理由事实不确切⁷¹。

3) 批准这一手续并将它通知所有委员及其秘书⁷²。

4) 批准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担任财政司司长职务⁷³。

5) 允许预付 10 万卢布。

6) 批准修改意见⁷⁴。

2) 刚刚收到的克雷连柯的电报。电文被严重歪曲。

2a) 施略普尼柯夫关于解除临时副工商业人民委员职务的声明。

3) 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官方材料在《工农临时政府报》上刊载的手续问题。

4) 奥博连斯基关于任命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为人民委员会财政司司长的建议。

5) 财政委员会关于按照未经预算局同意，但需要紧急支付的预算预先部分付 10 万卢布的申请（由邦契-布鲁耶维奇提出）。

6) 对从经人民委员会 11 月[19 日]会议批准的 500 万基金中拨付金钱的草案的修改意见（由弗·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财政委员会提出）。

7)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代表[罗森霍尔茨]同志关于批准给莫斯科市各区杜马苏维埃拨款 2000 万卢布的法令的申请。

会议结束。

下次会议定于 11 月 22 日晚 6 时召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19 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7 号 第 2 张。
原件。

7) 法令的文本暂不批准⁷⁵。

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2 日 会议记录

第 8 号

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柯列加耶夫、施略普尼柯夫、叶利扎罗夫、斯大林、埃森、阿克雪里罗得、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斯图契卡、邦契-布鲁耶维奇、施利希特尔⁷⁶。

听取了:

1)关于革命法庭的问题。

第 1 项
第 2 项
第 3 项
第 4 项
第 5 项
第 6 项

决定:

1)按下列各项分别讨论并全体投票(马·叶利扎罗夫弃权)批准草案。

一通过
一通过
一通过
一通过
一通过但是删去
一通过

第7项

一通过

第8项

一通过

宣读托洛茨基的决议：

通过托洛茨基的决议（一致通过，柯列加耶夫弃权）。

“①鉴于几个星期以前制定的革命法庭实施草案已经人民委员会、各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党团多次讨论，而且比较重要的分歧意见通过相应的修改已得到消除。

②鉴于各种偶然的、次要的、完全同法庭问题无关的原因妨碍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通过法律草案。

③鉴于如果不成立革命法庭，苏维埃政府就会完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政府就会对反革命犯罪的怠工束手无策。

④鉴于按照前例并且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有关这方面的决议，人民委员会有权在紧急情况下独立地通过法令，然后才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

⑤鉴于这一切情况，人民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这丝毫不侵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和权利）在今天的会议上通过关于革命法庭的法律并立即加以实施”。

埃森提出关于重新排列法令各项条文的修改意见。

对整个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进行表决。

2) 社会革命党(左派)关于推迟把候选人名单提交彼得格勒市杜马的期限的申请。

3) 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请求接受他们。

4) 出版委员敏金关于同不遵守广告法令的人进行斗争的措施的谘询⁸⁰。

下一次会议定于 1917 年 11 月 23 日晚 6 时召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全宗第 19 号, 目录第 1 号, 卷宗第 8 号, 第 2 张。
原件。

否决(一致)修改意见。

除两票反对(埃森和柯列加耶夫)以外, 全体通过⁷⁷。

2) 拒绝。11 月 23 日晚上 12 时为提交候选人名单的最后期限。在原定的日子进行选举, 无论如何不得延期⁷⁸。

3) 不接受。明天即 11 月 23 日派一个代表团去找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由施利希特尔、埃森和舍洛莫维奇组成⁷⁹。

4) 给敏金发出口头指示, 要采取最强硬的革命措施, 以实施广告法令。

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3 日 会议议程⁸¹

1) 最后批准关于给莫斯科苏维埃拨款 500 万卢布的法令(博哥列波夫)。

2) 委员会关于废除城市不动产私人所有制的报告(库佐夫科夫)。

- 3)关于给彼得格勒市电报局拨款 15 万(格列博夫)。
- 4)关于给邮电职工拨款 50 万卢布以增加工资(格列博夫)。
- 5)关于财政纲领的报告(库佐夫科夫)。
- 6)关于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委员们发薪金。
- 7)关于扩大 30 亿卢布的货币发行权(博哥列波夫)。
- 8)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拨给它专门款项以援助政治流亡者。
预先支付 2000 卢布。
- 9)出版事务委员敏金同志请求拨给他资金,以便能够在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
- 10)委员会关于同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谈判的报告。
- 11)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政府机关职员编制的报告。
- 12)批准关于把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资金转交给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
- 13)斯图契卡关于他那个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 16)关于赤卫队的报告。
- 17)反对怠工者的呼吁书(或法令)。
- 18)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拨款。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1 号,

卷宗第 4796 号。

原件。

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3 日

会议记录

第 9 号

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托洛茨基、施利希特尔、博哥列波夫、格列博夫、阿克雪里罗得、斯图契卡、叶利扎罗夫、埃森、绍特曼、斯大

林、彼得罗夫斯基、失业者、库佐夫科夫、邦契-布鲁耶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扎列日斯基⁸²。

听取了：

1)施利希特尔关于昨天派出的施利希特尔、埃森和舍洛莫维奇访问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2)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支持低级职员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宣读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3)失业者关于市政管理委员会实际情况的报告。

4)格列博夫关于邮电职工状况的报告和宣读彼得格勒市邮电职工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1 日的决议。

5)彼得罗夫斯基关于赤卫队情况的报告。

决定：

1)批准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决议并把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的决议一起付印⁸³。

2)责成托洛茨基和施利希特尔起草说明理由的答复。

3)备查。

4)责成格列博夫明天早晨召集委员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联席会议，拟定关于立即满足低级电讯职工要求和原则上满足中级和高级职工要求的法令条文⁸⁴。

5)责成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把未发的给军事部门用于反间谍工作的拨款交给军事部门并要求把一部份款项转用于支付赤卫队员的薪金。责成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尽快把一百万薪金转给赤卫队。采取革命措施并竭尽全力地加以贯彻执行，以便迫使工厂主支付赤卫队的薪金⁸⁵。

6)关于城市不动产国有化和征收房租的草案。

7)宣读关于撤销海军部部务会议的法令。

8)批准关于给莫斯科苏维埃拨款 500 万卢布的法令。

9)关于把货币发行权扩大到 30 亿卢布。

10)关于财政委员们的薪金⁹⁰。

11)关于给中央执行委员会 5 万贷款。

12)由边境警备小组主席同志提出的地方当局行政命令草案。

13)斯图契卡同志的报告。

14)格列博夫同志的报告。

6)人民委员会原则上通过草案并把它交给委员会，根据所提意见的精神加以整理，尽可能在明天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鲁达科夫、库兹明、埃森组成委员会⁸⁶。

7)法令获得通过⁸⁷。

8)以预算外贷款的形式拨 500 万卢布归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支配，以便向布朗雷工厂、古容工厂和其他从事国防生产的工厂发放短期贷款，贷款的条件由财政部确定⁸⁸。

9)否决⁸⁹。

10)批准委员们的请求（按普通数额）。

11)批准⁹¹。

12)征求州委员会的意见。

13)任命克拉西科夫和科兹洛夫斯基为司法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14)任命绍特曼和扎列日斯基同志为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全宗第 19 号,目录第 1 号,
卷宗第 9 号,第2—3张。
原件。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4日
会议议程

议事日程⁹²

关于提高烟草价格。
关于政府机关职工的编制。
关于所得税。
关于压缩国家开支委员会。
关于给邮电工作人员增加工资。格列博夫的报告。
关于出賣法庭(施略普尼柯夫)。
关于高加索的形势(斯大林)。

((救济部。))

|| 波兰委员部机关 ||

|| 铁路职工 ||

批准低级职员代表大会(?)……

银行问题……

|| 用电报形式发布法令……

参议院(斯图契卡)。

波德沃伊斯基关于同志们……

关于给莫斯科 2000 万。

关于没收各企业。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

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

卷宗第4803号。

原件。

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4 日

会议记录

第 10 号

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出席会议的有:托洛茨基、柯伦泰、明仁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斯大林、格列博夫、叶利扎罗夫、斯图契卡。

听取了:

1)关于在1918年1月1日以前提供1亿至1亿2000万卢布由救济人民委员部支配。

2)关于任命列辛斯基同志为波兰事务委员的设想。

3)彼得格勒铁路枢纽关于在各地成立铁路管理局的建议。

4)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提高烟草制品价格的报告。

5)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政府机关职员编制的报告。

决定:

1)把关于拨款的问题转给国库管理司,以便作出结论。

2)关于任命的问题推迟,直到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材料为止。责成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大林同志收集这些材料并在最短期限内提交人民委员会审查⁹³。

3)推迟到11月25日讨论⁹⁴。

4)通过了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提高烟草制品消费税和价格的报告⁹⁵。

5)通过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报告,提议他在下次会议以前

6) 格列博夫关于给邮电职工增加工资的报告。

7) 关于用电报发布法令。

8) 关于给莫斯科市各区杜马苏维埃贷款 2000 万卢布的法令草案。

9) 关于解释没收企业的权利。

10) 关于所得税的法令草案。

11) 关于成立压缩国家开支委员会。

12)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关于禁止按租船契约把俄国贸易法庭出卖、抵押和转交给外国臣民或机关之手的报告。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全宗第 19 号, 目录第 1 号, 卷宗第 10 号, 第 2 张。
原件。

起草法令草案⁹⁶。

6) 通过了格列博夫同志提出的 11 月份增加工资 60 卢布的建议⁹⁷。

7) 在俄国全境都用电报发布法令。

8) 通过法令⁹⁸。

9) 把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分别寄给所有苏维埃⁹⁹。

10) 通过了由博哥列波夫同志起草的关于所得税的法令¹⁰⁰。

11) 成立专门的财政部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代表协商委员会, 该委员会有权邀请军事部门的代表。

12) 通过 1917 年 11 月 24 日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拟定的法令¹⁰¹。

(王士云译)

注 释

60 根据 1917 年 11 月 20 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人民委员会特别会议于 11 月 21 日早晨召开,以便讨论苏维埃政府财政政策的总方针、关于实行新税收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城市不动产的法令草案等问题(见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0 日会议记录第 5 号第 10 项和这次会议议程——载《马列著作研究资料》1988 年第 2 期)。

61 彼·伊·斯图契卡是临时副司法人民委员,И·В·库佐夫科夫是莫斯科委员会财政局局务委员会委员。

62 在 1917 年 11 月 18、20 和 23 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见《苏共历史问题》1987 年第 11 期第 8 页、1988 年第 2 期第 66 页)。

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舍印芬克尔)(1879—1925)是彼得格勒市参议会的工作人员。

布罗夫和库兹明的职务及其名字父名没有查明。

63 1917 年 11 月 24 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征收直接税的法令,1917 年 12 月 6 日又批准了关于授权地方苏维埃有权为前九种纳税人减少所得税税额的决定(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 1 卷第 141—142、549—550 页)。

64 1917 年 12 月 23 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停止支付息票和股息的法令(见上书,第 285 页)。

65 为了发展这一条例,1917 年 12 月 20 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停止给原国务会议成员发放生活费(见上书,第 265—266 页)。

66 1917 年 12 月 11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停止发放超过 300 卢布的退休金的法令(见上书,第 212—213 页)。

67 议事日程是根据保存在与记录有关的材料中的一份打字稿刊印的,列宁的那份文稿没有保存下来。

议程的九个问题中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研究了六个。第三个问题即 A·E·阿克雪里罗得的报告涉及的大概是授权地方苏维埃为前九种纳税人减少所得税税额的问题。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2 月 6 日批准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见上书,第 549—550 页)。1917 年 11 月 24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第八个问题的决定(见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0 号第 9 项),1917 年 11 月 23 日通过了关于第九个问题的决定(见人民

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号第11项)。

- 68 列宁没有参加11月21日晚上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因为从17点30分起他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在那里他为他的关于罢免代表权利的法令草案作了辩护(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314—315页,316—318页)。

参加11月21日晚上人民委员会会议的,除了参加上午会议的那些人以外,还有:安·卢·柯列加耶夫——农业人民委员,亚·米·柯伦泰——国家救济部人民委员,彼·阿·克拉西科夫——彼得格勒委员会侦查委员会主席,维·鲁·明仁斯基——财政部临时副人民委员,瓦·瓦·奥博连斯基——国家银行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内务部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陆军副人民委员,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伊林)——海军总参谋部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临时副粮食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劳动人民委员和临时副工商业人民委员。

- 69 见1917年11月19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号和注32(《马列著作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 70 指的是用电报传送的1917年11月21日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就同敌军签订停止军事行动的条约的程序给各军的命令,电报发表在1917年11月23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6号上(见《苏维埃政权在胜利前进》第1卷第103页)。
- 71 临时副工商业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给人民委员会递交了如下声明:“鉴于人民委员会拒绝讨论关于我们的工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我无法担任工商业委员的职务。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9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7号,第5张)。在这个文件中有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语:“人民委员会秘书附记。为了回答施略普尼柯夫的声明,托洛茨基同志确定,‘在亚·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声明中有事实上的不确切之处。人民委员会没有拒绝讨论关于工业政策的问题,但是不想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因为不希望打乱议事日程,而且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缺席’。秘书尼·哥尔布诺夫”。
- 72 1917年11月17日列宁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政府法令和命令生效时间的法令,1918年1月27日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编纂并出版立法文

件和政府文件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03, 448—449页）。

在这份人民委员会记录所附的材料中，关于发表政府正式文件程序的文件经过批准的文稿没有保存下来。历史学博士米·帕·伊罗什尼科夫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大概找到了这一文件的草稿（见米·帕·伊罗什尼科夫：《苏维埃中央国家机构的建立》第144—145页）。

73 人民委员会财政司是根据1917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20—122页）。11月22日列宁签署了关于任命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为这个司司长的决定，11月24日这个决定发表在中央各报上（见上书，第584页）。

74 见1917年11月19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号第23项（《马列著作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75 在1917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批准了这个法令的文本。见1917年11月19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号第12—13项（《马列著作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76 A·E·阿克雪里罗得——副财政人民委员。爱·爱·埃森——临时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

77 这个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24—126页；也可参看1917年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号第14项；1917年11月1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号第9项；1917年11月19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号第7项（《苏共历史问题》1987年第10期第31页、1987年第11期第5页、《马列著作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1917年11月2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同意人民委员会关于法庭的法令，关于提出革命法庭审判员和委员、主席候选人名单，关于地方法院审判员选举的决定（见《苏维埃政权在胜利前进》第1卷第182页）。

为了执行1917年11月2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法庭的法令，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侦查委员会全权代表Γ·O·达姆贝格关闭了设有军事检察院和军事侦查员办公室的执政参议院以及彼得格勒商业法院。已起草了关于这些措施的文件，为了保卫被撤销机关的财产和事务，派出了岗哨（见1917年12月15(2)日《真理报》）。

78 在人民委员会讨论这个申请之前,左派社会革命党把这个问题提交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审议。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2 日晚间会议记录中有如下记载:“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关于因技术原因必须推迟中央杜马选举的声明。问题转给人民委员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 3 卷第 257 页)。大概在 1917 年 11 月 23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会议,会上签订了如下协议:“①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917 年 11 月 24 日会议上批准解散杜马,而且左派社会革命党投票赞成改选杜马的决定。同时对不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颁布人民委员会的法令提出抗议。②定于 11 月 27 日和 28 日进行选举。③节日从 11 月 26 日改为 28 日。④提交名单的期限延长到 11 月 25 日夜 12 时以前截止,把此事通告选民。布尔什维克代表雅·斯维尔德洛夫。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弗·卡列林”(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17 号,目录第 1a 号,卷宗第 83 号,第 3 张)。根据这一协议,1917 年 11 月 24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批准 1917 年 11 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法令、关于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 1 卷第 91—92 页)和关于决定在 1917 年 11 月 27—28 日进行选举的决议(同上书,第 138 页),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上述法令(同上书,第 139 页)。

新选出的彼得格勒市杜马第一次会议于 191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9 时召开。杜马通过了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贺词,选举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为杜马主席,选米·伊·加里宁为市长。出席会议的有 103 名议员(《苏维埃政权在胜利前进》第 1 卷第 185—186 页)。

79 在 1917 年 11 月 23 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团报告了谈判的结果(见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9 号第 1 项)。

80 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广告实行国家垄断的法令发表在 1917 年 11 月 8 日中央各报上(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 1 卷第 55—56 页)。根据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该法令于 1917 年 11 月 22 日生效(见《工农临时政府报》1917 年 11 月 18 日第 14 号)。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1 日晚间会议上,出版事务委员亚·叶·敏金为了执行人民委员会的这项法令要求派 100 名水兵。1917 年 11 月 22 日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海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给敏金派出水兵(见《彼得

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3卷第232、262页)。1917年11月22日出版的登有广告的所有报纸都被查封了。

- 81 议事日程是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提出的。在讨论这个议程时列宁补充了三个问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过程中他删去了议程第3、4和10项。人民委员会没有审议议程的第5、8、9、11、12和17个问题,并讨论了未列入议程的4个问题(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号第3、7、12和14项)。

把关于拨出援助政治流亡者资金的问题列入议程(第8项)的根据是下列文件:“呈人民委员会。附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记录摘要,请求采取紧急措施援助政治流亡者。主席雅·斯维尔德洛夫。秘书”,和所附的“记录摘要。在今年11月21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下述关于流亡者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4号)。

①请求人民委员会拨出专门款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外代表或地方流亡者委员会支配,以便援助返回俄国的政治流亡者。②给中央执行委员会预付2000卢布作为援助政治流亡者的基金,以便初期给所有贫困流亡者以物质支持。③责成委员会拟定援助政治流亡者委员会组织章程。书记瓦·阿瓦涅索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5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1913号,第5、7张)。

Д·В·库佐夫科夫关于财政纲领的报告(第2项)大概涉及三个法令草案:关于废除间接税、关于实行财产税和浪费税。所有这些草案都在1917年11月2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

1917年11月2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А·Е·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政府机关职员编制的报告(第11项)(见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号第5项)。

关于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资金的问题(第2项)是由于这个机关拒绝承认苏维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拒不把事务和资金转交给它而产生的,这些资金实际上成了对反革命的物质支援。例如,1917年11月25日以前,给“拯救委员会”拨付了94000卢布,为了组织1917年11月28日的反革命游行示威又拨付了1万卢布。1917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17年11月19日的决定,禁止所有信贷机关给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支付现金、有息证券和其他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29—130

页)。1918年1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接收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货币结算和属于它的所有款额的决议(同上书,第389—390页)。

关于颁布反对怠工者的呼吁书或法令(第17项)的问题,显然是同授权地方苏维埃没收怠工企业主的企业相联系的。在1917年11月2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见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号第9项)。

82 M·失业者(德·扎·曼努伊尔斯基)是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B·H·扎列日斯基是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亚·瓦·绍特曼是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83 1917年11月20日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同意承认苏维埃政权,条件是把铁路经济管理局转交给它,人民委员和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将按照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水路交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议选举产生(见《工农临时政府报》1917年11月20、28日)。1917年11月22日列宁就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同马·季·叶利扎罗夫进行会谈。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全俄铁路代表大会的上层人物由于采取所谓“中立的”立场而帮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忙,因此“为了整顿铁路事业,保证苏维埃政权同铁路工人大军的最紧密联系并改善那些最困苦的铁路员工的物质状况,人民委员会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立即召开全俄铁路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31—132页)。

在1917年11月2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马·季·叶利扎罗夫或者亚·格·施利希特尔大概已经把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召开铁路代表大会的消息告知列宁。因此,列宁在这次会议日程上写道:“①管理人员和群众……②三级选举和直接选举……1917年11月23日全俄铁路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在12月10日召开代表大会(全体)”(《列宁年谱·俄文版》第5卷第81页)。

84 1917年12月5日,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关于发给邮电职工附加津贴和拨款1百万卢布以预付的形式资助邮电职工合作社的决定(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82—184页)。

85 在这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以后,列宁签署了给内务人民委员的一项命令,“从原内务部1917年预算中筹出2162000卢布的资金并把这笔钱作为

活期存款转到赤卫队中央卫戍司令部帐户上去”(《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54页)。这笔拨款为赤卫队的定期财政支出奠定了基础。

- 86 这个问题列入了1917年11月25日和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日程,但是没有讨论。法令于1918年8月20日通过(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3卷1964年莫斯科版第232—236页)。法令草案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33—137页。随着这一问题的的发展,1917年12月1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禁止不动产交易的法令(见上书,第240页)。在1917年11月18日和20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初步讨论了这一问题(见《苏共历史问题》1987年第11期第8页;《马列著作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 87 在1917年11月13日海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会议上,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帕·叶·德宾科声明:“海军部部务会议被撤销,成立由选举产生的人员组成的特别海军委员会来代替它”(《苏维埃政权在胜利前进》第1卷第87页)。

同法令草案一起交人民委员会的还有一封短信:“海军部部务会议原来就是海军部门狭隘范围内的立法机关。这丝毫没有侵犯国家杜马的特权,相反,倒减轻了杜马的工作,使它摆脱了琐碎事务。当然,将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是有权迫使整个舰队接受自己意志的最高权力机关。代海军事务人民委员、海军总参谋部委员伊林(拉斯科尔尼科夫)中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9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9号,第9张)。

人民委员会的这项法令于1917年11月23日由列宁签署,并发表在1917年11月28日中央各报上(《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30—131页)。

- 88 1917年11月24日列宁签署了这项决定,次日该决定发表在《工农临时政府报》上(同上书,第147页)。在1917年11月19、20和22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 89 在1917年11月1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人民委员会责成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与财政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拟定法令草案”(《苏共历史问题》1987年第11期第6页)。

- 90 讨论这一问题是与下述声明有关:“呈人民委员会。我们,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们,请委员会注意必须尽快解决关于确定并支付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们薪金的问题,他们几乎全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官员

们怠工,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按照部的拨款支出这笔费用。那样做也并不总是合适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把专业技术员留在他们从前所从事的岗位上,并且在他们旁边派委员进行政治监督。因此,上述费用应当从人民委员会的500万基金中支出。这笔基金实际上首先应该用来支付人民委员会的经费及其代表的薪金。我们坚决要求迅速审议这个问题。维·明仁斯基,德·博哥列波夫,瓦·奥博连斯基,瓦·索洛维约夫,安·阿克雪里罗得”。声明上有一个批示:“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批准。列宁”(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4795号)。

- 31 1917年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给人民委员会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建议讨论附去的关于拨出所提几笔款额的法令草案。我认为拨款是极端必要的。如果不可能支付两笔拨款的话,我要求给外埠局拨3万和2万。我可以担保,这几笔款项的支出是正确的。雅·斯维尔德洛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5号,目录第1号,卷宗第1913号,第6张)。在1917年11月2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再一次审议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埠局3万卢布用于向俄国各地派遣鼓动员和外加2万卢布以及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5万卢布用于无偿分发印刷品的两项决定(见《历史文献》1957年第5期第8—9页)。

- 32 议事日程原来由5项议程组成。在讨论议程时补充提出了由列宁亲手加上的12个问题。所有问题,除了关于高加索形势这项议程以外,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和在人民委员会会议进程中都被列宁删掉了。

在11月2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号中,关于低级职工代表大会的问题,关于参议院以及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副海军人民委员的问题,银行问题,没有得到反映。由于银行问题,大概谈到了关于撤销贵族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银行的问题。1917年11月2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有关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48—151页)。

彼·伊·斯图契卡提出关于执政参议院的问题,显然同1917年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关于法庭的法令一事有关,根据这个法令,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应该撤销。执政参议院于1917年11月29日关闭。

在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关于同志们……》的报告中,可能谈到了

1917年11月23日列宁签署的关于任命米·谢·克德罗夫、波·瓦·列格兰和埃·马·斯克良斯基为副陆军人民委员的决定(见《十月革命法令汇编》第173—174页)。

- 93 1917年11月24日斯大林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下述决定草案：“任命尤利安·马里安诺维奇·列辛斯基为波兰事务人民委员(职权：清理事务、军事事务、难民事务等等)。任命卡济米尔·亨利霍维奇·齐霍夫斯基为副人民委员”(米·帕·伊罗什尼科夫《苏维埃中央国家机构的建立》第238页)。波兰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C·C·佩斯特科夫斯基的短信中作了更加详细的叙述：“①把所有完全或部分靠国库资金而存在的机关都掌握到自己手中并按民主的方法加以改组，如a撤销波兰事务委员会；b救济波兰难民的机关；②监督波兰士兵，改组和复员波兰的部队和士兵；③在自决的基础上共同维护波兰民族的权利”(同上)。

1917年11月27日，人民委员会任命尤·马·列辛斯基(1888—1937)为波兰事务人民委员。

- 94 1917年11月2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关于1917年12月10日召开铁路职工代表大会的消息在各家报纸上发表并通过电报传送这一消息，而且还发表彼得格勒铁路枢纽铁路职工的呼吁书。1917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临时副交通人民委员马·季·叶利扎罗夫的电报，1917年11月28日发表了彼得格勒铁路枢纽铁路职工苏维埃的宣言《告俄国整个铁路网的全体铁路职工》。也可参看1917年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8号第3项。
- 95 1917年11月2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烟草制品消费税和价格的决议，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43—144页。
- 96 A·E·阿克雪里罗得于1917年12月11日在人民委员会上做了下一次报告。责成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成立由劳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机关职员工会和基层职员工会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
- 97 1917年11月24日，列宁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邮电职工物质状况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545页)。该法令草案发表在1917年11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24号上。
- 98 列宁对法令草案的第二项做了修改(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

145 页)并且在 1917 年 11 月 24 日签署了法令原本(同上书,第 146 页)。

99 见上书,第 546 页。

100 关于征收直接税的法令,见上书,第 141—142 页。

101 见上书,第 140—141 页。列宁对法令的最初文本作了修改(见上书,第 140 页)。

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

——恩·德朗克传略

〔民主德国〕伊·洪特^①

从德国工人运动开始到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后，被迫经历数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活，而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自然为数不多，而恩斯特·安得列阿斯·多米尼库斯·德朗克便是其中之一。

早在三月革命前，德朗克就将自己的命运同工人阶级及其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联结在一起。1848 年革命使他进入这个党的领导班子。他同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沙佩尔、莫尔、维尔特、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和毕尔格尔斯等人密切合作，担任过秘密特派员，是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最主要的是他还曾任《新莱茵报》编委。在革命时期以及后来 1852 年同盟解散以前的几年，是德朗克政治活动的巅峰时期。

这位年仅 26 岁的文人 1847 年 12 月刚刚加入同盟，怎么能在 1848 年春便几乎一举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高峰呢？个中缘由，从传记学的角度来看很是引人注目。其实，在那以前他就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和深刻的发展过程。

早在 1846 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着重阐明：鉴于德国当时的形势，“真正的”社会主义想把共产主义的观念同流行的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同时，“以下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

^① 柏林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员。——译者注

样的转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②

德朗克从1839年到1847年的发展正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在这一短短的时期里，他走过了这样一条复杂的认识道路：在他的父亲——一位有成就的教育家和博学的学者——的教育下，他从最早接触的启蒙运动思想和古典唯心主义思想经由黑格尔哲学走向青年黑格尔主义，又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到接受共产主义的观点，最终投入革命的实践活动。

他于1822年8月17日出生在莱茵—普鲁士地区的科布伦茨。17岁的恩斯特在出色地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之后，便离开家乡到波恩大学学习法学。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在波恩、马尔堡和柏林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法学、哲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基础知识，但是他同也在这个大学的法学系学习过的海涅和马克思一样，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法学家。德朗克有着和他们相同的遭遇：因为从事学生联络活动而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并很快被赶出波恩大学。

德朗克密切关注着在黑格尔哲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所展开的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德国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他试图辨清其中不同的哲学流派，并且逐渐认清，黑格尔学派的左翼是最为进步的。他之所以达到这一重要认识，是因为他有幸在上述三所大学里听过几位坚定的而又各具风格的青年黑格尔派学者的讲课。《莱茵报》唤起了大学生德朗克的火热激情。从1842年10月起，马克思担任了科隆这家报纸的主编。德朗克称赞这家报纸是“在德国报界困难重重的黑夜里突然高高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并且认为：它“在德国新闻史上无疑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而当之无愧”。^③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7页。

^③ 参看恩·德朗克：《柏林》184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卷第216页、第2卷第113页。

德朗克不仅仅对该报表示了完全的赞同，而且在1846年以前，他还自己的一些文章和《柏林》一书中，就个别问题引用了《莱茵报》上的观点。

然而，他所持的这些观点却使他很难走上普鲁士官员的仕途，当1843年底与1844年初柏林大学里的一场新的反动压制浪潮到来时，不仅瑙威尔克遭到校方的驱逐，而且学生民主运动也遭受了打击。就在那时，德朗克原来设计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他与法学、与家庭的观点决裂了，开始作为一名独立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在柏林工作。

他成为伊·库兰达在莱比锡编辑出版的《国外消息》驻柏林的通讯员，但他也在其他一些大多是民主派的报刊，如《科隆日报》、《法兰克福报》、《曼海姆晚报》等报刊上发表通讯、文艺评论、诗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随笔。他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柏林生活。由于德朗克真正履行了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从而引起民主派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注意，并且得到了他们某种程度的肯定。1844年底，莱茵地区的民主主义者赫·皮特曼出版了《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其中也收入德朗克的几首诗，如《晨的召唤》、《莱茵之歌》与《情歌》。这样，年轻的诗人德朗克就同《公民手册》的其他作者，如斐·弗莱里格拉特、格·维尔特、沃尔夫冈·穆·冯·柯尼希斯温特尔、卡·格律恩、雅·费奈迭、莫·赫斯、弗·恩格斯、威·沃尔弗一起——尽管当时他们各自的主张已经明显不同——代表着德国学术界的广大反对派。因此德朗克那时第一次同莱茵地区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赫斯有了联系也决非偶然。后来1846年赫斯在考虑改组《社会明镜》编辑部成员时，曾打算争取德朗克担任第二编辑。

他阅读过阿·卢格、马克思及另外几位对政府持反对观点的青年黑格尔派人士的著作、恩格斯的《乌培河谷来信》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法年鉴》的双刊号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到1845年为止，他就已经对马克思以前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工

人共产主义有了一定了解,就是说他不仅读过路·冯·斯泰因的书,而且也读过遭到查禁的威·魏特林的一些著作。他认为,魏特林“证明了自己对形势的理解比起有些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政治家远为敏锐”。

这位勤于笔耕的文学家将其理论与对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实际了解结合起来:他多次走访了柏林和诺瓦韦斯的工人住宅区和工厂,对劳动者生活的贫苦与困顿感触至深。他的这些研究与观察,加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所留下的印象,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作为“国家的基石与支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这个社会 and 保障有产者少数生存的力量;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完全恢复劳动人民被剥夺了的人的权利和生活的权利;实现这些目标的第一步是对劳动大众进行“不断深入的教育”,以促使他们实现“从迷信到认识的过渡”。他的这些观点中尚有许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

因此,德朗克开始参加成立于1844年4月的德国手工业者联合会的会议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联合会章程强调不问政治,然而不久以后却讨论起一些有关哲学与政治的现实问题了。有几位热衷于此的教师和报告人,德朗克本人是认识的,如爱·梅因、弗·爱·施米特及卡·弗·科本。他们以秘密的方式从事反对德国现存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活动,捍卫人人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向他们的听众介绍马克思以前的法国社会主义的几个观点。

还有个别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加入了手工业者联合会。在他们的支持下,弗·门特尔于1845年底建立起一个比较大的和非常活跃的同盟组织。这时德朗克已被驱逐出柏林,但是他借助于跟梅因的通信与这一发展保持着联系。另外,他结识了赫斯,并通过赫斯还认识了在科隆的其他正义者同盟成员,从而和正义者同盟继续保持接触。德朗克在1845年8月因其进步的文学活动而遭警方驱逐,被迫离开柏林,在此之后,他在萨克森度过了短时期的不安定生活并且屡遭警察驱逐,而后才得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

市定居下来。在1846年间,他曾两次离开那里前往科隆探访赫斯。德朗克当时自觉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而且赫斯也如此看待他。

到1846年夏,德朗克在法兰克福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柏林》。这部著作于同年10月分两卷由吕滕-莱昂尼因出版社出版。在此书的前几章里,他以松散的新闻报道的体裁记述柏林这座大城市的社会生活,随即转入对1840—1845年的普鲁士历史作一番严肃的分析,进而对当时处于革命前夜的普鲁士统治制度加以根本否定的批判。尽管成书仓促,且其中有几个部分的内容前后矛盾和不相一致,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巨大成就,在半个世纪以后,它还获得弗·梅林的高度赞赏。从传记学的角度来看,《柏林》这部书表明作者本人正在摆脱所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然而总的看来,他在这样一个迅速的转变过程中,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此期间,普鲁士当局查禁了所有他写的书籍,有步骤地阻挠他定居,并且通过提拔他为约·康·施特瓦格博士(一位从前的神学副博士和当时的政府特务)的书纪员,甚至以资助他作第二次科隆之行的手段,来监视他的行踪。当普鲁士当局看到已无法阻止《柏林》一书的出版时,他们策划了在德朗克与赫斯,可能还有其他几个正义者同盟盟员会晤时逮捕他,而后在柏林法庭对他提起一个以期引起轰动的反共产主义的诉讼。

然而,就是这个计划也落了空:1846年11月24日晚,当德朗克所搭乘的菜茵河轮船抵达科隆时,他察觉有人监视并摆脱了他,在科隆“搞了”两天的“阴谋活动”,未见有人打扰。直到11月27日,他在返回法兰克福的途中被捕。而且,当警察在那天晚上采取行动时,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处理了所有会给他带来麻烦的文件。因此当局只能凭《柏林》这本书和密探的报告来起诉。1847年4月10日他被判处两年监禁,并被科以罚款。而在5月6日二审时,他被减轻了处罚,只被判处要塞监禁。在申诉法庭上,德朗克公开

承认信仰共产主义。1847年5月29日，他被带到地处下莱茵州的韦塞尔开始服刑。

监禁并未能断绝他与科隆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系。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弗·安内克立即在科隆积极开展活动，建立同盟的第二个支部。到1847年底，这个支部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在它的成员中，起码赫斯就是德朗克的老相识。德朗克在韦塞尔要塞服刑期间，曾多次遇到弗·冯·博伊斯特少尉——他是安内克和维利希的朋友。当维利希在1847年1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成为这个同盟的成员时，他就接受了这样一项任务，去看望关押在韦塞尔要塞的德朗克，并通知他，支部已决定接纳他为其成员。这个决定大概是在1847年12月28日到1848年1月1日期间作出的。恐怕未曾有第二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是在那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下被接受入党的。那是在巴黎二月革命前的几个星期，二月革命导致了3月3日在科隆爆发最初的几起革命事件。安内克和维利希作为示威游行的领导者遭到逮捕，博伊斯特3月10日在韦塞尔被捕肯定与此有关。还有德朗克恰好于博伊斯特被捕后的一天从要塞越狱也与此有关。

德朗克逃离韦塞尔后，他取道荷兰来到比利时。当时布鲁塞尔是欧洲政治流亡者聚集的一个中心，而且还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个区部的所在地。德朗克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后，马上探访了恩格斯，后者当时已担任布鲁塞尔区部的领导工作。见面时，他们俩彻底地交换了意见，德朗克被正式确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并开始与恩格斯建立了友谊——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三十年。不久之后，他们俩很可能是一起奔赴巴黎的。

当时虽然二月革命爆发已整整四个星期，在塞纳河畔的这座城市里，政治生活的脉搏仍在剧烈地跳动着。每天都有一些新的革命俱乐部成立。在卢森堡宫召开了约有200名工人代表参加的最初的一些会议，大会在路·勃朗的主持下起草了关于改善劳动者处境的一系列建议。就在那时，维也纳革命和柏林革命捷报频传，

激起了巴黎革命者的冲天热情。德朗克并没有置身局外，他立刻全身心投入同盟的活动。他作为德国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宣传刚刚为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即十七条“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还参与对海尔维格及伯恩施太德所提的那个冒险主义的义勇军计划的剖析，反对输出革命的企图。

法国革命刚一爆发，马克思就有了创办一家大型政治性日报的计划。马克思设想中的这家日报应能代表德国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利益。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将来共同工作的人选，即如何组织起革命者参谋部的问题。这样一个班子应能有效地维护共产主义者的有科学根据的策略。当时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成员都在巴黎，除马克思以外，他们当中不乏有才干和有经验的记者，如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和维尔特，这些人早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就已积累了重要经验。马克思在巴黎时就已选定这些坚定不移而又有高度教养的、阅历丰富而又能言善辩的革命者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而年轻的德朗克也被吸收进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然而以他迄今为止所走过的成长道路又是当之无愧的荣誉。

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了德国，取道黑森州前往科隆，并且从4月8日至11日在美因兹逗留，与那里的同盟盟员讨论关于继续进行初步尝试，将德国所有的工人协会从组织上统一起来的问题。德朗克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派员，首次旅行的使命就是促成各工人联合会同美因兹的临时中心的联系，他是在科隆从当时已设在那里的中央委员会受领此项委任的。1848年4—5月份他在科布伦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美因兹以及其他城市开展活动。德朗克曾就现有的同盟各支部的情况、关于建立新支部的尝试、关于各个工人联合会的状况、关于为办报而筹集股金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同盟政策作策略性改变的必要性等，给科隆的中央委员会寄了多篇内容详细的报告。

在完成第一次特派员使命之后，德朗克还多次为同盟的工作

而四处奔波。他作为同黑森州的左派民主主义者保持联系的联络员，直至8月中旬为止，不停地往来于法兰克福、科隆和马尔堡等地。首先他在由民主协会与工人联合会共同发起的马尔堡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被委派作为那里的代表参加了于6月14—1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工人联合会和各民主协会是分别应马尔堡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邀请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事实上是为了促成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民主运动的左翼的短期合作。德朗克作为《新莱茵报》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同时又是马尔堡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促成革命工人运动在这次革命中采取这一关键性的政治步骤时发挥了核心作用。

德朗克是马尔堡民主社会主义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任第二文书。他还积极参加了马尔堡体操联合会内部关于是否要拥护共和这样一个问题的争论，1848年中，这场争论导致体操联合会出现分裂。其中进步的一派于7月9日在马尔堡召开的黑森州各民主协会区域会议上加入了民主派组织。德朗克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选举出了区域委员会，并委托委员会成员每周出一份人民刊物。德朗克也是该机关报的撰稿人之一。

然而，从5月底开始，他主要是为《新莱茵报》撰稿。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报道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初期活动的情况。他出席了五十人筹备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5月18日以后又参加了议会的一系列会议，那时，他就已成为尚在筹备之中的《新莱茵报》的正式通讯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关于国民议会的有现实意义的报道。在6月1日出版的《新莱茵报》创刊号上，作为编委，德朗克的名字也被登在第一版，同时这一号还有他写的一篇评述法兰克福议会的社论。从创刊号开始，至少在最初几个月内，来自保罗教堂的报道占据了报纸的中心版面。国民议会是德国革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成果。这次革命的以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国民议会的活动。弗·梅林之所以给予德朗克在《新莱茵报》的工作

以相当高的评价，甚至将他称为该报编辑部的第四号人物——仅仅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之后，主要是因为德朗克为1848年夏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而写的那些报道及文章。

德朗克在《新莱茵报》上展示了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多方面才华。他不仅从国民议会发了若干篇类似会议记录的报道，而且还使用了几乎所有的新闻体裁，同时十分自如地把共产主义者革命策略的基本政治路线运用于议会的报道中。虽然这份报纸是公认的“民主派机关报”，但是它同样不留情面地批判无力继续领导革命的民主派左派。在每天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评论中坚持这样的态度是十分不易的。然而德朗克却指出并且证明，国民议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民代表机构越来越不去理会它的任务，反而愈加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它的怯懦决议毫无用处”。^④

在那个时期里，德朗克还就德国革命中的其他现实问题以及波兰人和捷克人革命斗争的现实问题写过几篇文章。在就波兹南问题而写的一组文章里，他详尽地探讨了1848年3月18日以后普鲁士政府的波兰政策。德朗克写道，波兰的分裂和普鲁士在波兰发动的那场野蛮的战争是“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反对民主制度的斗争”。

大约自1848年8月中旬以后，德朗克大部分时间住在科隆。他与其他编辑们一道积极投身于政治工作。这就是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加强对革命运动实际领导的直接参与”。这时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里的工作受到更大的重视，而德朗克在这两个组织中也担任着报告人的工作。

9月份，当革命初次决战到来之时，德朗克是莱茵省中最积极的民主派人士之一。当在科隆选举安全委员会——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机构——时，德朗克与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一道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多次在科隆的群众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页。

集会上发表演说。最后他因为9月17日在沃林根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而遭到普鲁士当局的通缉;来自科隆、杜塞尔多夫及邻近地区的约八千名居民听了德朗克的演讲之后,都一致拥护这样一个决定:将革命斗争继续下去,而不屈服于刺刀的淫威。

但是,法兰克福和柏林的议会没有站到人民斗争的前列,因而反动势力在九月危机之后进一步巩固了它们的阵地。为了躲避当局的逮捕,德朗克和恩格斯一起于9月26日夜里越过比利时国境逃离德国,然而几天以后他们俩在布鲁塞尔遭到逮捕,并被送往法国。10月7日他们到达巴黎。在那里,德朗克接替了斐·沃尔弗的《新莱茵报》通讯员的工作。

德朗克从巴黎发出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848年10月25日,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849年1月29日。在那段时间里,他总共写了²⁴篇无论语言还是政治内容都堪称杰出的文章。德朗克凭他的新闻记者的才干和清晰的专门知识开始探讨法国革命第二个时期的种种问题。马克思后来称这个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⑤1849年11月和12月,德朗克的通讯文章在对法国革命发展的估价上与马克思达到了前所未有且后来也不再有过的一致。总的来看,这恐怕是他在《新莱茵报》工作最为出色的时期。因此,他的那些文章中的一些评论及事例经过加工和概括而重现于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之中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

德朗克在1849年3月返回科隆之后,担任了《新莱茵报》的“意大利”栏目的主编工作。虽然这是他在《新莱茵报》的最后一项工作,但是他也出色地完成了。他几乎每天都为自己的栏目编写内容广泛的报道文章,充分运用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及瑞士等地的几十种报刊,不过有时也与这些报刊展开论战。他几乎给所有的消息加上简短的评论,也摘要发一些重要文献的原文,其间还自己写一些长篇综合分析文章,总之表达了对意大利人民革命斗争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8页。

的热情关注。

5月上旬,普鲁士反动当局用一连串的驱逐和起诉,迫使《新莱茵报》停刊。这时马克思给编辑部全体成员提出要向读者作令人难忘的告别这样一个任务。“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⑥ 马克思写了《致科隆工人》的声明;威·沃尔弗写了一篇精彩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新莱茵报〉的告别词》;维尔特发表了《给妇女们的号召》一文;斐·沃尔弗、恩格斯和德朗克这三位“外国事务家”则分别在他们各自的栏目——法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写了结束语。

然而,德朗克对意大利革命事件的研究并没有中止。1850年春天他为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把里恰迪的著作《1848年意大利革命史,及1849年前六个月大事记》(1849年巴黎版)译成德文。1851年春天他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科隆的中央委员会准备出的一份“新杂志”撰写一篇有关意大利情况的文章。这两部著述却未能发表。

普鲁士当局以德朗克是“非普鲁士人”为由,迫使他在5月19日以后离开科隆。据推测,德朗克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离开科隆的,他们先是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后来到了巴登和普法尔茨,当时,那里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正方兴未艾。德朗克在凯泽斯劳滕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告别,再一次返回法兰克福。

5月29日科隆当局再次以所谓诽谤国民议会议员为由对《新莱茵报》提起诉讼。德朗克被指控在1848年9月20日的一次科隆群众集会上发表过污辱议员的演说。三天之后,他在法兰克福近郊遭到逮捕,法兰克福警察局长想找出长期拘留他的根据,但未获罪证。他们在匆忙间却没有注意到,5月29日科隆地方法庭已经提起了一个诉讼案,因为此案德朗克要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页。

7月4日此案开始审理,1849年10月3日此案作出终审判决,10月4日起,德朗克又遭到通缉。

不过那时德朗克早已住在巴黎,他大概是6月初来到那里的。在8月底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之前,德朗克一直与他进行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比如支持马克思筹备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工作。德朗克与布朗基主义者及当地革命俱乐部之间的良好关系,肯定方便了马克思和巴黎的无产阶级领导人商谈关于利用1849年6月13日的群众示威行动使之成为一个持久的革命过程的序幕。然而,那次示威行动令人遗憾地失败了。

从那时起,德朗克便隐匿在巴黎,从1849年秋到1850年春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写通讯报道。关于给《新德意志报》撰稿一事,早在他离开德国之前就与该报编辑魏德迈和吕宁谈妥了。他在这些文章里为布朗基辩护,尖锐抨击蒲鲁东。这些文章是在当时外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写成的,文章对政治形势的清晰认识,跟马克思当时的考虑相近。法国警方获知了德朗克的秘密住处,于1850年3月24日逮捕了他。他被驱逐出法国以后,3月31日动身前往法兰克福。到那里以后,他立刻与魏德迈一道致力于当地同盟支部的改组工作,这项工作是同清除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革命集中”的影响以及在黑森州“工人兄弟会”里的宣传活动结合进行的。德朗克在附近的威斯巴登跟卡·沙佩尔以及跟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来的特派员亨·鲍威尔的接触中,很快就理解了新形势下革命任务的实质,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作为它的特派员领导巴登和瑞士两地的党的改组工作。

1850年7—9月,德朗克不顾条件改变所造成的不利,在瑞士的许多城市里义无反顾地开展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例如作为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谈判代表同“革命集中”的周旋当中,显示其灵活的政治手腕。

但是,由于几乎所有在瑞士的政治流亡者遭到了驱逐,德朗克也无法在那里继续活动了。1850年9月间,同盟发生了分裂,德

朗克的特派员使命也告完结。他的移居意大利北部的计划没能实现，不得不于1852年2月底离开瑞士。途经巴黎时他再次被捕，后于1852年4月底抵达伦敦。

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许多德国政治流亡者一样，德朗克也在英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流亡中的重重磨难。由于不能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他被迫当了商人。他经过很多努力，才于1853年在布拉特福德当上帕萨温特纺织公司的职员。从1857年起，他在设于利物浦及格拉斯哥的许尔瓦矿业公司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他以独立的经纪人的身份从事多年国际间的商品交易活动。有时候，他的生意还带有风险性。因为德朗克无论从其秉性、所受的教育，还是从其阅历方面来说都不适于经商，所以他从未致富。在他与一名农民的女儿玛·克拉克结婚之后，他的收入仅能够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大家庭的生活。

在流亡的最初几年里，他仍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852年，他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撰写《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抨击性著作，并且参加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审讯期间的一切行动。1853年春，他还参加了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寄送工作。同年底，他支持马克思与侨居美国的威·希尔施和奥·维利希的诽谤性攻击作斗争，并且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的《改革报》（当时该报处于魏德迈的影响之下）撰写文章。

1854年以后，他大大减少了政治活动，但这也决不意味着他脱离了政治。现在看来，1855年，他还曾应马克思的请求时而为《新奥得报》撰写通讯。1860年，当马克思为写作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收集材料时，德朗克与他有过多联系。1864年，他在曼彻斯特同马克思、恩格斯一道参加了威·沃尔弗的葬礼。他可能也是成立于同一年的第一国际的成员。1865年，马克思同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打算利用德朗克的经济资助，通过购买英国工联机关报《蜂房报》的尽可能多的股份，来把它控制在总委员会手中。1867年，德朗克请求马克思将曾答应送给他的当时刚刚

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寄给他。1871年，德朗克也参加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传播工作。在1877年以前，他曾与恩格斯保持通信联系，而他与马克思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保持到1882年，所以，马克思的家庭影集中有德朗克60年代的两张照片就并非偶然了。

德朗克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后来由于重病缠身，再加上过早地失去了他几乎所有的孩子，他在利物浦附近的旺姆海滨度过了凄凉的晚年，于1891年11月2日逝世。

原载民主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

1988年第3期第376—386页

（王竞译 王宏道校）

法国的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①

洪 饒 德

一

虽然法国的人类学开始得相当早(第一个人类学学会在1859年成立,第一个人类学学院也在1879年便建立),但到上世纪末法文的anthropologie却是指以生物学的眼光来进行人类各族的比较研究,也即相当于英国的体质或体态人类学。至于以人文或社会的观点去研究各民族的生活习惯、思想言行之学问,法国人称为民族学(ethnologie)。民族学是建立在有关原始土著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生活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通称的民族志 ethnographie)之上。在法国,民族学隶属于社会学(sociologie)的范围之内。

当杜尔凯姆莫立他的社会学派及其《社会学年鉴》时,其社会学理论当然深刻地影响到民族学的研究。不过他及其跟随者多属于安乐椅上的理论家,未曾临场作过实地的调查考察。在这种情形下,有关民族志资料素材的搜集和整理仍旧操纵在殖民地行政官员和传教士的手中。

及至莫塞和吕·列维·布鲁尔等在巴黎大学设置民族学研究所(1926)之后,民族学才脱离社会学的笼罩而自行独立、自求发展。法国民族学集中研究“原始社会”,把原始社会当成“整体的社会现象”看待,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视为整体的同时表述。莫塞的研究法在于强

^① 洪饒德是台湾新竹人,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的高级讲师,本文摘自他的新著《新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科学》。——编者注

调人类的行为必须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方面来观察，两者是相辅相成，宜同时合用，不得偏废。虽是这么说，但民族学研究所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者多集中在现场、实地和田野研究之上，很少人留意理论的钻研，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马·葛利欧所率领的苏丹和非洲的民族探访队，只求民族志的探索，而非理论营构。他们企图了解土著的世界观，即他们的群体想法，从而认识其社会组织的原则，而不是其社会体系、或社会关系的本质。另一方面则致力收集各族的资料、地方志、民俗志，作为人类博物馆的收藏。在这种哲学理想主义色彩下，战前法国民族志几乎忽视民族的历史，也不能探究殖民政制和社会文化的变迁等现象。

克·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著作，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是法国传统(战前)民族志的传承，他只重视上著民族上层建筑的现象，诸如神话、“原始想法”等等。

1950年代法国民族学面临更新和告别传统，这是由于承认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情况，因而也承认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所引起的。若·巴兰地的非殖民化理论，可以视为新观点新方向的代表。但传统的压力仍极沉重，因此50年代和60年代的法国民族学仍摆不开意识形态领域的钻研(赎世论、合致论、新兴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这可以说是后期殖民主义的遗风。正因为法国民族学深受其传统的压制，所以它对马克思主义可否应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研析持怀疑的态度。这种情势维持到马克思主义摆脱掉斯大林的阴影之后，法国的民族学才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概念工具去分析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社会结构。

要之，1960年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特征计有三点：

- (1) 在理论领域方面斯大林社会演进五阶段说主宰一切，人类学家以研究第一阶段，也即“原始共产主义”为满足；
- (2) 研究途径则只注重社会和经济形构的“物质文化”，因之，这种人类学只讨论科技层面、考古层面或粗俗的民族学层面；
- (3) 任何“有效的”人类学都由苏联引进而来，任何与苏联官

方相异的观点被斥为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

由于具有上述特征，所以法国人类学家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是机械性的，也是马基雅弗里霸权式的。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认为法国民族学的主流派却是大成问题，也令人不满。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遂被排斥于主流之外，唯一的例外为列维-斯特劳斯。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而且坦言马克思是他思想的出发点之缘故。

列氏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各种文化，也即人们怎样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并赋予意义。原来这些意义的体系就是文化。列氏为一特殊主义者，视每一种文化为独一无二，为特殊的。他反对演化论中所含有的化约论点（把社会演变化约为某些简单的事物、简单的原素，譬如心或物的变化）。由于他在二次大战中，躲避战祸于美国，所以受到该地结构的语言学之影响。结构语言学主张藏在语文背后的是一些结构，因为这个缘故，一些反复出现的现象不能由观察所得的体系来加以解释，而必须藉体系组织性的原理来加以解释。那些反复出现之事物，像前后、左右、上下等等，相反而又相成的对称事物，在所有人人类的沟通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它不仅组织了语言，也组织了文化。可以说，不管何种语言、何种文化都有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原理、原则。这就是组织性的原则，是潜藏事物背后的“结构”。列氏的努力就在证明这些“结构”不仅组织了语言，也组织了文化。

在这种理论中我们似乎嗅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他主张文化的单一无二性，简直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企图概括化的理论传统相违背。但是他仍旧坚称其作品的部分，不但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第一，他辩称他所讨论的是马克思所未曾论述的题目——文化的转形。他的理论对文化转形的因由并无定论。换言之，他所检验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并不冲突，因为后者从未曾论述过此一问题；第二，列维-斯特劳斯强调一个事实，即他与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不具意识，可是不具意识的

自然的背后却有很多潜在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但支配自然，也支配自然的变化，亦即支配了历史。再说，这些过程只有靠理论的分析才会被发现出来。由是列氏强调他所称呼的结构相等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亦即马克思视历史是受到生产模式的内在矛盾所指挥、所控制的演化结果。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自称其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但其作品在60年代造成的效果，却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法国人类学排除出去。这是由于他强调所有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性质，不利于历史普遍理论的建立的缘故。

二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法共自由派分子严厉的批判。在人类学领域当中，最先向苏联社会五阶段演进说提出非难的，为研究非洲原始社会的民族学家。他们首先恢复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然后才提出类似的主张——“阿非利加生产方式”。其中以法共党员苏列·卡纳尔的影响最大。他认为非洲诸国的社会并不建立在奴隶或佃奴的压榨之上，而是在于完整不分的诸社区的压榨之上。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任务，不在于阐述恩格斯定下的整套计划，而在于应用自非洲社会新获得的知识，来修正旧观点、旧理论。换句话说，不是找资料来证实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旨，而是以新证据来发挥马克思主义求知的精神。

于是苏氏这个新的理论尝试不久便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结合而产生崭新的学派。这便是60年代在巴黎多次召开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会。讨论会的结论认为，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有其存在与研讨的价值。而且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要求，即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学的观点彻底加以修正，把马克思和摩尔根所未曾获得的讯息资据融合于新知系统中。在研讨会

上受列维-斯特劳斯学说影响相当深的葛德利尔遂强调：历史单线性发展观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也不是马克思原来的主张。他为了证明此一观点，于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创造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如何地重视。他进一步申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的任务，不在回归马、恩的故纸堆里，而是藉着新知和新观点往前发展马克思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理论。他特别指出马、恩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所知有限，且受到当年欧洲流行的看法所局限。

在苏列-卡纳尔和葛德利尔的影响下，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几乎彻底放弃向来所信持的“生产方式”观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在讨论会结束后，戴雷出版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原始社会》（1972），不客气地指出：摩尔根社会发展次序（蒙昧、野蛮、文明）观，虽是官方马克思学说构成的一部分，却应该放到“人类的博物馆”当古董，不应该视为活的知识的一部分。他在其后的一篇文章（1977）中表明他不仅抛弃了五种阶段——也即五种生产方式——的说法。他还指出：任何把生产方式作这样的分门别类本身就是误导读者。因为这样作无异对不同社会的认识，事先便套上了框框，事先已戴上有色的眼镜，结论自然不会是客观正确的。他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种分门别类的体系，而是一个分析工具。严格言之，我们需要一个精密和严谨的定义，从而从具体和真实的考察现象中，建构一个生产方式，而在建构此一方式的知识运作过程上，能够把牵涉的诸因素说明清楚。”

葛德利尔除了上述反对单线性社会发展观之外，他还企图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克思利用内含于资本的结构之逻辑，以解释资本是何物。即这些结构本身的转变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来加以解释的。葛氏遂认为马克思对资本这种看法，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看法很相似。因此，可以把两者相提并论。葛氏这个说法不仅在法国本土，就是法国之外的国家，也深具影响力。原因是它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人类学家的尊重，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乐得采用人类

学发现的证据,而丰富马克思的学说。要之,葛德利尔这个观念实在倍受阿尔都塞结构的马克思主义之赐。

1960年初梅雅苏是倡导马克思主义派“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葛德利尔也在同一个时期阐述他的经济人类学,自1965年以后由于多位学者的参与研讨,经济人类学遂汇成一股新的潮流。在法国经济人类学可说是涉及以往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之田野研究,早期学者虽然也留意生产因素及其应用,甚至探究农民的“生活之道”(genre de vie),但却是以农业发展和土地使用的眼光来加以考察,不像60年代兴起的经济人类学在于发现生产的结构,以及生产结构与社会关系总和相对应的问题之分析。

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有三,也可以说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理论反思。在第一个层次上,其研究对象为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下定义和描述。譬如说,生产单位是怎样形成的?劳动的性质和形式如何?劳动的组织是建立在平等、合作或压榨的关系之上?劳动的产品怎样分配和消耗?由此进一步讨论非市场交易之角色,相互对待关系的角色,乃至市场的角色。这也就是使用新的方式来探究“原始”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人类学不仅考察“经济的”关系和结构,还讨论亲属、政治,甚至意识形态。对生产单位、产品分配和劳动关系的分析必然会导至长幼有序和成亲条件(包括嫁妆、聘金等),以及家族组织等问题的研究之上。

在第二个层次,亦即部落或村落的层次上,学者要解决许多政治的和宗教的问题。譬如社会成员是否得向社会地位更高的长老进贡献礼?交易之间是否受到政治控制?社会的层化是否把成员分成生产者和非生产者(奴隶和产品的拥有者)?在第三亦即最高的国家层次上,则讨论国家在平时和战时牵涉到经济活动的深浅程度?宗教制度和政治制度之运作的费用、或代价多大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者要解答上述三个层次的诸种问题,就需倚赖理论的指导,藉理论来发现经济群体和经济结构互动的逻辑。因此他们要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法来达到上述研究目的,

第一,重新建构“原始”的经济状况;第二,认定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原始经济的影响。法国经济人类学在讨论原初社会时争论最剧烈为:亲属在该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完全取决于亲属关系还是经济关系(生产方式)?葛德利尔认为在这种原始社会中,亲属关系主宰所有的社会关系,原因是亲属关系安排个人的工作地位,和个人拥有土地或物质的权利等等。在此情形下,亲属关系已有生产关系的“功能”,它既是整个社会的下层建筑,同时也是其上层建筑。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应,同时也是经济 and 亲属关系的对应”。

戴雷却不同意把亲属关系看成既是社会的下层建筑,也是上层建筑,也不同意把它看成与政治的功能或是宗教的功能相似。他认为“具体的亲属关系必须看成是三重的决定,对某一底层运作的结果”,亦即“生产方式之经济的、法政的和意识形态的综合性影响所造成的复合结果”。

梅雅苏认为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代代相续的亲属关系之上,但亲属关系却不断地改变和修正。亲属关系便显示为这些改变的结果”。

上述不同的看法表明马克思人类学家对这个亲属的基本问题尚未获得一致的见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是一个“边缘的”生产方式,即下列一大堆的生产方式之一,这些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方式包括狩猎的、世系的、派生的、部落的、村落的、支流的等等生产方式,也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阿非利加生产方式。

诚如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陈其南所说:“由于加入马克思主义的成份,今天〔法国〕的经济人类学俨然就将成为人类学中的主流趋势,至少把人类学又推回到一个更具体的‘全体视野’的优越立场,将一个社会的各个制度面就〔与〕生产关系的模式整合在一起,而以马克思式的‘社会形态’来加以综合分析。”

三

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十多年当中,人类学中最重大的运动之一为“传统的”社会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所展开的热烈对话。这一对话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系列的文集、专论、评估和博士论文等等。这是当代西方诸种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潮相互激荡、汇合、交融,波澜最为壮阔、影响最为深远、成绩最为丰硕的一次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在这一划时代崭新的交流当中,人类学家首先要澄清的是历史唯物论。到底历史唯物论有无可能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分析之上?历史唯物论的基石无疑是生产方式。因之,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进一步要考察生产方式是否真正存在过?如果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确存在于人类历史上,吾人应该如何来给它们适当的定义?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如何(怎样由一种方式转化为另一种方式)?到底有几种生产方式(苏联官方的观点是五种,马克思还提及第六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之,约·柯拉默遂指出:“生产方式概念的澄清,是使历史唯物论这个分析工具能够运用自如(也是证明有效)的首要条件”。只有当这些基本的概念(除“生产方式”之外,尚有“社会形态”)业已澄清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才能够进一步去分析具体的、真正的问题,即把历史唯物论应用到派生的、世系为基础的社会之分析上。从而带动崭新的研究,包括生产关系的分析、生产活动的组织之分析、资源和商品的分析、两性和年龄的分工之分析等等。

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里,亲属关系一向被视为其他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说法遂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左。由是人类学家必须去考察亲属关系和经济因素,这两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及这两者如何关连的问题。由此问题所衍生的是一些基本

理论问题,包括:

(1) 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如认为亲属关系保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亲属关系又是社会的主导力量,那么在初民社会里,下层建筑并不制约上层建筑,而是适得其反。

(2) “再生产”(绵延、传宗接代)概念的扩大、澄清,以及经验性的分析;

(3) 澄青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关系,男人对女人的关系,亦即界定老人和男人的角色;

(4) 把亲属关系当做意识形态去加以分析,有时亲属关系还被视为一种神秘之物。

与上述问题有关连的有两个疑问,则为:

(1) 性别与年龄所引起的不平等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压棒的关系?

(2) 社会这种不同的阶层之分化是不是意味着阶级的存在?

再将上面三种问题放在一起(亲属的地位、压棒的性质、阶级的存在)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探究和争论的主题,它们是彼此牵连、相互支援的。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还面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马克思本人所提起的,也是当今知识社会学的课题。但在人类学中,这个问题一直被当做“信仰系统”来处理。不过在原始社会中,意识形态是连同亲属、宗教和经济合成一体、不能被视为上层建筑边缘的事物来看待。至于权力这一事物,不仅仅是政治学上合法暴力,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因素,亦即优势地位。它在原始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亟思探索的课题。

要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尚待考究的问题,除了上述理论问题之外,似乎也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的落后,与低度发展的现实问题。在众多的现实问题中,妇女、老人、幼弱、病患等

群体之研究,以及各种各样(国家、种族、阶级、群体、党派、个人等)的冲突之研究,也为学者当务之急。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是如何的任重道远啊!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苏]П. Г. 梅斯里夫钦科^①

全面而深刻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情况，无论是对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本身，还是对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阶段历史的总结性著作，都具有越来越现实的意义。

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不是哪一个民族垄断的对象，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体思维的结果。但是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范围发展的经验，要求先深刻研究不同国家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情况。列宁写道：革命理论“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②

当代世界革命过程的特点是形式的多样化。苏共 27 大指出：“我们运动的多样化并不是说相互疏远隔离。同样，团结一致与形式划一、与等级制、与一些党对另一些党事务的干涉、与任何一个党力图垄断真理毫无共同之处”。^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很长时期内，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在研究国外哲学流派方面都存在着一种相当反常的情况：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详尽考察和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的流派、学派、概念、人物（往往是三流的）上，但对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则研究得很不够（甚至完全没有研究）。对外国马

① 作者是哲学博士、教授，现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室主任。——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1 卷第 332 页。

③ 《苏共二十七大材料》1986 年莫斯科版第 73—74 页。

克思主义文献的一些研究还没有系统性。

可是,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水平在许多国家有了进一步提高,发表的著作数量急剧增加了,质量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研究和总结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决由科学和社会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现实问题方面的创造性经验。

由于进行了一些努力,在科学研究中已形成了一种比较新的倾向,即对国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④

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规模扩大和必须解决与计划和组织这些研究有关的实际任务,就越来越需要研究方法论问题。对所研究的材料进行组织,对所考察的对象和过程的本质、结构和作用机制进行揭示,对它们作相应的科学解释的方法和原则本身也就越来越需要加以分析。因此,诸如研究的类型学和与之有关

④ 在最近10年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著作中应该提到:M·T·约夫楚克的《列宁主义、哲学传统和当代》1970年莫斯科版(1982年再版);H·C·普里戈达的《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的著作中哲学和部门科学的相互联系》莫斯科1976年版;И·И·契尔卡索夫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莫斯科1977年版和《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982年莫斯科版;M·H·格列茨基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977年莫斯科版、《科学——哲学——意识形态》1978年莫斯科版和《当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984年莫斯科版;B·H·叶尔莫拉也娃的《美国美学中争取现实主义艺术和人道主义的斗争。20世纪60—70年代》1979年莫斯科版和《认识和社会现实。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家们的著作》1979年莫斯科版;B·A·库瓦金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莫斯科1980年版;B·Φ·季托夫的《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莫斯科1981年版和《安哥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莫斯科1985年版;И·A·戈博佐夫的《列宁的哲学遗产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莫斯科1981年版;З·T·戈伦科娃的《南斯拉夫社会学思想史论集》莫斯科1984年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84年莫斯科版、《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莫斯科1984年版(中译本1986年在北京出版,斯洛伐克文译本在布拉迪斯拉发1987年出版——译者注);И·И·彼特罗夫的《当代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1986年莫斯科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86年莫斯科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问题》1987年莫斯科版。

的对各种不同研究对象、形式和方法的选择和评价,按国别研究和按问题研究、民族的东西和国际的东西、传统和创新、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围和主要倾向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的揭示等问题,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至于研究的类型,在我们的研究活动中最流行的有三种:(1)按国别的哲学史研究;(2)按问题的研究(可能根据一个国家,也可能根据几个国家的材料);(3)传记式的研究(对单个人物的哲学观点的研究)。这几种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过程的多样性。上述类型的学术著作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

在揭示对各国马克思主义问题范围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影响的因素时,可以突出四种基本的决定因素:(1)该国和全世界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2)在方法论上保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3)一个国家的哲学史的和文化的传统;(4)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中的规律性和矛盾。有些研究者把哲学发展的决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即哲学本身的因素,和外部因素即来自哲学之外的因素。^⑤属于外部因素的是范围极其广泛的社会因素:阶级利益、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文化、科学、艺术、意识形态斗争等的影响。

上述社会因素对哲学内部的决定因素说来是外部因素,对来自国外的影响因素说来又是内部因素。无论在哪一方面,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哲学研究的发展说来都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不能同意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哲学在德国。1945—1975》一书作者的看法,他们虽然承认哲学在民主德国的社会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是认为“哲学在民主德国的发展和地位、它的核心问题和成就,基本上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它主要是由于30年前

^⑤ 参看M·H·格列茨基的《论哲学的非哲学因素》一文,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86年莫斯科版。

外部的政治因素而确立起来的”。^⑥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活动、他们对研究问题的选择打上了明显的印记。例如，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对法国唯理论传统的研究、对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的重大影响；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受到与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斗争的影响；在联邦德国，受到与法兰克福学派论战的影响；在意大利，受到与克罗齐的“历史主义”论战的影响；在美国，受到对实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及其他流派进行批判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保守势力以外，还有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哲学家，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争取国际和平的斗争中与马克思主义者接近。还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学家、不少“新马克思主义者”、“左派”活动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以“马克思主义式的方法”研究当代问题。

有鉴于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者们面临着一个严肃的方法论任务：善于在冒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迷径中辨别方向，发现对问题的真正科学的提法和解决法，弄清在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术语后面所隐藏着的東西，把那些冒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的阶级本质揭示出来。

在开始分析哲学史和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问题范围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时，需要指出，迄今为止，论述个别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对这一因素考虑得不够。不过，哲学史和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性质：在一些国家它有助于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有利条件，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起阻碍作用。

例如，在保加利亚，哲学研究特点的形成可追溯到保共创始人

^⑥ H·M·鲍姆加特纳、H·M·萨斯：《哲学在德国，1945—1975》，1978年科尼斯泰因版第33页。

Д·布拉戈也夫对反映论问题的研究和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这一久远的传统后来在Т·巴甫洛夫、А·波里卡罗夫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主要流派之一和保加利亚哲学科学的特点。可以得出结论说，保加利亚在全面研究反映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认识理论领域的一定学派。研究反映论的传统又对保加利亚学者对当前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等的方法论问题引起研究兴趣的过程产生影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社会意识、社会认识的问题的著作(П·金德夫、Н·伊里巴佳科夫、В·多布里亚诺夫、С·波波夫、Д·格尔德夫等)，已颇为闻名。保加利亚哲学家们最先对社会主体的活动特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们提出了有科学论据的社会信息概念、社会管理的程序一目的方法(Т·维洛夫、Н·斯特凡诺夫、Н·雅希叶尔、М·马尔科夫等)。

在匈牙利，当代的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按Д·卢卡奇在他关于劳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的研究著作(特别是美学)中所奠定的传统发展的。遵循这种传统，匈牙利哲学家们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劳动作为有目的的活动等问题(Ф·推盖伊、Э·罗霞赫迪、Д·富卡斯等)，研究目的、个性范畴(Е·安切尔、И·李克、П·加拉伊等)。他们和卢卡奇一样认为，认识问题必须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下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一部分来分析。Д·卢卡奇对社会异化的研究，在И·赫尔曼、И·卢卡奇、Э·托尔达伊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继续。美学(特别是音乐美学)的哲学问题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些问题是与人道主义问题、世界和本国文化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的。由于独特研究的结果，在美学领域形成了匈牙利学派(М·阿尔马什、Д·佐尔塔伊、И·西格蒂、П·西克拉伊、И·魏法鲁什、И·赫尔曼等)。

对美学问题的广泛兴趣不仅决定于Д·卢卡奇著作(《审美特性》等)的影响，而且也是匈牙利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特点所使然；由于一系列历史情况，先是在奥匈帝国时期的民族屈从，然后是法西

斯主义的统治，哲学思维往往不是用哲学论文，而是通过美学、文学、诗歌表现出来。

研究形式逻辑的丰富传统在波兰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战后时期极为注意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思维和认识的辩证方法以及形式逻辑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揭示辩证方法和部门科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差别等。因此，关于辩证逻辑问题的讨论在 50—70 年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З·阿夫古斯推尼克、Я·拉多什、У·诺文斯基、С·拉因科、З·察茨科夫斯基、Т·雅罗谢夫斯基等）。

民主德国哲学研究发展的特点，首先受到有两个社会制度不同、但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德国存在并且直接接触这一事实的制约。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每一个公民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所以，对历史过程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社会意识（其中包括日常意识）的问题、意识形态对认识、对知识变为信念的过程的影响、民族和文化遗产问题等的研究，对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K·哈格、M·布尔、Г·格尔茨、A·科津、Э·哈恩、B·艾赫戈恩、Г·克劳斯、Г·施梯勒、K·瓦格纳、K·格斯勒、И·维梯赫等）。

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性质也能对不同国家选择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的形式和方法打上一定的印记。例如关于文化问题，在波兰主要是在文化的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在罗马尼亚是研究文化的哲学、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观内容，在民主德国是研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因此，一定的特点在解决同类性质的任务时也能表现出来。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是把与物质、文化和精神领域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研究有关的社会哲学问题提到显著地位。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哲学家对社会主

义社会的辩证法、它的动力、社会结构、主体因素的作用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民主德国的学者最先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系统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对科技革命问题的理论探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P·里赫塔等）。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个性形成的哲学问题的著作，在保加利亚（C·安格洛夫、Д·格奥尔吉也夫、B·莫莫夫、B·维尔科娃）、罗马尼亚（K·古里安、A·腾纳塞、M·雷昌努、A·罗特）、波兰（T·雅罗舍夫斯基、M·弗里茨汉德、M·米哈里克、E·科萨克）、民主德国（P·米勒、Г·施梯勒）及其他国家都有发表，它们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分析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不同道路和手段、社会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性，与揭示共同规律性比较起来决不是次要的东西。相反，研究这些道路、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有助于丰富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要知道，共同的东西并不是独立地、以“纯粹的”形式与具体的历史和民族条件脱离而存在的，它正好表现在特殊和个别的東西之中。所以，虽然每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及其建设必定服从于共同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普遍适用的“模式”，只需往它上面加上民族的特点。若是企图构建一种“纯粹”民族的“模式”，不考虑从其他国家经验中得出的共同规律，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应该承认，在我国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形成的那种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共同原则和倾向、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形式和方法的民族特色估计不足的态度，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由于采取这种态度，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作者的某些重要著作，只是因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的批评、提出了某些非标准的克服措施（如必须消除经济发展需要和过时的管理计划体制之间的矛盾；必须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来决定经济发展的比例；把商店、饭馆租给个人经营；发展个体劳动活动等），就遭到忽视，或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货色”。对这类著作应该采取更细心的态度，应该进行更客观的

评价。应该把建设性地批评由于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产生的消极现象与任意抹黑、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说成从一开始就是“坏的”加以区分。

1986—1987年各国兄弟党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都指出,迫切需要克服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必须使实践面向理论。各国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研究经验表明,主要注意力是放在与解决哲学内部问题有关的哲学方法论和范畴的研究上,而在把所得成果用于分析直接社会现实方面显然做得不够,往往只是利用哲学的意识形态职能,把它的科学启发职能搁置一边。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1987年7月全会在分析使哲学任务局限于确定哲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性目的的关系、并使哲学科学脱离社会生活的现实实践的原因时,指出了只顾哲学的意识形态职能而对其科学职能估计不足的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两个方面处于有机的统一体中。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经验表明,若用意识形态方面取代科学方面,或者相反,用科学方面取代意识形态方面,都会对解决国内生活的重要问题与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造成危害。”^⑦

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以及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正在大大改变对作为认识方法论的辩证法的要求的性质。因此迫切需要坚决改造哲学探讨的方法,从对与时空无关的共同原则进行教义式的论证转向对存在和意识、科学和实践不同领域的发展过程的辩证法进行具体的分析。无论是对部门科学的发展,还是对社会实践说来,探索为多样化的、往往矛盾的过程所固有的某种共同规律性已经不够了。研究如何将辩证理论的共同原则卓有成效地用来分析具体形势和过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越来越需要的是克服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关

^⑦ T·日夫科夫:《保加利亚是高度发达的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保共中央全会开幕词》,载《工人事业报》1987年7月29日第3版。

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和丰富。“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创造性地对待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用科学的方法论武装起来，掌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艺术。”^⑥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则比较注意与当代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研究有关的社会哲学和社会政治学的问题；分析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中的变化，群众民主组织和新社会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公民权、种族平等的运动等）的意识形态方面，人道主义和人的哲学问题，未来人类文明、争取和平和防止世界大战的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研究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有迫切政治意义的重要问题。他们在马列主义原则、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矛盾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对抗的复杂情况，研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战略策略问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全面研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和形式，尤其注意论证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的首要前提被宣布为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民主被理解为不仅是必要的阶段，而且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形式，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广泛利用葛兰西的思想遗产，首先是他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式和速度的理论概念（“领导权”、“历史集团”、“集体理性”等）。葛兰西触摸到了20世纪资产阶级国家活动的神经，这种国家不仅积极干预经济，而且企图把广大居民阶层日益融汇到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的体系中。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条件下，统治的意识形态形式、对人民群众意识的操纵开始加强了。葛兰西关

^⑥ 《苏共中央1987年6月25—26日全会材料》1987年莫斯科版第43—44页。

子在反垄断的斗争中必须扩大工人阶级同盟者范围的原理也具有迫切的意义。许多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葛兰西的思想对研究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迫切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法国（Г·贝斯、П·阿尔都塞、П·塞夫、М·戈德里尔）、意大利（У·卢波里尼、П·杰蒙纳特、Дж·瓦卡、В·杰拉塔纳）、美国（Д·索默尔维尔、Г·帕森斯、Д·德格鲁德、Г·塞尔扎姆、М·瓦尔托夫斯基）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辩证法和科学认识理论问题、哲学和部门科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和范畴的研究（Дж·贝尔纳、М·康福斯、Дж·霍夫曼、Дж·刘易斯）尤为著名。

近年来，越来越迫切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社会发展的空前多样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的新趋势、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对不断扩大的新社会运动所固有的内部规律性和矛盾的认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在这种条件下，那种把辩证法理论作为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问题（即范畴和共同规律的研究）有关的认识方法的研究暴露出不够有效和片面的性质。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拉扎尔在批判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情况、指出必须克服陈旧的僵化思维模式时写道：“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的分析性研究成为某种无所不在的马克思主义幽灵的俘虏。理论似乎被物化为教义，经验则被物化为被认为适用于历史上一切时间和情况的最终准则和模式。具体运动中的现实实际被列为特殊范畴，被描绘成为某种偶然和次要的东西。”^①

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克服表现为对社会发展问题采取笼统态度、对研究现实实际的具体特征

① Ф·拉扎尔：《马克思主义和人类解放》，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进步问题》1986年莫斯科版第46页。

估计不足的教条倾向，在把唯物辩证法理论解释为具体过程的辩证法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当前反对教条主义的条件下，一般要求制定侧重实际的研究方法，争取作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从注重研究特殊和个别方面来解释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在这种解释中，一般被理解为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包含有各种特殊和个别的具体的具体的一般。这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特点，表现为广泛应用具体性原则，即对具体对象的具体逻辑进行分析。辩证的具体分析法的出发点是在外在于对象的矛盾和这一矛盾在对象内部的本质表现之间建立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经验，对于认识当代世界是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对于解决由充满矛盾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世界的动态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科技革命的本质和社会后果及其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表现特点的研究占有显著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很好地解决社会政治任务，需要深刻思考诸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联系、生产方式和政治形式之间的关系、科技进步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内部结构等问题。在分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大大促进了对作为完整体系的社会一切领域和因素的辩证法的理解。

由于科技的蓬勃发展，越来越需要从方法论上保证科学的认识。所以，在英国、联邦德国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科学学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对科学发展的方法论意义的分析极为注意（Л.Б. 贝纳尔、K. 魏丁顿、Г. 桑德居勒）。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演变问题的著作广泛闻名（Г. 霍尔、P. 施泰格瓦尔德、Й. 施赖夫施泰因、Г. 荣格、K. 田腾、Л. 戈兰、С. 阿罗诺维奇、Б. 拉默尔森）。

在现时代，对人们改造自然、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本身的成果和前景的评估、保卫和保证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获得越来越大

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法国的П·塞夫、А·卡赞诺夫、Л·伯克蒙、П·彭特、П·博卡拉，奥地利的В·霍利切尔，英国的Л·刘易斯、П·克鲁格曼、Л·沃迪斯，美国的Г·帕森斯、Л·索默尔维尔、Л·达纳姆、Г·阿普特克尔等。

国外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工作的条件很复杂，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国的发展也极不平衡，遇到各种困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对社会的新过程及其可能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思考方面有时落后于形势。例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由于科技革命而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构成“新社会运动”社会基础的中等阶层日益增长的作用，并没有立即被察觉并予以相应的评价。

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是，学者哲学活动的倾向、他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所选择的方面以及观点极其多样化。一些学者热衷于本体论问题，另一些则钻研认识论问题，还有些盯住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问题，也有人对实践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等等。是不是可以因此认为，现在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流派”：本体论派、认识论派、实践派、人本主义派等，而马克思主义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呢？当代世界过程的道路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带有不同国家的特色，研究活动的方面各不相同，主要关注的问题不同——这一切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元化”，而是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在各种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具有有效的、普遍的和永恒的意义。

近10年来，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倾向，⁷³在资产阶级的政论作品中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些倾向从来没有作为统一的、明确的思潮存在过，于是他们就人为地给这些倾向捏造了各种各样想要建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意图，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正是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是和“东方马克

思主义”(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他们宣称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内部与各种“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倾向。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设法“重新”思考了马克思的遗产。按照这种重新解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是关于人类史的科学,换句话说,只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至于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是由恩格斯和列宁、但决不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思辨哲学”。所以,应该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它应该对各种哲学学说保持独立和中立。“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反对承认自然辩证法,从而反对不仅是社会和意识而且是自然界发展规律的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质。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把哲学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思想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企图阻挠加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努力。这类企图也是为了把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学说肢解为各种不同的派系,并利用它们来反对列宁主义。

在当前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进行改革和发展新思维的条件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进行一定改变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需要从简单地叙述国外思想的各种过程变为集中注意力于对当前有迫切意义的研究工作上。因此,现在应该研究与完善哲学研究方法论(首先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辩证方法)有关的、与解决科学认识、科学学、个性发展、文化和道德、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有关的经验。我们的著作越是致力于探求真理、关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各种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过程进行客观评价、设法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来反对核战争威胁,它们就会发挥越大的作用。

撰写关于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科学认识 and 教学的意义。它们可以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关于社会发展和科学认识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等等提供资料。因为迄今为止,在我国和国外出版的这类著作中还很少涉及、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不过显然,学者们

应该有可能把本国的哲学问题研究水平与别国的研究水平加以比较,把可以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总结。研究这一经验是多么重要,1986年北京出版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书中译本的前言可以证明。前言写道:“我们中国的理论工作者面临着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非常需要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积累的理论经验,包括他们在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面的经验。可惜,至今为止我国还缺少系统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情况的出版物。我们翻译苏联研究者的这部著作,就是想暂时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相信,这部著作对我国理论工作者会起到启发借鉴的作用。”^⑨

在我国的书刊中,对大专院校马列主义哲学及其历史的公共课程和专修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有论据的批评意见。这方面的缺点必须克服,因为“事实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修课程远不是在我国所有的哲学系都讲授。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历史的公共课程和专修课程往往主要是根据本国的材料讲授的(援引本国的著作,采用本国生活中的事例等)”。^⑩

研究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深刻揭示它的国际性。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的迫切问题时,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过程、为团结所有反帝力量、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载《哲学科学》1988年第5期

(杜章智译)

⑨ A·Г·梅斯里夫钦科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译本,198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版第1页。

⑩ A·A·弗多谢也夫:《论大专院校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986年莫斯科版第9页。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赵 桂 琴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以物化范畴来表述异化概念的。卢卡奇通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深刻分析，首先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活动，并且对资本主义物化结构导致的“意识物化”进行了批判；然后通过对“资产阶级思维的二律背反”的思辨，从哲学和历史上确立了物化的克服者——无产阶级，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体同一；进而当无产阶级运用总体性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时，自我意识既是无产阶级主客体同一的承担者，也是资本主义物化得以扬弃的原因。

一、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分析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是从两方面展开他的理论分析的：一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另一方面，对这种物化结构导致的“物化意识”进行了剖析。先来看看卢卡奇是怎样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的。

第一，卢卡奇对物化的分析是从解剖商品出发的。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在他成熟阶段的两部著作中，从分析商品出发，从整体上描写资本主义社会”。^①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属于支配形式的地位”，“在人类历史每一阶段，没有一个问题能不最

^① 《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英文版第83页。

终追溯到商品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解答能不在解答商品结构之谜中发现。”^②因此卢卡奇指出，商品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经济范畴，这种抽象的经济范畴是资本主义客观经济事实的反映。

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商品交换的世界。商品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现实。”^③物化现象的集中表现是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④是“囊括一切方面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的问题。”^⑤

第二，卢卡奇通过“异化劳动”进一步展开了他的物化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并不是异化的发达的哲学概念。卢卡奇认为，物化问题才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中心。他吸取了《资本论》的“异化劳动”概念。同时，作为西梅尔的学生，他也利用了西梅尔的“异化劳动”概念，然后从商品拜物教中推演出他自己的“异化劳动”概念。这种概念的运动导致物化与异化的同一。卢卡奇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异化劳动的结果：从物化的客观方面来看，物化导致了人不能控制的物的世界和物的关系（商品和商品在市场运动的世界）的产生；从主观方面来看，人自己的活动即他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独立于他的物或商品系统，反过来控制和奴役劳动者。这样卢卡奇就从“物化”推演出“异化”，而后者正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的中心概念。

第三，卢卡奇从“异化劳动”的分析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过程的分析。他认为“合理的机械性和计算性”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是物化过程的标志。卢卡奇首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② 《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英文版第83页。

③ 同上书，第197页。

④ 同上书，第83页。

⑤ 同上书，第84页。

“抽象劳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抽象劳动”不仅仅是概念的推演,而且还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日益增长的商品形式的专门化要求并且产生了“抽象劳动”,当“抽象劳动”成为“统治商品实际生产的原则”^⑥时,大量的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因此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被抽象有着双重含义:一是与其它不同质的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二是在工厂里,劳动力丧失了他自己的部分质。劳动越专门化和机械化,人的活动就越失去主动性而变得消极无为,从而丧失其意志力。正象卢卡奇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劳动对象化为某种跟他们的整个人格相对立的东西,另一方面生产客体的分裂也破坏了个人跟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有机联系的纽带。他们的劳动不再把他们之间直接地和有机地连结到一起,而是越来越受客体的支配。

第四,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当工人的命运变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命运”时,当“工厂的内部组织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缩影时”,^⑦资本主义全面合理化(物化)才达到了它的顶点。在这种分析的后面有着韦伯关于没有法律、政治以及日常生活的管理是不可能的观点的影响。对韦伯来说,合理的管理就是官僚制,国家的和法律的官僚制管理是与工厂的资本主义组织一致的,它是资本主义组织的发达形式的先决条件。根据卢卡奇的观点,这意味着生活的各方面都被标准化了,不仅劳动而且最终人的活动都被异化了。当全体社会被官僚管理或统治时,正象韦伯所说的,当整个文明的历程、它的存在和它的生活、政治、技术、经济基础完全依赖于官僚的特定组织时,异化便更加普遍化,不仅工人的命运被异化,而且官僚制成员本身也不例外。卢卡奇强调,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本性,一切事物都被用一种越来越标准化、形式化的方式处理。在荣誉、责任心、意识的借口下,甚至道德伦理领域也进入了商品的王国——官僚机构。

^⑥ 同上书,第86—87页。

^⑦ 同上书,第88页。

“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所可能发挥作用的一切方式无不日益纳入这一物化过程中去”。^⑧而且“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继续不断地在越来越深入地、致命地、决定地沉浸到人的意识中去”。^⑨至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才达到了它的极限。于是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进行了批判。

首先，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最本质的物化是总体的丧失，从而导致科学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事实。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复合体，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和法律）”。^⑩而这些专门的学科认为：“资料被直接提供的方式是科学概念化的适应基础，这些资料的实际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⑪卢卡奇认为，这种“崇拜事实”的科学以它的精密和抽象摧毁了总体的形象，势必使主体只能面对着独立的客体，而无法看到一个主客体融合为一的总体。为了从总体上把握实在，“必须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这样才能达到对实在的真正认识。”^⑫为此卢卡奇批判了实证主义和经济宿命论，即“庸俗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他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只是用孤立的、机械的、抽象的方法来考察现实，只是看到眼前各种外在的现象的事实累积，而无法看到一个把孤立的事实综合起来的总体。这种思维方式从一种抽象的二元论出发，使人和自然、个人和社会、思维 and 存在以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

其次，由于科学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事实，导致科学的本体（历史）的丧失。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是辩证法核心，“构成马克思主义

⑧ 同上。

⑨ 同上书，第89页。

⑩ 同上书，第99页。

⑪ 同上书，第100页。

⑫ 同上书，第93页。

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动因观点,而是总体性方法。”^⑧ 为了把握事实,卢卡奇把活动与知识联系起来,认为通过把事实的直接性与整体的理解联系起来,就可以达到认识事实。同时把具体性与总体性联系起来,避免了把现实与孤立的实体或单个事实等同起来的倾向。总体之所以是具体的,因为它包含着把孤立的事实联系起来的所有中介。但是“庸俗马克思主义”仅仅以直接、简单的方式再现社会生活,他们用抽象的、与具体无关的规律解释事实,对事实不作进一步的分析,更不把它们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这种思维方式“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范畴的假象”。^⑨ 由此导致科学的本体(历史)丧失。

最后,以上两点决定科学具有凝固不变的特征。科学的总体和本体的丧失的直接后果就是科学的僵化。“科学简单地、教条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采取自己的立场,它无批判地接受现存的客体性质和那个社会的规律为科学不变的基础。”^⑩ 这样就导致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成的事实和永恒不变的人类秩序。那么如何克服物化呢?

二、卢卡奇对无产阶级是历史的 主客体同一的论证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诉诸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或自我意识。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与德国古典哲学联系起来,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于是他把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一切物化问题都看成是需要彻底反思的哲学问题,希望通过对“资产阶级思维的二律背反”的批判,把

^⑧ 同上书,第93页。

^⑨ 同上书,第6页。

^⑩ 同上书,第7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来，进而从哲学和历史上来确立克服物化的无产阶级主体性或自我意识。

第一，卢卡奇分析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的“二律背反”。卢卡奇认为，现代理性主义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材料是由感觉提供的，形式主要是由理性设定的。进行认识，首先需要认识的有材料，即感觉。但是仅有感觉还不行，因为它混沌不清，未具形态。因此要整理，首先需要直观的有形式，亦即时间和空间，这种由时空所规定的感觉就是知觉。但是，只有这种知觉还不能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只有把知性所具有的范畴加到知觉上，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然而知性所提供的知识只是停留在现象界，停留在知性的科学知识范围内。而人的本性并不满足于知性的科学范围，不满足于有条件的东西，它要求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无所不包的、最统一最完全的总体。那么对这种总体的把握使用什么工具呢？康德认为，没有别的，人们很自然地总是依靠知性概念。但是知性概念只在现象界有效，它只能运用于直观的、时空中的东西，而不能运用于本体，不能用来规定超验的“物自体”。本体或“物自体”是感觉经验所无法提供的，如果超越“现象界”去规定“本体”，去追求全部经验的完整统一，即用有限的东西去规定无限的绝对整体，就会发生自相矛盾和陷于谬误之中，并在这种推论中形成一种容易使人迷惑的虚幻的对象，把思维中发生的概念联系错误地当成客观存在的东西，把主观追求的东西当作客观存在的对象。因此卢卡奇指出，康德的“物自体”包含两种含义：①表明知性范畴归纳感性内容的不可入性，这说明了观念来源最终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性质；②表明了知性范畴不能综合绝对的总体。

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康德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康德本人所特有的，而是一般理性主义哲学家共同面临的困境。这表明理性主义要求建立知识的体系化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理性主义囿于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它不能断然地否定“物自体”的存在，因为理性主义的初衷是要建立总体的知识大厦，否则

理性主义就不会称之为理性主义了；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二律背反”的困境，就必须放弃完整的体系化设想，并且使哲学进入没有任何理性联系的单纯事实之中，然而这意味着理性主义的终结。那么如何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呢？

第二，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解决“二律背反”的方法，并且奠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辩证方法的基础，他们的方法是找到一个产生那些看起来是“纯粹被给予性”的主体。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纯粹理性批判不能解决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能够解决。他认为人有两重性，一重是人的自然方面，一重是人的自由意志方面。人的自然方面的属性是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自我决定的方面，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康德说：自由乃是一切有理性存在者的属性。但是康德在论证人的这两个方面时，片面夸大了独立自由性或者说主体性，导致了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绝对对立。这样一来，正象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康德的“自由变成了对内心事实加以评价的观点。这些内心事实在它们所有的原因和结果、以及构成它们的心理因素诸方面，都完全地服从客观必然性的宿命论的机械主义。”与此相应，“现象和本质的分裂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其被制造的统一中，也无助于建立世界的统一，而是被带进主体自身之中，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实体，而自由和必然的不可调和、不可解决永恒化为不可解决的分裂进到了主体最内在的结构之中了。”^⑮

费希特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康德哲学的直接继续和发展，首先是看作解决康德所遇到的各种难题的学说。如果说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这两个领域虽然是有联系的，但仍旧是独立的，那么在费希特那里，则是极力从一个统一的根本原则来发展学说的全部内容。在费希特那里，正是把实践、行为和行动作为统一了的整个哲学的方法论中心发展了主体能动性思想。他“从同

^⑮ 同上书，第124页。

一的主体- 客体出发，把每一个被给予性把握为这种原初统一的推动出来的特殊情况。”^① 这种统一是行动。这以后费希特就把实践、行为和活动作为统一了的整个哲学的方法论中心。这样费希特就从认识论和非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主体问题，从而克服了康德把主体限制在个体的自我，促进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主客体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哲学接近了对理性主义问题的真正解决，这种解决的方法来源于《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实体就是主体”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如果使用辩证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二律背反”，那么首先一定要搞清克服“二律背反”的主体的起源和创造；其次只有实体是主体起源的根源，实体变成主体的客体，主体的起源才变成具体的，并且可以为我们所认识。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就是主体的来源和客体的实体。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真实的东西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的含义所在。

黑格尔进一步阐述道，一旦人们掌握了历史以及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那么这种认识就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为“理解主客体同一是必要的……”。只有不仅指出所有这些问题在历史中可以得到解决，而且可以具体地指出‘我们’即历史的主体，即那个其行为是历史的‘我们’时，这种统一才可能作为被把握的统一而发生作用。”^②

卢卡奇指出，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黑格尔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对费希特打破康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观念的完成和历史化。但是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在试图把历史的主体具体化时，导致了一系列的虚假而陷入概念的神话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主客体的辩证法固定在国家里：国民的精神。卢卡奇正确地指出这是表面的辩证法，因为国民精神仅仅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它们仅仅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步骤”。通过它们把自身提高和完成到自我理解的总体。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对历史主体的错误解释必然导致

^① 同上书，第123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主客体二元论的重新产生。因为，如果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那么它必然异化人的理性，并且异化主体。此外，历史终结的观点否定了未来的历史。因此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由于不能在历史领域内找到同一的主客体，不得不在历史之外的绝对精神的王国即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寻找，从而黑格尔建立哲学体系的企图破灭了。这不是因为他从同一的主客体出发，而是他不能把主客体同一固定在历史的领域。

为什么德国古典哲学为解决“二律背反”提供了正确的方法，但是在寻找历史的主体时却陷入概念的神话学以至最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卢卡奇看来，其原因在于德国古典哲学自身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的，因此它本身也是被物化的，而且是物化的思辨表述。所以它不能超越物化的社会基础，真正找到历史的主体。而且由于这一点必然使“古典哲学放弃把现实把握为整体，把握为存在。”从而导致理性主义的破产。因此卢卡奇得出了“资产阶级越来越失去了从思想上把社会把握为总体的可能性，并因而丧失了领导这个社会的使命”^⑨的结论。但是，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唯一方面是它的辩证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本身在哲学中仅仅以“二律背反”的方式表达出来，最终并未找到主体性的真实历史根源和它的社会基础。但是卢卡奇认为，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把辩证的方法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可能的，这种转变就是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当然它需要靠一个阶级来完成，而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存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第三，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体同一，

卢卡奇认为只有马克思正确地解决了主客体同一，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所揭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

^⑨ 同上书，第121页。

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①}在卢卡奇看来，^{②②}马克思站到了更彻底的实践观立场上。由此导致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一方面破除了康德的直观主体与直观客体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另一方面又克服了黑格尔精神主体的思辨性和神秘性，因为它是现实的社会阶级的实践。卢卡奇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洞察社会现实的总体并从总体上变革它。”所以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体同一。因为按其本性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社会当作具体的总体来把握，无产阶级既是历史过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也是对它的反映。

当然，并非任何一个阶级都能完满地体现主客体的具体同一。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主客体同一的体现和承担者，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固有的特点决定的。正如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所讲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②③}所以无产阶级是时代唯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宣告现存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制度的**实际解体**。”^{②④}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优越于资产阶级就在于它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现实的物化形式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它作为历史的总体过程来把握。另外，无产阶级要在总体上理解和超越资产阶级（客体），又必须获得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主体），一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它就理解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意义”，进而它就要通

②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② 同上书，第262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页。

过革命实践从总体上彻底地改造自身和社会。因此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中达到了真正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不是指它们互相符合、互相反映、彼此‘平行’或部分‘重叠’（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僵硬的二元论的隐蔽形式），而是说它们的同一性就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现实历史的、辩证的过程的因素。”^②

总之，卢卡奇通过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分析指出：①、德国哲学即使是对物化的超越，其超越的方式也命定是直观的、抽象的，因为它自身也是物化的，只有这种推演的方法才是辩证的。②、通过对资产阶级思维“二律背反”的进一步扬弃，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是可能的，由此则从历史上和思想史上确立了物化的克服者——无产阶级。③、“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因为正是无产阶级才构成了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主客体同一，即创造历史的“我们”——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既是主客体同一的结果，也是消除现实异化的原因。那么无产阶级是如何成为自我意识的阶级的呢？

三、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阶级意识）的剖析

卢卡奇在完成了对思想史和历史的反思之后，进一步探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我意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产生了物化意识，反过来物化意识强化了物化结构。20世纪初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实证科学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窒息了无产阶级原有的革命意识。因此要摧毁资本主义物化世界，就必须消除物化意识的影响。这就有赖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阶级意识）的确立。

卢卡奇对于自我意识或者阶级意识的探讨，在1920年的《阶

^②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04页。

级意识》和1922年的《无产阶级立场》中有着明显的差异。在《阶级意识》这篇论文中，卢卡奇论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内涵、结构以及作用。他认为阶级意识仅仅是伴随着高度统一、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才得以产生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形成了独立的阶级。与此相应，阶级意识达到了它能够为人们所意识的程度。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资产阶级从本阶级的生产体系出发，产生了与整个生产体系相应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地位及其决定行为的阶级利益，使它在理论上并不能控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②这种生产的客观限制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意识的界限。这导致了资产阶级无力超越自己的生产方式，不能认识到资本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虚假意识”、“物化意识”。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对立面，既不是“构成阶级的单纯个人思想和感情的总和，也不是它的平均数”，^③更不是经验表层的大众心理。卢卡奇超出无产阶级现实的主观意识而谈论“被给予的阶级意识”，即一个阶级如果完全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便应具有的意识。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由此人们就有可能推断出该阶级理解自己的地位时所具有的思想和情感。这样阶级意识就成了“在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立场上应该有的一种合理而真实的反映”。^④当然这种意识也许不象个人心理那样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却具有理想的真实性，这种理想的真实性的具体体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它是“已经达到可见形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与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他强调说，当无产阶级

② 同上书，第64页。

③ 同上书，第51页。

④ 同上。

与资产阶级决定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来临时，当人们为消除人的物化关系而复归于人时，当人们为“自由王国”而斗争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阶级意识将越强烈地、越直接地决定它的每一行动。于是卢卡奇得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当阶级斗争达到最后决战时刻、当资本主义达到最终的经济危机时，“革命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即依赖于它的阶级意识。”^②

因此卢卡奇在1920年《阶级意识》这篇论文中，区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方面的不同。阶级意识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客观瓦解过程中，与无产阶级或其政党干预这个过程的有机结合上，以此冲破物化意识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1922年的《无产阶级立场》一文中，卢卡奇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模式了，他着重谈论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即自我意识。

卢卡奇对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分析依赖于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辩证法。“是什么导致无产阶级观点的变化？”^③他问道。答案是什么也没有。无产阶级最初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产物身份出现的，它的存在形式是物化和非人道的。在社会存在方面，就其直接性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同的。卢卡奇援引马克思的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④但是卢卡奇又说，间接性对于这两个阶级来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无产阶级个性和全体包含着超越物化的客观可能性。无产阶级同这个社会存在相联系的第一个方面是主体意识的幻觉。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最初是以纯粹客体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工人把自己想象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然而这种幻想立刻就被他存在的直接性——社会现实所粉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他仅仅是这个过程

^② 同上书，第70页。

^③ 同上书，第14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的单纯客体，一个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特殊商品，一个资本主义机械化和合理化生产的工具。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中，不仅个体工人是这个过程的单纯客体，而且全体工人都是单纯的客体。

在分析无产阶级总体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客体时，卢卡奇借鉴了黑格尔的限度概念，把质、量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与主客体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总体的工人降低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体，意味着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从量到质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了真正的客体形式。他说：“量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以它的客体的质的决定因素出现的。对工人来说，则是以他全部身体、精神和道德的质范畴出现的。”“在这种联系中，就它的性质来说，每种变化都是质变。”^⑩

卢卡奇对劳动时间的分析使它的限度概念更加明确了。他说：“就劳动时间来说，限度是已被物化和正在物化的展现客体真正本质的外衣。”^⑪劳动时间无论增加或者减少，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合理化的，而工人则认为他的劳动时间与资本家付给他的报酬是等价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劳动时间“不仅仅是他出卖劳动商品的客体形式。此外它也是作为主体，作为人存在的决定形式。”^⑫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通过它的劳动时间能够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且能够克服这种对立状态。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显示了主客体对立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是怎样通过劳动时间来超越它的社会存在的直接性：一方面，在社会存在中，工人是直接地以客体的身份活动的；另一方面，客体的作用不再以纯粹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迫使它的劳动时间同它的整个人格对立起来，被迫把自己作为商品来出卖。当工人能够意识到它自

^⑩ 《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66页。

^⑪ 同上。

^⑫ 同上书，第167页。

己就是商品时，也就说明他意识到了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存在。通过这个商品，工人能够认识到他自己和资本的对立，也即商品背后的劳资关系。这种认识是工人对商品的自我认识。于是资本主义的“实体”开始转变成为它自己。

卢卡奇指出，如果工人能够意识到每种商品的拜物教本质与实质，那么工人就有可能承认所有商品的拜物教特征。由此就可以深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结构的社会基础和物的背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认识、这种商品的自我意识仅仅说明无产阶级意识到它自己是经济过程中的客体。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如果个体的工人承认他自己在一种商品中，他的劳动力作为客体，那么这意味在商品的世界里，总体的工人就会承认社会劳动作为一种客体，换句话说，这种承认也意味着一个阶级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以及社会中物的界限开始进入人的过程。“在物的外衣下，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量的外表下，掩盖着质的核心。”^③ 现在这个核心显露出来了。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意识到一种特殊的拜物教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的实质，进而意识到劳资之间的强烈冲突。因为无产阶级承认它自己为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如果资本的物化消失在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完整过程中，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发现它自身是这个过程的主体便是可能的了。”^④

总括上面的分析，当个体的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生产过程中的客体时，就导致了意识的客体方面的结构变化，这种意识是物化的最低意识；当一个阶级意识到它在生产中的客体地位时，则为无产阶级产生自我意识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当无产阶级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的东西不过是物化的帷幕下主观的反映，物仅仅是人的关系面纱下的表象时，资本主义物化的大厦就倒塌了。一旦资本的偶像、拜物教的实质被戳穿以后，无产阶级就意识到它

③ 同上书，第160页。

④ 同上书，第181页。

自己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从而取得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卢卡奇对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分析，很有一些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人与奴隶辩证法的味道。如果奴隶意识到主人的一切都是由他产生的，主人正是通过奴隶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依赖于奴隶，那么奴隶就从主人那里获得了解放。用卢卡奇的话说：“如若一个认识者认识这个整体，他将能完全控制它。这实际意味着废除资本主义经济”。的确，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一再强调，“一当无产阶级成为自我意识的阶级，它就理解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含义’”；^⑤一当无产阶级理解了自身和社会，它就要通过无产阶级实践“从总体上彻底改造社会和自身”。因此意识是“实际出发点”，自我意识就是“革命过程本身”。因为在自我意识中，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这种意识不是对一种对立的客体的认识，而是对客体的自我意识，所以意识的行动推翻了客体的客观形式。”^⑥因此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废除，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完全系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在无产阶级具备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前提下，自我意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充分条件。正如卢卡奇指出的那样：“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指出历史的辩证法前进的客观道路并得到支持时，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认识到历史过程的意识，并且只有在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他们的实践才能是改造现实的实践。”^⑦

^⑤ 同上书，第149页。

^⑥ 同上书，第178页。

^⑦ 同上书，第197页。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范畴

衣 俊 卿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实践派于六、七十年代成为国际哲学生活中较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东西方的一些研究者和评论家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它褒贬不一,很多评价大相径庭。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亦开始注意实践派的人道主义立场。实践派对实践和异化范畴的强调曾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共鸣,但是对之敬而远之者或干脆持否定态度者亦大有人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研究者的立场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自己对某些范畴和原理的先入之见来取舍、把握和评价其研究对象。

评价实践派观点的困难正在于此。实践派并没有自己特有的哲学范畴,它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自由、创造性、异化、革命、批判等范畴作为自己理论的主要范畴,同时又赋予这些范畴以不同于经典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含义。因此,在评价实践派哲学时,首要的问题是搞清它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些范畴。

在实践派的所有范畴中,实践一词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它是理解实践派哲学的关键。为了避免歧义,实践派特选来自希腊语的Praxis,以区别于实用主义的实践范畴和纯认识论的实践范畴,但是,“实践”一词所引起的误解和混乱并未由此根绝。在我国目前关于哲学体系改革的讨论中,人们亦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的体系冠以“实践的……”,但实际上对实践的理解却一如既往。因此,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实践派对实践的理解,既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评

价实践派哲学，也会对我们目前的哲学改革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反映与实践

实践派的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它的二十几名代表人物在研究领域和对具体问题的见解上都存有许多差异。他们对实践范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将实践视作自己所致力于建设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从总体上看，在实践的地位上，他们经历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严格客观性立场向实践立场的转变，进而从认识论的实践范畴向人本一本体论的实践范畴的转变。而完成这一转变的契机是1960年的布莱德会议。

实践派形成于50年代，一般称之为人道主义派，后因1964年创办《实践》杂志而得名实践派。批判斯大林主义是50年代南斯拉夫哲学界压倒一切的任务。实践派哲学家最初也同其他哲学家一样，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斯大林对理论与方法、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割裂，以及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否定和对辩证法的修正。但是，经过对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的研究，他们在50年代末转而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再批判，认为斯大林主义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修正，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反动，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形式，因为在斯大林主义中根本没有人的地位。

这样，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实践派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建设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要建立一种真正的、从本质上和整体上而不是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仅仅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不够的，同时必须突破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因为后者过分地强调客观存在，特别是自然对人的认识、思维和现实活动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这样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体系不能反映马克思以人为核心的革命的批判的立场。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众多原理中，反映论最能体现上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它成为实践派摆脱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突破口。

1960年在布莱德举行的题为“实践、主体、客体和反映”的讨论会上，实践派哲学家从本体论、认识论、人本主义、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不同方面对反映论立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一致主张以实践立场取代反映论立场。当时，实践派内部对实践的理解主要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些人注重实践的认识论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实践的人本一本体论的地位。

M·马尔科维奇在“实践是认识论的根本范畴”的报告中系统地发展了认识论的实践范畴。在他看来，在关于反映和实践的争论中，实践立场显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而反映论则退回到旧唯物主义把主体与客体视作给定的二元论立场。马尔科维奇把实践限定为改造自然环境、创造社会生活形式和人进行自我创造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社会性的活动”。他认为，以实践为核心和出发点建构认识论有诸多优越性：首先，实践具有直接性，这符合间接知识应建立于直接知识基础之上的方法论原则；其次，实践立场可以发展一种令人满意的真理观；最后，重要的是，所有其他认识论范畴均潜在地包含于实践之中，因此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从实践中引出主体、客体等重要范畴，从而扬弃反映论中主体与客体的给定性。

与M·马尔科维奇不同，G·彼得罗维奇、M·埃格尔加等人在批判反映论时更多地强调实践的人本一本体论的含义。彼得罗维奇在“真理与反映”的报告中指出，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认识论问题归结为人本主义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人本主义问题归结为本体论问题，但是，关于思维的问题必须以人的问题为前提，“这就是说，“认识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本主义”问题的解决，而后者也不能离开“本体论”问题而真正得以解决。

彼得罗维奇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立

场的原理应是马克思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理解和思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形式的理解”^①。而反映论无论作为关于人的生活真理性的理论，还是关于意识的本质的理论或关于思维真理性的理论都是不成功和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有悖于马克思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理解。彼得罗维奇指出，既然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而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那么作为人的能动活动形式之一的思维就不可能只是反映，实际上，对世界的任何一种反映或解释如果不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世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M·埃格尔加在题为“关于反映论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报告中持有与彼得罗维奇相同的观点，只是比后者更彻底和更激进地抛弃了反映论立场。在他看来，根本没有所谓“能动的反映论”，反映论本质上只有一种，它是建立在给定的主体与给定的客体相互对立基础之上的认识论，而这同马克思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埃格尔加认为，反映论所追求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同人们活动无关的客观存在与康德的“自在之物”无异，这种自在自然对马克思来说等于“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构成人的认识和存在基础的不是所谓的“自在之物”，而是人化自然，即人的实践及其结果。因此对人而言，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人的实践。

在布莱德会议上，人道主义派(实践派)对反映论的批判同辩证唯物主义派对它的捍卫相比占了绝对优势，以致于以后在南斯拉夫当代哲学发展中反映论问题很少再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可见，在对反映论的批判中，实践派内部存在差异，即对实践的认识论含义的强调和对实践的人本一本体论含义的强调。这一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于实践派内部，但这并不是说这一差异已导致分歧双方各执一端。实际上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马尔科维奇在强调通过逻辑分析从实践范畴中引出主体、客体等其他重要的认识论范畴时，并不否认实践同时也是一个入本主义和本

^① 《反映论的一些问题》，“未来”印刷社1960年版第32页。文中全部引文均出自塞尔维亚文版文献。

体论的范畴；而彼得罗维奇和埃格尔加并不否认从实践中分析出主客体范畴的重要意义，只是认为，更根本的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现实的主体与客体。

在尔后的发展中，实践派哲学家更多地侧重于强调人本一本体论的实践范畴，以此建构作为实践哲学或革命的思想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搞清他们所谈论的实践的人本一本体论含义是理解实践派哲学的关键。

人本一本体论的实践范畴

在哲学研究中常遇到的困难之一在于：愈是普遍的范畴，愈难作出公认的界定。实践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和十分普遍的范畴。很多哲学家甚至认为根本无法为实践下定义。不过在涉及到实践问题时，人们还是努力以各种方式对之作出界定或解说。

实践派哲学家从不同侧面对实践范畴作了许多界定和解释。彼得罗维奇的实践定义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实践本质上是活动，是“人藉以创造（制造、生产）和改变（形成）自己的历史世界和自身自由的、普遍性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活动，是人所特有的使之根本区别于所有其他存在物的活动”^②。

应当说，如果仅凭借这一定义来评价实践派对实践的理解，那么即使坚持反映论立场的哲学家恐怕也不会对这一理解提出否定性的质疑。实际上，实践派对实践的理解并不限于这一抽象的定义本身，关键在于对这一定义的展开，即对定义本身的解释。那么，实践派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强调实践具有本体论含义？从他们的众多论述中可以发现两层基本思想。

第一，实践构成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

毫无疑问，“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命题是所有实践派哲学

^② 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5年第1—2期第175页。

家都坚持的实践哲学的根本命题之一。如前所述,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和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否定或忽略了人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应占据的中心地位。由此,实践派哲学家在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首要的任务是对人的认识;而认识人的关键是把握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就在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即实践。然而,人的问题并非全新的哲学问题,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古已有之,而在康德的“三批判”之后,人的问题已成为当代哲学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实践派要选定实践作为人的本质规定?

彼得罗维奇在探讨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的各种界定时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探讨人的本质决不意味着揭示出某种只有人具备而其他动物都不具有的特征,如理性、思维、语言等等,也不在于揭示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特征,这不仅仅是因为类似的特征不胜枚举,更重要的是因为人并非各种属性的简单堆积和集合。人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存在物,同时又是结构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物。因此,探讨人的本质就在于揭示使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存在物同其他一切存在方式根本区别开来的东西。彼得罗维奇认为,只有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才能担当此任。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因此,“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形式)存在的存在物。简言之:人是实践的存在物”^③。

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命题出发,P·弗兰尼茨基强调实践的人本一本体论的含义。他断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这就是说,实践包括了人的存在的“所有方面”,例如:“感性的一具体的、理论的一抽象的和情感的一体验的”方面^④。马尔科维奇也认为实践是人的活动总体。他在《辩证的意义论》一书中把实践的主要内涵划分为六个方面:变革客观环境、社会合作、人际交往、经验创造、有目的的和价值的活动、以及思想活动。

③ 《今日的人》贝尔格莱德诺里特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页。

④ 南斯拉夫《实践》杂志1964年第1期第36—37页。

如果不拘泥于上述哲学家的具体差别，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关于人和实践问题的共同意向：不是把实践当作同认识活动相对立或相并列的特殊的感性活动，而是将之视作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在内的人的总体性活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不是以某一方面同其他动物或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而是以这种总体性活动，以这种特有的存在方式使自身在整个存在王国中突现出来。

那么，人同其他动物的存在方式相互区别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已经包含于实践派的实践定义之中。动物总是保持它所是的东西，不能自由地与自己的对象相异，因为它不具有这种生产和改变自己周围世界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而人则打破自身与自在世界的自在统一，因为他以自己所特有的自由的普遍的创造活动不断扬弃自在之物的给定性，不断重新塑造出自己的对象和自身，给自在的自然打上人的印记。因此，本质的区别正在于存在和活动方式的不同：“动物只为自身生产，而人却再生产出整个自然。动物片面地生产，而人则全面地生产。动物只根据它所从属的那个种类的尺度和需要生产，而人则懂得根据任何种类的尺度生产，他在自己的历史中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类”^⑤。

第二，实践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也是人的世界存在和统一的真实基础。

实践作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作为人的活动的“本体论结构”，其意义并不囿于把人同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把人提升到自然之上，它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自在自然的存在方式，使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属人的世界，即是由人改变或重新塑造的世界。用纯哲学的术语来说，实践并非纯粹的人本学范畴，它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本体论含义。

彼得罗维奇在阐述实践的最高形式——革命时指出，人通过实践活动而进行的革命变革不只是人自身内部的改变，而且是“宇宙”中的改变。当然这决不是说作为革命的实践活动也在

^⑤ 科拉斯：《马克思与当代社会学》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210页。

人之外的自在自然中发生，而是说，人的实践活动，人的革命变革在改变人自身的同时，不能不对所有其他存在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实践不是同宇宙中其他存在形式相对的某种特定的存在形式，而是唯一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存在。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作为一种在自身结合了并超越了所有其他存在方式的存在，人无论如何渺小或短暂，都决不会对整个存在系列毫无意义。一言以蔽之，“无人的世界与有人的世界是不同的”^⑥。

埃格尔加在《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和自然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的观点。他认为，实践作为人的本质是历史与世界、精神与肉体、精神性与物质性、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人与人等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一实践活动是感性的、对象性的、有意识的、自由的“否定之否定”。人凭借这一活动不断扬弃自然的给定性，不断重新塑造出自然和自身，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成为“人的自然”，成为人的世界。在这里，自然只有当它不再作为给定性的自然时才存在，而人只有当他成为人的自然时才存在。埃格尔加认为，在此之外讨论所谓的“自在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它相当于康德的“自在之物”。自在自然只有进入人的活动领域，即人的世界中才对人的认识与实际活动产生意义。因此他断言：“正是历史……中的这一人的实践的一对象性的活动不但是自然世界和人类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的观察及他的存在的可能性本身”^⑦。

实践的理想状态和历史困境

断言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是人的世界存在与统一的基础，这还只是在一般的、较抽象的意义上

⑥ G·彼得罗维奇：《革命的思想》，萨格勒布进步出版社1978年版第74页。

⑦ M·埃格尔加：《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贝尔格莱德1980年版第197页。

对实践范畴的界定，并未揭示它的全部内涵。要真正把握实践的意义，必须进一步展开它的具体规定。一方面，实践的定义已包含自由、创造性、普遍性、目的性等规定性于自身，因此，只有通过对这些范畴的具体分析才能把握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一界定本身已决定了实践所具有的开放性、历史性和趋向未来的特征，它永远不会停留为既存和现存的东西，而是不断扬弃给定性和现存性，不断指向未来，因此对实践范畴的历史性分析也是揭示实践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和作为人的世界存在基础的实践在哲学上既具有描述功能也具有规范功能：它既是对人与世界“是什么”的揭示，同时在这一“是什么”之中已内在地包含着人与世界“应如何”的向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断言，全部实践哲学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不过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范畴的丰富内涵的展开，而这一逻辑演进的背后正是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与世界的不断生成，是人对自身与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足点，实践派哲学家都十分注重对于自由、创造性、革命等构成实践本质内涵的规定性的探讨。很多人赋予自由范畴和实践范畴以同等的重要性，认为实践哲学也就是自由哲学。实践派哲学家普遍抛弃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传统认识论的自由定义。在他们看来，“对必然的认识”充其量不过是自由实现的条件。自由从根本上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之一，因而，不能离开人的本质即实践来理解自由。自由的本质不在于对外在必然性的认识与承认，而在于对给定性和外在制约性的不断扬弃，在于人的创造潜能的发挥。“人只有当其自身的创造性决定了他的活动，当他以自己的活动促使属人的东西的界限扩大时，才是自由的”^⑧。

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实践派关于自由、创造性、革命等基本范畴的论述逐一展开，这需要专文分析。然而，即使我们

^⑧ G·彼得罗维奇：《今日的人》，第46页。

把这些内容都加以论述，也还不能断言这已包括了实践范畴的全部内涵，因为迄今为止对实践的界定与解释基本上是对理想状态的实践的一种描述。如果停留于此，固守实践的理想状态，而忽略人的存在现状，或者简单地把理想状态同现实相对立，断言这种理想状态的实践只存在于史前或未来的某个历史阶段，那都将停留在对人的抽象探讨的王国，很难同抽象的人道主义划清界限。

但是，实践派哲学家并未就此停步。他们在建立实践哲学时，始终没有忽略对人的本质即实践作历史的考察。他们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物，但是，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达到永恒和完善，不会获得绝对的自由和创造性，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中，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更多地处于被压抑和受束缚的状态之中。即使象埃格爾加这样对反映论、决定论等观点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激进的实践派哲学家，在强调人是实践的、自由的造物，自然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时，也不是片面地强调人之无所不能，他并未否定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人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总是要受制于外在的规律，总是要为自然性和给定性所制约。他所要强调的只是在于，这种给定性与自然性并不构成人的本质，相反，人的存在，无论如何微弱渺小，本质上都在于对给定性和自然性的扬弃，在于不断发展世界的属人本质。如果不是对自然性与给定性的不懈的扬弃，那么人既不会从自然中将自身提升出来，也不会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物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实践派在强调人的自由与创造性的同时，十分注重实践的历史规定性。在他们看来，断言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物，并不只是简单地揭示出人是发展变化的这一层含义，而是要更深刻地说明，人的发展，人的日渐自由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单向的纯粹上升的过程。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人是朝着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全面地发展自我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一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有上升，也有下降，既表现为人获得、拥有、占有、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表现为人的丧失、贫乏和异化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认识，实践派哲学家对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困境寄予极大的关切。在他们看来，迄今为止，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人的本质的最大丧失就是人的异化。因而，他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十分重视。马尔科维奇曾断言，马克思用以批判阶级社会的关键范畴是异化；同时，他用以描述在共产主义中实现的最高的价值、需要以及理想的关键范畴是扬弃异化。那么，什么是异化呢？实践派哲学家虽然表述方式各异，但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命题：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是人从自己的本质或人性的异化。如前所述，既然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存在物，那么人的本质就不在于人的既存和现存，而在于人能够和应当成为的东西，换言之，在于人不断地实现历史的可能性，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可能性，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人的自我异化正在于人不能自由地、创造性地实现历史的属人的可能性，却不断生产出把自身降低为客体的异己的力量。

异化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这一命题的进一步推论必然是在人自身、人的活动、人的本质和存在结构中，而不是在人之外寻找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和基础。这样一来，对于自由、创造性等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弘扬和对异化的批判与扬弃，对实践活动的理想状态的设定和对人的存在困境的揭示，本质上是同一个任务，同一个问题。异化发生于人的活动和人的存在结构（实践）之中，而扬弃异化的要求和动力同样来源于这一活动本身。这样一来，以人的命运和人的未来为终极关切，以扬弃异化、实现人类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种实践哲学、革命哲学、批判哲学。它通过对现存一切事物的无情批判和对未来的人道主义预见而革命地解释世界，同时，也就成为人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

综上所述，通过对实践派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的概要分析，我们发现很难同意国内外一些学者关于实践派哲学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断言。不可

否认，实践派的某些哲学家的一些具体结论过于激进，失之偏颇，对此应当作批判的分析。但是，如前所述，实践派并未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简单地用某种理想的设定同现存的状态相对立，而是始终坚持对人的本质（实践）作结构的和历史的三重分析。因此，实难把这样一种实践哲学归结为抽象的人道主义。相反，从实践派对实践范畴的界定与阐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启示。

启示之一是通过主体与客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生成的分析，即通过对实践范畴的人本一本体论含义的强调而克服主体与客体的给定性。传统认识论大多建构于主体与客体的给定性，即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或对立的基础之上。由此总是需要寻找二者统一的外在的联结。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虽然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把主体与客体当成给定的对立的东西，然后以实践为中介寻求二者的统一，而不是把实践当作包含主体与客体于自身的总体。因而这种反映论很难完全摆脱机械反映论的特性。

另一启示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的世界的限定。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再限定。这有助于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质。从上述分析可见，实践派哲学家在强调实践是人的世界存在和统一的基础，以及自然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时，并未一般地否定“自在自然”的存在，只是强调，由于人的实践本性，只有属人的自然才能成为人认识 and 实际活动的现实对象。因而，在这里，实践派哲学家是在作一种尝试，即完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谈到的哲学思维视角的转变：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转为“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⑨。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当然,既然说这是一种“尝试”,那么就有对这一尝试成功与否,或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进行评价的问题。这需要每一研究者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完成,在这里我们无法具体展开对实践派的具体结论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哲学的发展和演进中,有价值的东西并非只限于正确的结论,而是包括开启新思路,变换新视角的尝试,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比前者更为重要。

阿尔都塞思想简评^①

彭 赞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阿尔都塞是以“保卫马克思”的姿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论争中去的,他以“两个干预”为出发点得出来的马克思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的核心论题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论点,对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用青年马克思去取代整个马克思思想的企图和观点,对批判当时法国国内以萨特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溶合在一起的企图,对剖析和批评苏联自30年代以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模式,在当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人们,包括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家们兴高采烈地摆脱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感觉良好地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时,他却更多地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历史条件上去说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变化,显示了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冷静与独到,也显示了他试图维护马克思主义免受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玷污的真诚愿望。

其次,在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方法论方面,阿尔都塞是有独到见解的,他既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和“西方马克思学”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去解释整个马克思思想的做法,也反对苏联东欧的研究者用成熟马克思去同化青年马克思的“提前论”、或“成分论”的研究方法,并对后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批判。他批判后者把青年马克思

① 这是彭赞的长篇论文《在认识断裂鸿沟的彼岸——论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的科学与意识形态“认识论断裂”的核心论题》的结论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的某一著作或某一阶段上的整体思想分解成一个个所谓“唯物”或“唯心”主义的成份,然后加以取舍判决,他批判后者把成熟马克思的一些原理和命题套在早期著作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损害了对青年马克思各时期整体思想的理解,是一种针对“西方马克思学”挑战而不能积极应战采取的折衷主义态度,是应该抛弃的。他的这个批判入木三分,不能不认为击中了批判对象的要害。对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与此相关,阿尔都塞提出的要用“总问题”的方法,即用关于青年马克思某一阶段的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围绕一个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的方法与观点去研究青年马克思乃至整个马克思的思想,尽管含有巴歇拉尔历史认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某些因素,但对克服实际存在的“成分论”、“提前论”的折衷主义方法是有益的,它似乎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青年马克思在各个思想阶段上的性质和特点,抓住其中心论题,比较确切地揭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在同一问题上,他提出的要从思想与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及结构中去考察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意义和演变、不能就著作论著作、就思想论思想的观点,他提出的要把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分开,不能用政治立场为其理论观点作论证并以此代替理论分析的论点,他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是突破德国旧的“意识形态襁褓”之结果的论证都是极有见地的,对于克服马哲史研究中的一些偏向是颇有借鉴和启发的。

第三,阿尔都塞从反思苏联哲学模式的“经济决定论”出发提出的“矛盾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辩证法观点,在理论上无疑比前者更接近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基于总结理论的教训和实践的经验所大力阐发的有价值、有见地的观点。他把马克思的整体观看作是有主导结构的,多层次决定的整体观,试图克服以往那种只从经济基础上说明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只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而遗其它复杂的社会因素

而不论的理论偏向，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中起了较有价值的阐发、重新认识的警示作用，带来了一种严肃周密而又不失灵活机动的清新空气。应该认为，这个观点在对历史所作的观照上，更有说服力地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在理论上则对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对于指导经济落后地区人民的革命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是阿尔都塞立论观点中有重要价值的地方之一。

第四、阿尔都塞提出的“作为生产的认识”的基本观点，如果暂且撇开其唯理论的倾向，可以认为他是从认识过程，认识结果的意义上道出了一个精神生产的模式。他引申了马克思有关物质生产的概念和过程，提出了知识生产的三要素（原料、工具——概念方法和认识结果——知识）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也比较具体和详细地分析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知识的生产过程和性质，这对今天我们研究精神生产诸问题有一些借鉴作用。

此外，在他涉及的种种问题的范围内的其它一些观点和命题，尽管有明显是为其“断裂”核心论题服务、有明显的理论偏向，但也不失独到精辟之处。譬如，他的“断裂”论题虽然走了只强调区别、不承认联系的极端，但他还是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思想演变的临界点，反对了社会民主党人和“西方马克思学”用青年马克思同化整个马克思的企图，也纠正了苏联东欧的研究者们非科学地抹杀这种区别的某些作法；他对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如对“颠倒”的重新界定，对黑格尔总体性的界定、对马克思整体观的阐释，对我们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重新认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运用和改造，正确认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是有益的。

值得强调的是，在肯定阿尔都塞的一些具体论点的合理之处时，我们还要反复申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就思想性质而言，阿尔都塞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对之并不合适。不可否认，结构主义

也是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它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和其它同类型者有合拍和吻合之处，但类同不等于相同，在对某一具体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时，可能从不同角度上看会出现与观察分析者用的参照系相吻合的情况，这并不奇怪。比如，“总问题”的方法，强调分析思想整体、强调指出思想整体中各成分各因素的统一、强调思想的演变不是某些思想成分导致之果，而是思想整体、思想内在结构的更替所致，这与结构主义的结构关系重于组合关系、整体与内在组成成分的观点很相似，凭此一点，分析者要把它归结为结构主义倾向似乎不是毫无道理，但正象我们前面详述和分析过的那样，“总问题”的方法是对巴歇拉尔科学哲学和历史认识论关于科学的产生和变革不是持续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通过抛弃和撤换早期概念、用新的理论结构取而代之的间断性革命过程这一观点的移植和发挥，然后使用雅克·马丁的这个词表述出来的，很清楚，其源头是巴歇拉尔的历史认识论，而不是结构主义；如果把强调整体、强调整体结构的观点都称之为结构主义，无疑导致牵强附会、失却严谨的分析。至于“矛盾的多元决定”的观点也不象一些分析者所认为的，是所谓用结构主义方法引申出来的观点，而是对马克思若干论述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发挥和总结出来的，也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原有理论模式所认为的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来的，结构主义方法强调整体中各个组成成分对整体性质的同等重要性，并无主次作用之分，而“矛盾的多元决定”的论题恰恰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存在着一个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结构，在这复杂矛盾整体内的其它因素对整体的发展在某些契机中也能单独或汇合成一起起决定作用，但其起作用的大小、时机都是由主导结构“最后决定的”。仅此而言，就与结构主义方法不能同日而语。结构主义之于阿尔都塞影响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通过拉康那儿借用来的“症候阅读法”。前面说过，它与“总问题”的分析方法有内在相通之处，但毕竟不是一回事。

我们认为，用“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更能表达阿尔都塞的

理论特性,在逻辑上,“唯科学论”这一概念包括了巴歇拉爾的科学主义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也是结构主义的种概念,不致于以偏概全,却能够包容其基本论题和论证;从内容上看,它更能够确切地说明阿尔都塞是怎样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来比附马克思的历史观、用科学哲学的一些方法来考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用科学概念拒绝非马克思主义、拒绝“意识形态”、用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外在性、无主体性来批判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企图;也能更好地说明阿尔都塞如何用科学研究对象的实在性确定性来区别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用科学的理论表述形式说明知识的产生、以及用某些自然科学的自满自足性来说明真理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总之,正象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的那样,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的科学和意识形态“断裂”的核心论题本身就集中表现出了阿尔都塞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这是我们从考察“断裂”核心论题出发,顺理成章地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从“断裂”核心论题这个基本线索去分析,我们认为,尽管阿尔都塞是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个政治立场出发投入理论论战的,但是他用的武器却是科学主义和唯理论的,他基本上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在“世界三”——已经作为一种认识结果和理论的层次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及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太迷信科学、太留恋理性,把一切好的、正确的,他认为可取的都划归到科学的领地内,而把一切所不满意的思想统统斥为科学的对立面——意识形态;他把复杂的思想历程、犬牙交错的思想论题的影响和渗透看得过于简单和泾渭分明,似乎一个“断裂”就能把谬误和真理明确无误地区分开来;他的分析的参考系是科学主义和唯理论的,用科学和理性的框架进行论点的筛选和论证,就此进行推论,由此辐射和延伸出一系列看似深刻、但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论述不大吻合的论点。他整个的论述都是从理论到理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实践性、批判性被一种纯理论的论证和阐释淹没了。由这种浓厚的科学主义和唯理论色彩为主色的“断裂”核心论

题也必然出现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种种情况。

首先值得反思的是，阿尔都塞的“断裂”核心论题以及其哲学史论证、科学观照和哲学透视，始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把前者作为科学，把后者视为意识形态，然后在这二者之间掘了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人为的鸿沟”既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演变发展的实际，也不可能真正历史地说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的“奥德赛”式的思想历程。“鸿沟”之所以出现，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阿尔都塞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他根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认识和分析，缺乏对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一生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的形成、发展和发挥的把握，相反，他在反还原主义、反历史主义的论述中，甚至在方法论上否定了这个核心概念的存在。不可否认，阿尔都塞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区分两个马克思的标志是合理的，但他并没有抓住《形态》的核心思想——即他所热衷言之的“总问题”，也没有抓住在此之前这个“总问题”的起源和演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明确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哲学、宗教、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物质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一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核心范畴的酝酿、演变和科学形成、发挥与详述的历史。青年马克思从《博士论文》起的哲学批判到《莱茵报》时期的理性批判，从《德法年鉴》时期的人道主义到《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然后过渡到《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实践”范畴之间，无不存在着一种纵向的内在联系；从哲学意义上的《形态》的“物质生产”概念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的劳动概念之间，

也无不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过渡，这在马哲史中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而阿尔都塞基本上舍弃了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这个核心概念的存在，更看不到其中从前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和转化，他所热衷的只在于把马克思在各时期的思想分成一个个彼此互不联系的、只围绕一个个“总问题”而存在的微观思想结构，各个“总问题”之间在他那儿没有过渡、没有联系，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之间更是如此。阿尔都塞这样就只能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诞生归结为新术语的采用表达了新的“总问题”，至于新术语所表达的思想、所表现的理论总问题从何而来，则始终是一个没有解破的谜，而这个认识论之谜的存在也必将反过来影响阿尔都塞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总问题”的把握，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说明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和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起源。

其次，“断裂”鸿沟的不可逾越性，还在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科学观念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在阿尔都塞的思想深处，他并没有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事件来看待，而是把它和某些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的创立相提并论，他没有看到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前者有阶级性有党性，是某一阶级的优秀思想家创立出来为他所从属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而后者则没有阶级性和党性；阿尔都塞也没有真正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性和实践性，而是笼统地称之为与自然科学相并列的真理。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阿尔都塞始终把它作为人们对自己利益、现实环境、愿望、要求的表达，是以人为中心的本质唯心主义的表现，从而实际上把它等同于谬误、在“断裂”论题的论证中，他没有看到，意识形态既是社会存在的有机部分，也是马克思所论述的被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所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是一种指代谬误，幻觉的哲学范畴，而在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中它已被改造成一个表达社会内部层次结构的科学范畴；他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既是科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

理论反应,它表达了符合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它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和领导革命时制定策略、方针和路线的理论基础,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带有极大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的这个功用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中抹去,在动机上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纯洁性,使之免遭其论敌的攻击和指责,而实际上他这样做便无意中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价值;从认识论角度看,他是用西方传统的科学和意识形态概念来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成分和历程,把科学等同于真理、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谬误来说明马克思与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断裂”,这种用旧的理论框架来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做法必然会出现双重的后果:非马克思主义地强调“断裂”和显露出阿尔都塞本人的观点和方法并没有和传统的思辨哲学、科学主义“断裂”,而这种从马克思主义之外运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可能科学地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也恰恰是阿尔都塞自己要尽力反对的。

再其次,阿尔都塞对“断裂”核心论题的哲学史论证,虽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它以前的各种哲学的本质区别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对其“断裂”关系的赘论却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了,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密纳发的女神来到人间,有意无意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维的优秀成果的联系,断然否定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吸取和改造,这种做法也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远离人类文明大道的独往独来的思想体系。由于阿尔都塞无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这个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的存在,他自然也看不到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思想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中对这个核心范畴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不可能认识到所谓青年马克思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时期正是马克思把理论批判视为实践活动的时期,而所谓“共同体的人道主义”时期则是马克思从理论批判实践转变为物质实践的时期,他也不可能认识到《巴黎手稿》中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异化劳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扭曲了

的实践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了它最后方能升华为《形态》的科学的实践观。青年马克思从一个理论渊源转到另一个，固然存在着“总问题”的更替和取代，但这些“总问题”的交替是绕着一个轴心运转的，它们为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有不可抹煞的作用，应当具体研究分析，不是用一个“认识论断裂”的术语就能说清楚的、那种笼统地从“总问题”出发来论述青年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不可能具体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真正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实质和意义。

第四、在对“断裂”主题的科学和哲学观照中，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哲学观，分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又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创立的新哲学这一事实，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迟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而只是处于理论实践状态的论点，实际上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割裂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一种理论实践，只生产认识产品，而新哲学则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在真假观念中划界线、在阶级之间划界线，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争夺领导权；这样，在历史科学的创立伊始，由于哲学还处在不明确的“实践状态”，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就大成问题了。阿尔都塞囿于巴歇拉尔的哲学观，也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和哲学是不可能分为前后两部分两个不同的东西，他把历史科学和方法截然分开，想从中抽出一个新的哲学，这种观点只是阿尔都塞本人用科学主义和唯理论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起源、性质和结构上都是一体化的，根本不存在巴歇拉尔——阿尔都塞式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前后左右、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用巴歇拉尔的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的革命变革，同样必将在字句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实际上抹去了这个理论革命的独特性。

第五、阿尔都塞所区分的生产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

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等多种实践形式，并且把这些实践基本上视为彼此独立、没有内在联系的过程的做法，实际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把马克思所定义的客观的感性活动扩大到主观活动的领域。由于把主观的认识活动也称之为实践，传统的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界限便不复存在，但却为阿尔都塞从科学主义和唯理论的角度上重新阐释马克思、发挥其理论奠定了基础，由此他就可能主要不在现实的客观感性的实践层次上、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关系上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而在“理论实践”的层次上、在认识对象、过程和结果的角度上说明它和前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由于理论实践和客观的物质实践没有内在联系，而理论实践和实际直接联系的过程又被斥之为经验主义、主体的唯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的结果的真理性与否也无须外物来检验，它自己是自己的约定书和标准。在他看来，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也只是一个从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实践、从科学的概念不断得出新的科学认识的自满自足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双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动在这种论述中基本上被割裂了。

应当指出的还有，阿尔都塞不但在“断裂”论题的宏观把握上表现出浓厚的唯科学论的理论色彩，而且在他的具体论述中也并非象有人所认为的是逻辑严谨的，而是经常出现理论的自相矛盾。譬如：在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方法论批判中，他提出推动思想发展的动力不在该思想内部，而在其外部、在这种思想的此岸和真实的历史的论点，说明青年马克思不同时期总问题的更替在于外因，以论证“断裂”的可能性；而在从认识论角度上论述“断裂”时，他则把思想发展的动因全部归结为思想原料和工具的关系，把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发生在认识内部的过程。在论述《巴黎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时，他曾肯定地认为《手稿》是《资本论》的先声和草图，在后者中找到前者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等几乎所有范畴，这似乎强调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但在后来

论述《资本论》时，他却完全否定了这些范畴存在的可能性，强调后者只有在与这些范畴“断裂”之后才能产生。这些都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在思维方式上，阿尔都塞承认自己是“思考极端”，他尖锐的提问方式、挑战性的用语在理论论争中经常起到引人注目振聋发聩的效果，但也常常导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结果是他自己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受到多方面的批评、指责，也受到一般非专业读者的误解（如马克思是理论的反人道主义的提法），从而引起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反而未必收到了他所期望的“保卫马克思”的社会效益。

总之，通过对阿尔都塞以“断裂”论题为核心的整体思想的考察和分析，对阿尔都塞及其理论活动，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基本评价：阿尔都塞是一个有较深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一个想真心诚意地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共产党员；其理论论述不乏冷静独到和精辟之处；他以“断裂”为核心论题的马克思研究有明显的偏执和错误，不可能真实地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的理论观点，但也同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思路；他是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冲击苏式理论模式的先锋，又是批判自卢卡奇开始的、以萨特为其典型代表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斗士，他的理论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人道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阿尔都塞的理论活动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的主要代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那种把阿尔都塞的思想不加具体分析地戴上“结构主义”的帽子，而又把结构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潮相等同、进而将之作为理论垃圾加以抛弃的粗暴做法，那种对其论述不作具体考察比较、不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只作为批判对象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也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者应当摒弃的门户之见。对阿尔都塞以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各学派,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发出了不同于我们现在所接受、所习惯的理论观点就斥之为异端,就急于简单地批判否定或不屑一顾,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深入其中具体分析,分清其功过是非、认识其特有的理论价值与得失,通过汲取其理论的经验教训来深化和革新我们的研究,从而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简介

李 其 庆

一、写 作 背 景

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一书^①发表于1965年，由作者于1965年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资本论》研究会上所作的几篇报告汇集成册。这些哲学论文是阿尔都塞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斗争中构思、写作和发表的。阿尔都塞本人在1970年5月《读〈资本论〉》英文版正文前面的按语中写道：“关于这部著作写作时(1965年)的形势，关于它作为对这种形势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干预的性质，以及关于它在理论上的局限、缺陷和错误，读者应该读读《保卫马克思》中的介绍——《致我的英语读者》。”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形势就是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法国共产党内和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形势。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就是对这种形势所作的“干预”和“反应”。

阿尔都塞著作涉及的不是这种形势的政治方面，而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争论；二、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争论。阿尔都塞进行“干预”的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划清界限。

^① 本书已由李其庆和冯文光同志译成中文，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成熟期著作关系的争论发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而在五、六十年代则形成了高潮。这场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等问题。

《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手稿》首先反映了马克思当时在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在直接继承19世纪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先进理论，同时对这些理论进行革命改造而取得的。但是，《手稿》是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它无论在观点上还是在术语上都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历史特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手稿》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上，同时也反映在某些人本主义的模糊不清的论述中。这说明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出现，但是这些新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明确表述，还没有采取与内容相符合的论述形式，同时也说明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同它脱胎而来的旧的哲学学说完全划清界限。

《手稿》与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学说之间的这种批判和继承的复杂关系遭到了某些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和误解。他们夸大马克思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抹煞马克思异化观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异化观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本质区别，否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界限，把《手稿》的中心思想归结为人本主义，提出“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消除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实质和最终目的等等。与此同时，他们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的”马克思，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成熟著作对立起来，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思想的顶峰，把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说成是这一学说的退化。他们制造

这种对立的实质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用它们所歪曲了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的用人道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就是对这种用《手稿》中的异化、人道主义、人的本质去解释和统一《资本论》和马克思思想的错误观点的回答。

阿尔都塞的另一个“干预”是指由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争论。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 5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英文版《致我的英语读者》一文中描述这种情况时写道：

“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普遍地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当作一种‘解放’。这种‘解放’产生了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意识形态反应，即‘自由’和‘伦理’倾向，它自发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人’、‘属于人的人’和‘异化’等陈旧的哲学论题。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确实包含了一种关于人、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哲学的全部论点。这些情况自相矛盾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面。自 30 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这些早期著作，开始是一点一点地、以后又是大规模地被用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新的解释。今天，许许多多被苏共‘二十大’从斯大林‘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正公开地发展这种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题和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人道主义’解释，正逐步地不可抗拒地把自己的影响强加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在苏联和西方的共产党内部也不例外。”

阿尔都塞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出现的人道主义思潮是对“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种反动，是马克思、列宁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阿尔都塞反对对“斯大林主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斯大林虽然犯有“偏向”的毛病，但对马克思主义仍然作出了贡献。他称赞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是一部“在许多方面很出色的”著作，并高度评价斯大林拒绝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观点。他也曾批评过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他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论，而主张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相对的自主性。他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来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而是找错了原因。批判这些错误，首先必须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政治条件、意识形态条件和理论条件，从而划清马克思主义科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界限，分清理论是非，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为此，阿尔都塞给自己规定了两项理论任务：

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纯洁性，反对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个人迷信”、机械主义、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复活人道主义、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明确指出：“要是没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因此，我的靶子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论述。”^②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方面的决定性任务之一，是反对时刻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今天在深深浸透着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一般形式是：经济主义（今天的‘技术统治’）及其‘精神补充’伦理唯心主义（今天的‘人道主义’）”。^③

二、从理论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阿尔都塞认为，要想彻底地清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科学的解释。因为教条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人为的

^② 转引自美国《激进哲学》1975年冬季号第12页。

^③ 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见本刊1983年第5辑。

现象，它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在不完善状态。那些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公开以哲学面目出现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著作，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批判，决不能把意识形态论题同科学的论题混淆起来，而人们从教条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东西恰恰是马克思后来与之决裂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等等）。哲学教条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人们能够完整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以理论实践的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的科学著作《资本论》中，只有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哲学上升到理论，才能找到真正的马克思哲学，从而“打开被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所堵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阿尔都塞就是本着这样的目的去研读《资本论》的。

二、主要理论内容

《读〈资本论〉》原书由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合著，他们各自的著作分别是两个独立的部分，我们这里只谈阿尔都塞撰写的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这是全书的序言。阿尔都塞主要论述了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的含义、重要性和方法，从而阐明《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二、《资本论》的对象。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对《资本论》对象同古典经济学对象的比较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1.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读〈资本论〉》是阿尔都塞研读《资本论》心得体会的记录，他认为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他是作为哲学家来阅读《资本论》的。为什么要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阿尔都塞首

先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作了说明。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着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革命。继泰勒斯创建数学,伽利略创建物理学之后,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历史科学。这一“新大陆”的开拓必将在哲学中引起革命,因为哲学同科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改造总是伟大科学发现的回声”。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打破了他从前的意识形态哲学,并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但是总的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落后于科学。因为历史理论已为马克思的成熟著作所记载,并为阶级斗争实践所丰富,而由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历史理论的实践中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多半还要加以制定。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只有在《资本论》中,才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④他提出:“应该赋予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的存在以一种对这种实践的存在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理论的存在形式,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存在本身只是以实践的状态存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实践即《资本论》中”。^⑤阿尔都塞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的目的就是要将尚未完全理论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科学理论,从而完成制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少数哲学家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本论》的关系,对《资本论》的对象进行了真正认识论的研究。但是“只有更严格、更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理解《资本论》的理论结果。换句话说,或者用经典的术语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景在今天还取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化本身又取决于对《资本论》的严格的批判性研究”。^⑥因此,他认为,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是理解《资本论》内容的理论前提。“《资本论》的对象问题

^④ 参看《读〈资本论〉》1968年巴黎版第1卷第33页。

^⑤ 同上书,第34页。

^⑥ 同上书,第93页。

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如果从科学阅读角度所作的阐述有充分根据,那么对《资本论》对象的特点的说明就会提供深刻理解《资本论》的经济内容和历史内容的手段”。^⑦ 这就是阿尔都塞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的双重目的。

那么,什么是对《资本论》的哲学的阅读呢?阿尔都塞认为,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就是提出《资本论》同它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同时提出它的对象的特殊性问题以及它同这个对象的关系的特殊性问题,从而提出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特殊性问题。哲学的阅读不同于其他形式的阅读。其他形式的阅读只是就《资本论》某一特定领域的内容进行阅读。无论是经济学的阅读,历史的阅读还是逻辑学的阅读都只是对《资本论》的有关论述同在它以外就确定了的对象加以比较,而并不对这个对象提出问题。而哲学的阅读恰恰是要对《资本论》这种特殊论述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问题。这就是要对《资本论》的论述一对象的统一提出认识论问题。《资本论》的这一认识论上的统一与经验主义、思辨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论述一对象统一完全不同。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就是要把《资本论》的科学认识论同种种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也就是对《资本论》的认识论的阅读。具体地说,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就是要明确,“《资本论》的对象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仅区别于古典(甚至是现代)经济学的对象,而且也区别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的对象”,^⑧“《资本论》是不是某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种黑格尔形式的古典经济学,是不是青年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制定的人本学范畴在经济现实领域的应用,是不是《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手稿》中理想主义愿望的实现?《资本论》是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简单的继续和完成,而马克思则继承了它的对象和概念?《资本论》同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是不是仅仅表现在

^⑦ 同上。

^⑧ 同上书,第11页。

方法，即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辩证法上，而没有表现在它的对象上，或者完全相反，《资本论》在其对象、理论和方法上构成了认识论的根本变革？……这就是我们由于对《资本论》进行哲学阅读而对它提出的认识论问题的含义”。^⑨

如何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呢？为此阿尔都塞提出一种新的阅读方法即征候读法。征候读法是同直接读法相对立的。直接读法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这种认识论认为文章的意义可以直接理解，即只需阅读就可以理解。例如，既然“异化”这个词在《手稿》和在《资本论》中都出现过，那就是说，这个词所指的概念在两部著作中是一样的。阿尔都塞认为对科学的阅读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读者和文章的这种直接关系，而是支配阅读的理论原则和文章中所包含的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前提，在这里，阿尔都塞提出了双重阅读和循环阅读的概念，他指出，“对《资本论》的哲学的阅读只有在应用我们正在寻找的对象本身即马克思的哲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个循环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的哲学才有可能在认识论上完成。因此，这里涉及的是本来意义上的生产。生产这个词表面上意味着把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而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存在的东西，以便赋予已经存在的基本材料以某种符合目的的对象形式。这种生产在其双重意义上说使生产过程具有循环的必然形式”。^⑩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要求深入阅读《资本论》，“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双重的阅读也就是不断从科学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⑪通过这种循环的阅读

^⑨ 同上书，第11、12页。

^⑩ 同上书，第37页。

^⑪ 同上书，第90页。

把没有在字面上写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的对象、理论和方法读出来，这就是征候阅读的目的。

阿尔都塞认为征候读法的关键在于找出在某一篇著作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问题体系即理论结构。任何科学或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问题体系，这种问题体系决定了它们所能提出的问题、提出问题的形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看”不过是问题体系对它的对象的反思。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是在一定基础上和范围内，即在某一理论问题体系所决定的结构领域内的一切对象和问题，同样，看不见的东西，作为被排除的东西，也是由问题体系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新的对象和问题在现有的问题体系中是看不见的，例如氧气在燃素说化学理论中或剩余价值概念在古典经济学中都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不是旧的问题体系的对象，因而必然是与这个问题体系所规定的看得见的领域没有必然联系的对象和问题，“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理论问题体系不看自己的非对象……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黑暗，就是理论问题体系自身反思的失明，因为理论问题体系对自己的非对象，对自己的非问题视而不见。”^⑫ 这些新的对象和问题在旧的问题体系中只是在特定的征候条件下，以空白、空缺、沉默、不出现的形式出现的。征候读法就是要把这些概念空缺所包含和规定的问题揭示出来。马克思正是运用了这种阅读方法，看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例如，马克思建立了劳动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作为空缺存在于古典经济学所作出的什么是劳动的价值的回答之中。马克思揭示了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回答的空白中的这个概念，并用劳动力概念的表述重新建立了回答同问题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了他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因此，“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不是在于回答的革命而是在于问题的革命”。^⑬ 阿尔都塞主张把征候读法也运用到马克思的著作上。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同样存在着概念的空缺、空白和不出

^⑫ 同上书，第26页。

^⑬ 同上书，第30页。

现，或者说存在着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例如马克思在表述自己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时使用的“颠倒”一词就代表了一个空缺，运用征候读法就可以恢复这个空缺，即这个回答的相应的问题。他指出，在《工资篇》中可以看到这个“颠倒”实际上就是“场所的变换”或者问题体系的变换。马克思的沉默或空白表明他当时还“没有掌握一个使他能够思考他带来的结果的概念，即一个结构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这个概念”。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意识尚未使他能够在严格意义上思考他所做的事情，他有时把对问题体系起着变革作用的关键概念的不出现在仅仅看作是术语的不出现在，同时，马克思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自己的批判，他对自身的判断也是逐步加深的。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沉默和空白。其中有些沉默和空白可以在马克思著作的其他地方，甚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例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就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明确地解释为问题体系的革命。因此阿尔都塞认为，对马克思著作决不能从字面上阅读，而必须“进行‘征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问题体系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对最深刻的问题体系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仅仅是以隐蔽和实践形式存在的东西”。^⑮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资本论》的哲学阅读，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提炼出来。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它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呢？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征就体现在《资本论》的对象与古典经济学对象的差别之中，因为“从来的定义都不过是事物的区别”。阿尔都塞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归

^⑭ 同上书，第31页。

^⑮ 同上书，第34页。

纳出以下特征：(1)反经验主义；(2)反还原主义；(3)反历史主义；(4)反人道主义。

(1)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经验主义的范畴是古典哲学问题的中心。古典哲学认识论的主要特点，就是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混为一谈。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实践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理论实践象生产实践、政治实践一样，也是一种实践。它同样具有原料、加工、产品这三个要素。它是以理论材料为原料，经过加工，生产出产品的过程。而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理论实践的最初的对象或原料当作实在本身。在这种错误认识论指导下，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事实”领域作为自己的对象，实际上把这种既定存在当作自己的对象。因此，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它的既定对象的镜子式的反映。阿尔都塞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从配第、重农学派、斯密到李嘉图都没有能摆脱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而那些对《资本论》的攻击，如指责马克思的基本概念是非经济的，指责价值规定是理论的虚构，指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是不可计量的等等，这些都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有关。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全部哲学批判，就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对象，同时也是针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

(2)反还原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元决定的辩证法。它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就是把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还原为一种内在本质的表现。因为黑格尔认为，社会整体是理念的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不同的社会现实只是理念发展的外在化。根据这种一元决定的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还原为一般生产过程，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还原为主体间的关系。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一元决定的辩证法相反，是多元决定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整体是一个复杂性的结构。它包含着许多不可还原的、各不相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或层次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一种特殊的“结构因果性”，其前提既是整体各要素的相

对独立，也是各个要素对整体共同依存。这就既保持了整体结构对局部结构的决定作用、局部结构对其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局部结构对整体结构、局部结构各组成要素对局部结构的相对自主性。阿尔都塞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整体观念，经济现象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用经济现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就是用这种复杂性或多元性来说明经济现象。“只有明确经济领域在整体结构中所占的位置，明确存在于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理解经济的实质”。^{①⑥}

（3）反历史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历史主义虽有各种不同表现，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历史解释为时间上连续发生的同质过程，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一种内在发展逻辑的逐渐显露。用历史主义看问题，就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取消了它的各个层次之间的差别。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同一化，把哲学还原为政治，还原为现实历史，把理论还原为实践。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是结构。马克思解释历史的依据是把社会整体看作一个结构，这个结构“由某种复杂性构成，是一个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此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性’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①⑦} 社会整体的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不仅有经济结构的历史，而且还有上层建筑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等等，这些历史都有自己的断裂、节拍和韵律。因此不能在同一历史时代中思考整体的不同层次的发展过程。“本质的切割”即横断历史过程的断面，“不可能产

^{①⑥} 同上书，第2卷第52页。

^{①⑦} 同上书，第1卷第121页。

生出同整体的表现的统一和思辨的统一相一致的现实存在”，^⑮“只有确定了每一个历史的特殊的历史时间性概念以及它的节拍划分（连续发展、革命、断裂等等），这种历史才能够被认识”。^⑯此外，社会整体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关系在整体中的共同存在，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支配，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以特殊的方式把各个环节和各种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必须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够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形式，从而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

（4）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认为，人本学是古典经济学、资产阶级自由派经济学、各庸俗社会主义流派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人本学的特点就是把它空间的各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的基础上。它的逻辑是：经济是主体需要的结果，正是人的主体的需要决定了经济学中的经济。既然所有的主体都是有需要的主体，那么人们在考虑主体的作用时，就可以把主体的整体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主体的普遍性反映在主体需要的普遍性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就完全有理由把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都看作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本学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既定现象的同质空间与那种把它空间的各现象的经济性质建立在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的人的既定存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人本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了”^⑰。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这一理论结构，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本学的基础。马克思的批判取得了这样一些理论成果：（1）马克思把消费划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区分，即区分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从而规定

⑮ 同上书，第130页。

⑯ 同上书，第124页。

⑰ 同上书，第2卷第29页。

了生产的物质性，摆脱了人本学关于“需要”的经济唯心主义的规定；(2)马克思证明了生产是经济的真正规定，生产支配消费和分配；(3)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过程条件的物质性和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批判了关于人的劳动是纯粹的创造的人道主义观点；(4)马克思指出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当事人和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的特殊结合，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是主体间相互关系的观点；(5)马克思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的经济学对象结构代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现象的同质的“平面空间”的对象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建立《资本论》对象的同时，彻底抛弃了人道主义的论题。《资本论》的最大成就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主体不是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性”，“现实的人”，而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分析社会时的着眼点是生产关系，他用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用人的需要来说明历史的变化，这就是把人概念化为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承担者”，这种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从“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出发去解释社会发展的人道主义观点。

评徐崇温同志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王吉胜 童国木

最近我国有些学者对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反批判》(1930年)一文中提出的。他把他自己和卢卡奇的那种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性的倾向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示区别于所谓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的这个概念在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一书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述,从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且为一些西方学者所接受。但是在后来,当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安德森在1976年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时,该书所探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内涵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指那种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性的倾向,而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理论;在外延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只是卢卡奇和科尔施两人,而是指“一代人”,包括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萨特、阿尔都塞、科莱蒂、布洛赫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等。通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全书,可以看到,安德森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按“特有的主题和关切的问题的变化”以及“世

代”和“地区”标准划分出这一批人的，但他仍然承认他们属于马克思主义。

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科尔施、梅洛-庞蒂的概念和安德森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科尔施、梅洛-庞蒂的概念相比，联系在于它们都包括那种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性的理论家（卢卡奇、科尔施）；区别在于它还包括“反其道而行之”的理论家，即所谓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德·沃尔佩等）。与安德森的概念相比，联系在于它们列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代表人物和共同特征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在安德森的概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在徐崇温同志的概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同志认为，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科尔施、梅洛-庞蒂的概念和安德森的概念的综合；一方面，吸取了安德森的概念在范围上有所扩大的特点，摒弃了它不谈思想路线，只谈主题和关切问题的缺陷；另一方面，恢复了科尔施、梅洛-庞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着眼来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作法，摒弃了他们反对列宁主义的立场。我们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种“吸取一摒弃”的做法上。既然科尔施和梅洛-庞蒂是出于反列宁主义立场而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那么我们毫无理由接受这个带有强烈思想倾向性的概念的内涵（尽管是从否定意义上接受）；既然安德森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应该采纳他按自己的划分标准开列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名单，即他的概念的外延。从形式逻辑上讲，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是统一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科尔施、梅洛-庞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所作的规定是否正确，也不去判断安德森用以划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否妥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的概念基本上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相反，徐崇温同志在沿用科尔施、梅洛-庞蒂的概念的内涵（尽管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时却扩大了它的外延，在照搬安德森的概念的外延时又改变了它的内涵。

这种简单拼凑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必然违背形式逻辑关于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原则，必然会出现内涵和外延自相矛盾的情况。其主要表现是把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等)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科莱蒂等)混为一谈，认为他们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徐崇温同志也许意识到了包含在这个“综合”起来的概念中的矛盾。为了克服这种自相矛盾，他提出了从思想路线上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所展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主张按照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唯心主义流派，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我们认为，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坚持思想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不能把思想路线简单化、绝对化。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条件不同，无产阶级的素质不同，必然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难发现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和群众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并取得了实际的成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提出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就把他们说成是思想路线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不断探索的过程。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我们都面临着重新认识的任务。如果按上述的“思想路线”，恐怕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诚然，在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确有些人从思想路线

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萨特就是如此。虽然他晚年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但他不是,也不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明确表示,如果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象他这样的人是不能同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相提并论的。拿葛兰西来说,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始终不懈地探索革命真理,为意大利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关于领导权、阵地战、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果系统地、准确地研究一下《狱中札记》,即便按前面的“思想路线”,也不应把他划归为非马克思主义者。

徐崇温同志从所谓的思想路线出发,把卢卡奇也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实际情况是,卢卡奇写《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而是“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①。应该说,这是时代赋予卢卡奇的使命。卢卡奇自己也认为,他当时之所以致力于研究黑格尔哲学,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激进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歪曲,具体表现是:①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以“科学”的名义消灭黑格尔的辩证法;②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激进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过高地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的作用;③资产阶级哲学企图在理论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现代非理性主义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的人来说,恢复黑格尔主义传统是一

① 卢卡奇:《我向马克思的发展(1918—1930)》,载《卢卡奇自传》198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250页。

项不难理解的义务”^②。卢卡奇企图通过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在实际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做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任何想准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不难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内容的来源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列宁在他的“思想实验室”——《哲学笔记》中指出的那样,“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紧接着他就对当时忽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和机械化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如果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多于发展的话,那么他在《哲学笔记》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卢卡奇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动机应该说是和列宁一致的,而不是象徐崇温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用黑格尔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如果对比一下《历史和阶级意识》和《哲学笔记》,就不难发现,卢卡奇同列宁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或接近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

当然,《历史和阶级意识》作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著作,在某些问题上,如“总体性”、“异化”和“反映论”等等还存在着不成熟的、今天仍可进一步研究的观点。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作者在理解方面的偏差同所谓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把本来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探讨的观点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主义和实事求是原则的。至于说《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后来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派产生了影响,这是事实。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作具体分析。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利用了卢卡奇的个别观点,或者对卢卡奇的观点进行有意的歪曲,这也是常有的事。但它同卢卡奇本人的原意无关。

^② 同上。

我们不能凭借所谓的“影响”去判断是非。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对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事实。事实上，卢卡奇的这本书在历史上同样起过积极的作用。卢卡奇本人就曾说过，他这本书曾把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一个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在思想上混淆是非、有碍于客观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只能抛弃，不能坚持。

从这里的分析已经能够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讨论，其意义已超出了争论问题的本身。它实质上提出了如何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大家都记得，真理标准的讨论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随之产生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改革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繁荣，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领域充满了生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思想解放的发源地——哲学界却在滞步不前，未能取得重要的突破。这固然是由于哲学的特点和功能等一系列客观因素使然，但也不能不说同哲学理论工作者沿袭的僵化的研究方法有关。有些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仍然受形成于苏联教科书的“单线发展论”的影响。“单线发展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是按照“马—恩—列—斯”这条直线继承和发展的；具体说来就是：凡是提出不同于经典作家观点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凡有重大发展，都一定是由它所确认的几个继承人作出的，而且这种发展都是直线性的，没有曲折反复。徐崇温同志提出的所谓的思想路线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述。这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无视或贬低经典作家的许多战友和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理论探索和独特贡献，把马克思主义模式化，按照几条抽象的原则把虽不符合所谓的模式，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许多哲学思想一概视为非马克思主义。这样做，只能使哲学贫困化，窒息

本应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的生命力。诚然，由于国内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较晚，加上当时“左”的影响，最初向国内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时，出现简单化的倾向在所难免。但这种现象理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而加以克服。如果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按照几条抽象的标准对号入座，除了使马克思主义自我封闭外，根本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吸收、借鉴了。

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在20年代就说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各种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也不是对‘圣’书的注解。相反，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③

③ 《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伦敦版第1页。

革命的现实政治^①

〔匈〕卢卡奇·捷尔吉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建立其革命的专政：社会主义的实现现在是一项实践任务，也是无产阶级最缺乏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处理当代的所有问题时历来不把它们与整个历史过程相联系，也不结合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因此从不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而作现实主义的和具体的论述，从而在工人阶级的心目中，社会民主党人又一次使社会主义带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最终目的与运动的分离不但曲解了对日常问题的估价，而且使最终目的本身成为乌托邦的。这种向乌托邦主义的倒退，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形式。首先，根据乌托邦主义者的设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变”的过程，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状态。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使被提出，也只是作为未来经济、文化和其他问题，并且从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实际实现阶段后，可能产生的技术的或其他解决方法的角度来研究的。至于社会主义如何首先变成社会的可能，如何达到或构成，或者，无产阶级在承担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历史时刻，必定面临什么阶级关系和经济形式，他们是不管不问的。（就像傅立叶在他的那个时代，对法伦斯泰尔的组织作了详细的分析，却不能具体指明应当如何建立这种组织一样）。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排除了辩证法，就使社会主义本身离

① 这是卢卡奇 1924 年写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列宁》一书的第六章。卢卡奇到去世为止，一直拥护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支柱之一。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把他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编者注

开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结果,那些受它毒害的人,必定要从歪曲了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和关于这种实现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错误陷人之深,不仅影响到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无论怎么说也永远是一个距离遥远的最终目的——,而且也使得一些诚实的革命者陷入迷途。后者——第二国际中“左派”的大多数,结合实际的日常问题对于革命过程、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看得很清楚;但他们却不能从一个类似的角度看清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列宁用以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全部社会主义问题的极好的现实主义,必定为他甚至在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手方面赢得尊敬,这种现实主义不过是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辩证法思想应用于从此以后已成为话题的社会主义诸问题。在列宁的著作和演说中,就像偶尔也可以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一样,论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成了的状况)的地方很少,但是,关于引向建立社会主义的步骤的论述却多得多。因为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具体想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完成了的状况的细节。与在理论上准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认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建立了我们能够用以判断我们为走向社会主义而采取的步骤的标准。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认识——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产物,只能在这种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而获得。一切为获得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尝试,如果不遵循这条与阶级斗争的日常问题辩证地相互作用的道路,就会得出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一种乌托邦,也就是某种仅凭冥思苦想的和不实际的东西。

因此,列宁的现实主义的目的,他的现实政治,就是最终排除一切乌托邦主义,具体完成马克思的纲领的内容;一种变为实践的理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列宁处理社会主义的问题,像他在国家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他把它从原先的形而上学的割裂和资产阶

级的方向下扭正过来，并将它置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整个历史条件之中。他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检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别处提出的天才预见，使之更加具体，比马克思尽管有其天才而在他的时代所做的更加充分。

所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问题。它们是在工人阶级建立其专政的形势下直接提出的，因而只有联系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理解和解决。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就当前和所有以前的形势而论，它们包含着一种全新的性质，即使它们的因素全都植根于过去，它们与维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或其他较早的理论家那里不可能存在，只有放在这种全新形势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

列宁的**现实政治**，追溯其历史环境和基础，被证明是通过**唯物辩证法而达到的最高阶段**。一方面，它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了既定形势，分析了它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其直朴和谨严而论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它清醒地意识到从这种形势产生的所有新倾向，并拨开了任何理论偏见和乌托邦式幻想的迷雾。这些明朗而单纯的性质，从根本上属于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历史学说——绝不是轻而易举便可获得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习惯思维方式使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爱做系统研究的人——具有一种希望完全按旧事物说明新事物、完全用昨天的一套来说明今天的倾向。（革命的乌托邦主义试图让人们拉着自己鞋子上的搭扣带来拔高自己，一跃而登上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不是藉助于辩证法去认识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辩证发展。）列宁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被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引上歧途，为了避免这一点，我必须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任何理论，任何书本所没有涉及的，原因很简单，所有与这个术语相关的通常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相联系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留着资本主义轨道的社会，还没有走上新的

轨道。”

但是一经获得政权，俄国无产阶级为达到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实际的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呢？首先，由于世界战争，相对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状态，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农民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成联盟才能从封建残余的枷锁下解放自己。其次，俄国外部有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准备扑向这个新生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倘若其本身不是被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日益增大的矛盾所分割，便强大到足以从军事上或经济上粉碎这个国家。这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持久的机会，来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和其他的竞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里所指出的仅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但即使是对这两个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也不可能在此处做详尽无遗的讨论。）

作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较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由工业的重组和更高的发展、由它为工人阶级的需要所进行的调整、以及它向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等等）来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条件决定了它具体实现的可能性和道路。在这个方面，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1917年，列宁对于由此产生的经济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②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③后在1918年初，他又进一步写道：“……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5卷第349页。——译者注

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③

特别详尽地引证这些段落，目的是驳斥广泛流传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神话。按照那种神话，似乎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一举”引向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列宁妥协了，“作为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他离开了原来的政治路线。历史的真理恰恰相反。关于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说：“它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战争与毁灭迫使我们进入战时共产主义。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与无产阶级的经济任务相符合的政策。”按照列宁的理论前提，它本身是对社会主义本该走上的发展道路的背离。当然，它是由国内国外的内战决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按照列宁的看法，如果无产阶级忽视战时共产主义的这种特征，就将是无产阶级不可挽回的错误，更不用说把这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现实步骤，正像达不到他那个理论水平的许多真诚的革命家所做的那样。

因此，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经济的外部形式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达到什么程度，而仅仅在于无产阶级实际上成功地对重工业控制到什么程度，——重工业是它掌握政权时所占有的经济机构，同时也是它自身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以及它真正成功地运用这种控制使自己的阶级目的推进到什么程度。不管这些目的的前后联系与实现它们的相应手段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们的总的基础始终是保持不变的：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在决定性的前线——反对资产阶级的前线——领导动摇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农民）。而且，这里绝不应该忘记，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无产阶级仍然是，并在一个长时期内将仍然是较弱的阶级——直到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因此在经济上它的斗争必须建立在两个原则上：首先，要尽可能迅速而完全地停止世界和国内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因为没有这种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就必定会被摧毁；其次，调整所有有关生产和

^③ 同上书，第27卷第309页。——译者注

分配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这样，通过以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与无产阶级建立的联盟就能够得到坚持。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们的逐步完成却是坚持无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的唯一道路。

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国内经济战线上的激烈程度也丝毫没有降低。小规模工业——在这个阶段要消灭它或实现“社会化”，是纯粹的乌托邦主义——“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在基本的意义上和广阔的范围内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就在于二者谁占上风：是这个重新出现和重新积聚的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重工业？归根到底，如果无产阶级不希望冒由于扼杀小工业、小商业等（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幻想）而失去自己与他们的联盟的危险，它就必须冒这种竞争的风险。此外，资产阶级甚至以外国资本或租让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竞争。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发展（不论资产阶级的意图是什么），由于加强了重工业的经济力量，能够在客观上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援助。于是“产生了一种与小型工业相对立的联盟”。当然，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租让资本逐渐使无产阶级国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常规倾向（通过限制租让、对外贸易垄断等）。

企图用下面这么一点评论哪怕是最简要地概述列宁的经济政策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只是想把它们作为例证，使列宁的政治原则的理论基础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列宁的政治原则是：在一个存在着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与动摇的同盟者的世界中，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样地，他在夺取政权前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在衰退的资本主义相互纠缠、千头万绪的社会倾向中发现那些可以被无产阶级利用来把自己转变为社会的领导——统治——阶级的因素。列宁在他的一生中毫不动摇和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个原则。以同样不能改变的方式，他把这看作是一种辩证法的原则，意思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和历史中

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辩证法要求“在发展的进程中全面考察有关的社会现象，从所有外部的、可见的表现归结到它们的基本动力——归结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列宁作为一个辩证法家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辩证法基本原则，经常从最内在的本质看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具体地说，不带有抽象的偏见，也避免了被表面现象造成的盲目混乱。他总是把一切现象归之于它们的最后基础——按照人们实际的阶级利益，归之于具体的（换句话说由阶级条件限制的）人的具体活动。仅仅以这个原则而论，有关列宁是“精明的强权政治家”和“妥协的大师”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使人们看到真实的列宁、一贯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家。

首先，在为妥协这一概念下定义时，任何使人想到它是一个技巧、聪明或狡诈的诡计问题的说法，都必须加以反对。列宁说，“我们必须坚决驳斥那些把政治说成小的诡计、有时是近乎欺诈的人。阶级是不能被欺骗的。”因此，对列宁来说，妥协意味着不同阶级（也可能是不同民族——比如说，当涉及到一个被压迫民族时的真实的发展倾向，在某些具体环境下和一个时期内的确定领域内会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可以被利用来为双方都带来好处）。

自然，妥协也能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人们只要考虑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也牢牢地抓住这种妥协的特殊形式不放，这部分地是为了抬举列宁，或者贬毁他，说他是一个“非教条的强权政治家”，部分地是以此为他们自己的妥协找到一种伪装。第一种论据的虚弱之处我们前面已经谈及。判断第二种论据——如同对待每一个辩证法的问题时一样，——必须考虑到妥协的整个具体环境。现在已经很清楚，列宁的妥协与机会主义的妥协是基于截然相反的设想。不论自觉或是不自觉，社会民主党的策

略根据是认为真正的革命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还不存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思想上成熟到足以进行革命，党与工会还太弱小，而总是由于这些原因，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进行妥协。换句话说，越是出现社会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无产阶级就越是能够“纯粹地”实现它的阶级目的。所以在实践中妥协的反面经常是十足的激进主义——关于“最终目的”的原则的绝对“纯粹性”。（不言而喻，我们只能结合这种前后关系考虑那些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阶级斗争概念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对那些不相信的人来说，妥协显然就不再是妥协，而是各种职业阶层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而自然进行的合作。）

另一方面，对列宁来说，妥协是革命现实性的一种直接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如果这种现实性规定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革命在任何时刻都可能爆发，——在个别国家或者是在世界范围——迄今还不能精确地规定这种时刻；如果整个时代的革命特征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益衰败中显示出来，结果使多种多样的倾向不断地互相交替和交叉，无产阶级就不能在它自己选择的“有利”条件下开始和完成它的革命，而必须经常利用所有那些倾向，——不管是多么暂时性地——来推动革命，或者多少能削弱它的敌人。前面，我们引证过的列宁的某些话表明他——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前——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的速度方面，极少抱有什么幻想。下面所引列宁最后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写于“妥协”时期之后，仍然很清楚地表明，对于列宁来说，这种预言从不意味着推迟革命行动：“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④

尽管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能在自己所选择的环境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译者注

中创造历史。列宁主义关于妥协的理论和策略不过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认识的客观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是通过如下的认识得来的，历史总是在创造新的条件；历史上不同倾向相互交叉的时刻永远不会以相同的形式重新发生；那些对于明天的革命是一种致命危险的倾向，可能被判断为对于今天的革命有利，反之亦然。1917年11月1日，列宁曾经想依据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旧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提出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一种妥协，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到了11月17日他还是写道：“……也许提出一种妥协已经太晚了。也许还有和平发展可能的少数日子也已经过去了。是的，显然它们已经过去了。”这种理论在布列斯特和约和经济租让制方面的运用，更是勿需证明的。

列宁主义关于妥协的全部理论在什么程度上以列宁革命现实性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可以从列宁与自己党内左派的理论论战中看得更为清楚。（1905年第一次革命后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俄国范围内的论战，1920和1921年欧洲规模的论战。）在所有这些论战中，左派激进主义的口号是原则上反对任何妥协。列宁的驳斥非常坚决地指出，这种反对妥协的观点包含着对决定性斗争的回避，背后隐藏着对革命的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对于真正的革命形势，按照列宁的看法，这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它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即任何地区只要有阶级斗争就会出现革命（或反革命）的可能性。因此，真正的革命者，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期，并从这种认识引出实际结论的革命者，必须始终从这种观点出发，看到社会—历史现实的整体性，而且，为了革命的利益，严密地考虑一切事件——大的或小的，正常的或不合宜的——根据并只根据它们对革命的重要性。在间或把“左派激进主义”称为“左派机会主义”时，列宁非常正确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两种在其他情况下呈相互对抗倾向的**共同的历史观点**，对于一种倾向来说，任何妥协都是忌讳的，而对于另一种倾向来说，妥协又体现**现实政治**的原则，与“严格坚持教条主义原则”相对立。换句话说，他指出，二者

都是悲观主义地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临近和现实。这样，通过从同一个原则驳斥两种倾向，列宁把问题弄得很清楚，妥协对于他和妥协对于机会主义者，**只是在语词上的相同**；双方所使用的这个词指的是根本不同的前提，因而涉及到**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

正确地理解列宁关于妥协的含义是什么，他从理论上建立妥协策略的依据是什么，不仅对正确地理解他的方法至关重要，而且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对列宁来说，妥协**只有在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才是可能的**；它经常指出走向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下一个现实主义的步骤。所以，不管这种理论与策略如何明显地不同于僵硬地坚持“纯粹”的原则，它们也必须与所有非原则的、公式化的**现实政治**完全区别开。换言之，在列宁看来，对某种具体形势——决定着一种妥协的特殊的力量平衡，确定着无产阶级运动必要发展的倾向——仅仅根据其现实性得出适当的认识与评价，是不够的。他认为，这样一种对实际事实的正确评价如果不与**整个历史过程**相联系，就会在**实践中**成为工人运动的一种巨大的危险。所以，他一方面承认，德国共产主义者对于粉碎了卡普兵变之后被设计出来的“工人的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态度——即所谓“忠诚的反对”——是正确的，同时也最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策略，原因是它在理论上是以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为基础的，充满着民主的幻想。

因此，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的正确熔合，亦即在特殊中（在具体形势中）认识一般（一般历史趋向的意义上），使理论具体化，是这种妥协理论的基础。那些只把列宁看作现实政治的一个聪明的、甚至是卓越的倡导者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质。而那些以为能在他的论断中为正确而实际的行动找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对他的误解就更深了。列宁从来没有规定过能够“适用”于许多不同情况的“一般规则”。他的“真理”来自于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是以对历史的辩证探索为基础的。对他的见识和论断进行机械的“一般化”，只能导致一种漫画式的、庸俗

化的列宁主义。比如,1919年夏,在对于“温和照会”作出反应时,那些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者,曾试图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图式化地模仿布列斯特和约,就是证明。因为,正如马克思尖锐地责备拉萨尔那样:“……辩证的方法被错误地应用了。黑格尔从来没有要求在一个一般的辩证法原则下包括大量的不同‘事例’。”

但是,需要考虑到每种具体形势下所有存在的趋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趋向在作出决定时都具有同等的份量。相反地,每种形势包含着一个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对由它而同时产生的其他问题的回答,也决定着未来所有社会趋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列宁说:“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⑤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通过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某一既定时刻确立什么样的事实能获得这种意义。它的主导旋律是作为一个连续发展整体的革命的社会概念。因为只有这种对整体的关系给予有关的决定性链条以这种意义:必须抓住它,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做,才能抓住整体自身。列宁在他最晚期的一篇论文中又一次尖锐而具体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当时他谈到合作制并指出:“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⑥

^⑤ 见上书,第3卷第526页。——译者注

^⑥ 同上书,第4卷第681、683页。——译者注

遗憾的是,这里不可能详细分析整篇论文。这样一种分析——就此而言,是对列宁任何一个理论见识的分析——会表明整体性如何总是包含在每个链条的环节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准则始终是,抽出最大的精力,并把它们集中到历史过程中的那些要素上,——在任何既定场合或阶段,其内部对于当前整体,对未来的重要发展问题,亦即未来的实际和有形整体,都包含着这种关系。所以,这样全力抓住链条的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绝不是非要从整体性中抽出这个环节因素而牺牲整体性中其他因素不可。相反地,它是指,历史过程的所有其他因素**一旦与这个中心问题相关**,就能因此而获得正确的理解和解决。通过这种处理,所有问题相互间的联系并没有松弛,而是被加强了和变得更具体了。

那些因素通过历史、通过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被带到人们面前了,但是否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把握并因此而影响到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的并且被经常引证的原理——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在夺取政权后的革命时期变得愈来愈重要,尽管它的辩证对应物强调环境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也是其真理性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意味着**党在革命中的作用**——早期列宁的高明思想——在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比准备时期**更为重要、更有决定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决定历史进程的能动性影响越大,它的决议对它本身和对整个人类就越是——从好的和坏的意义上说——命运攸关的,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保持狂风暴雨的海洋上唯一的指南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使斗争中这个独一无二的向导更加明晰,就越是重要。无产阶级政党能动的历史作用的概念,是列宁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进而也是列宁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强调它对实践决定的重要性。在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抨击国家资本主义的对手时,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我们能够确定它的界限。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相联系的,而国家是工人阶级,是工人

阶级的先进部分、先锋队。我们就是国家……它取决于我们来规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每个转折点总是同时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党内问题**。它是一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党组织对新任务的调整：在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对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仔细而精确的分析所决定的方面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党为什么在我们所构成的国家中占据着决定性力量的统治集团的顶点。因为革命只能在世界的范围里取胜，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作为一个世界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党本身归结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机关——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属于这个最高机关。以机械的僵化为特征的所有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将总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不可解决的矛盾。这种思想即使在“回到了资本主义”之后也无法理解，布尔什维克如何仍然坚持旧的党的结构和党的“非民主的”专政；共产国际如何一刻也不放弃世界革命，尽力运用所支配的各种手段来准备和组织革命，而同时俄国的工人国家则试图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参与俄国经济结构和平相处；无法理解为什么党顽强地维护它内部的团结，并尽最大力量寻求它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则急切地捍卫它赖以存在的与农民的联盟，免于任何侵蚀——使它在机会主义看来，越来越象是一个农民国家，牺牲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等等等等。机械僵化的非辩证法思想不可能理解这些矛盾是**现今时期的客观的、本质的矛盾**，俄国共产党的政策，亦即列宁的政策，只是在对它自身社会存在的**客观矛盾寻求和发现辩证地正确的解决方法**的意义上是矛盾的。

这样，对列宁政策的分析，老是使我们回到那个基本的辩证方法问题。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始终如一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一个伟大转折时期中不断变化、永远是新的现象。但是因为辩证法不是可以机械地运用于一切生活现象的一种终结的理论，而只是作为贯穿这种运用当中的理论而存在的。列宁的实践使辩证

法比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时具有了一种更广阔、更完全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列宁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马克思主义降低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而且使它的方法本身发展了、具体化了和成熟了。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如果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样，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这就必定是富有成果的。这种能动性的性质和内容是由历史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决定的。它的成功是由领导工人阶级的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决定的。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经更加靠近无产阶级的日常战斗，它已经变得比在马克思时代所能达到的更具有实践性了。因此，所谓列宁主义的传统，不过是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生动活跃、生长及创造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再说一遍——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精神来研究列宁。必须研究他，以便学习如何运用辩证法；学习如何通过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来发现一般中的特殊和特殊中的一般；看到一种形势中的新事物与从前的发展结成什么样的联系；观察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下不断产生的永远是新的现象；发现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的整体，在历史必然性中找到能动性的因素和在能动性中找到与历史必然性的联系。

列宁主义代表了具体的、非图式化的、非机械的、纯粹以实践为方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保持这一点是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只有以生动的方式发展的东西才是保持得住的。在今天，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列宁主义的传统，是所有坚信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武器的人的最崇高职责。

原载《列宁》1974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版

（张翼星译 郑志宁校）

是反对官僚主义， 还是反对经济计划？

——从一段列宁话语的译文修订谈起

丁 世 俊

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四部分，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时，引用了列宁1921年2月19日写给苏俄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主持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的一段话：“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①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我国的计划经济问题时也喜欢作这样的引证。^②作这样的引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列宁不赞成制订“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他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批判。

需要弄清的是，列宁的这段话到底是在批评经济计划呢，抑或是在批评官僚主义。其实，列宁是在批评官僚主义。问题出在如何理解这两句话中的前一句上。之所以造成列宁似乎是在批评经济计划这样的印象，是由于前一句话的中译文在表达上不够确切、不够严谨。这句话的原文为：“Целый, цельный, настоящий, план для нас теперь =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утопия».”^③现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473页。

② 卫星华、洪银兴、魏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76页。

《列宁全集》中文新版在收载这封信时已把这句话改译为：“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 = ‘官僚主义的空想’。”^④旧译文把“计划”和“官僚主义的空想”直接划等号，这样处理是不恰当的；按原文，应是等号前的全部词语等于等号后的“官僚主义的空想”，由于在表达上忽略原文的句式，致使列宁讲这句话的语气有所变化，使批评的落脚点从“官僚主义”转到了“计划”上。其次，旧译文中“计划”前的修饰语“无所不包的”尽管没有译错，但在此处的语言环境下，含有讽意、贬意，使人觉得列宁是在讥讽和贬低经济计划。新译文按列宁的句式来表达，遣词注意准确，恢复了列宁的本意。

通读列宁的这封信，完全能体会到，列宁的锋芒所向是官僚主义，而不是经济计划本身。列宁的这句话意在说明，订得再好的经济计划，由于官僚主义也会落空的。请注意这句话等号前、紧挨着等号的“目前对我们来说”一语。可以说列宁写信时的心声尽在其中：列宁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的十分猖獗的官僚主义是多么痛心疾首！他在这封信的开头就已指出：“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工作官僚主义化。”^⑤他与此同时写的《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1921年2月21日）明确提到，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它的贯彻和落实在“大官的官僚主义习气盛行的环境中是不太容易实现的”^⑥。我认为，列宁同时提到经济计划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这表明 he 已从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的联系中看出苏俄当时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起的消极影响。他不断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并由此提出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这样的思想，他始终不渝地加以宣扬，这从他逝世前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也是可以看出的。

认为列宁不赞成制订经济计划、并且他在当时就已看出计划经济的弊端，这与实际情况不符。首先要交代一下，列宁所说的

④ 同上书，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30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40卷第349页。

“经济计划”就是苏俄的全国电气化计划。早在1918年，苏俄即着手编制这样的计划。这项工作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已也未完全中断。列宁认为，恢复和改造苏俄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全国电气化计划为基础，全国电气化是使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全国电气化计划终于拟制出来了。同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计划。列宁称这一计划为“第二个党纲”^⑦，并由此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⑧。列宁多次指出，如果说苏俄有“统一的经济计划”的话，那就是全国电气化计划。与此同时，在全国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直主持全国电气化委员会工作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列宁在此期间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之间信函往来频繁，就是为了研究如何促使这一计划的实现的。所以根本谈不到列宁要去反对这一计划的问题。

全国电气化计划实际上是一项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运用于经济建设，以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评论这一规划本身不是本文的宗旨。这里只想指出两点：1、它和战时共产主义没有必然联系；2、它和斯大林后来执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上述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这封信，列宁写于酝酿新经济政策之际。人们通常认为，苏俄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前此苏俄经济建设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上有所领悟的结果，这是不错的。但这并不说明列宁当时已开始反对计划经济。事实是，改行新经济政策后，苏俄并未放弃全国电气化计划。1921年12月，列宁在写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另一封信中指出：“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

⑦ 同上书，第155页。

⑧ 同上书，第156页。

办法。”^⑨1922年4月10日，列宁在写给美国著名电工学家查理·施泰因梅茨的信中更是明确说道，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且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保证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⑩。这就是列宁对计划经济的看法。当然，不需要再交代，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指执行全国电气化计划。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而在于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模式的。我们在建国后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以斯大林的那种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模式的。我觉得，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话当作反对计划经济的话来引用，那是根据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认识来代替列宁的思想，表达的只是列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未形成的思想。

^⑨ 同上书，第52卷第40页。

^⑩ 同上书，第43卷第144页。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MARXISM-LENINISM(QUARTERLY)

No. 1, 1989 (Serial 55)

CONTENTS

A Manuscript of Marx's; The Additions and Changes He
Mad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Capital* (December
1871—January 1872)

..... Translated by Qiu Yihong

Appendix. On the Newly Published Manuscript

of Marx's..... Zhang Zhongpu

Studies of Marxism by Scholars Abroad

Marxist Economics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 Oskar Lange (Poland)

Rethinking Lenin's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of Superimperialism
and Other Problems..... Hitoshi Shizuta (Japan)

Documents and Material

Marx and Engels and P. V. Annenkov

..... L. N. Konoheyevskaya and V. A. Smirnova (USSR)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Lenin's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
ism On Modern Mysticism and Pragmatism

..... V. I. Bazarov (USSR) Translated by Guo Zhi Jing

Personally Cult and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 N. P. Mankovskaya and U. P. Saparov (USSR) Translated by

Sshen Jian

No. 4—10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Presided Over by Lenin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of
1988)

.....Translated by Wang Shiyun

Biographies and Reminiscences

On the Side of Marx and Engels—An Outline of
the Biography of Ernst Dronke..... Irina Hundt (DRG)

Western Scholars' Studies of Marxism

Anthropology and Marxism in France.....Hong Liande

The Problems and Trend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broad.....L. G. Mislivchenko

Lukács' Theory of Reification.....Zhao Guiqin

The Category of Praxis of the Yugoslav Praxis School

.....Yi Junging

A Brief Commentary of Althusser's Thinking.....Peng Yun

A Synopsis of Althusser's "Reading Capital".....Li Qiqin

A Critique of Xu Chongwen's Concept of "Western Marxism"

.....Wang Jisheng and Tong Guom^u

Selected Writings of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Marxism Abroad

Revolutionary Realpolitik.....György Lukács (Hungary)

Among Readers, Authors and Editors

Which Was to Be Opposed, Bureaucracy or the

Economic Plan?—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 Paragraph of

Lenin's Writings Ding Shi jun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 年征订通知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资料性丛刊。它创刊于 1978 年，截至 1988 年 9 月，共出版了 52 辑，博得国内学术界的欢迎和好评，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现已改为季刊，公开发行。

该刊的主要对象为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以及党政军的理论宣传工作者。它辟有“马列新文献”、“专题论述”、“文献和资料”、“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著作选登”、“国外学术研究和动态”等专栏，力求为读者提供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新动态和新文献资料，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您处如需此刊，可向当地新华书店预订，也可直接向人民出版社发行部预订。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